

GJWTCKYC
国际问题参考译丛

即将到来的 美中冲突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 罗斯·芒罗 著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 H I N A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 MUNRO

新 华 出 版 社

注释

序言

1. 见《中国大趋势》（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年出版），转引自1996年10月3日一期《远东经济评论》所载布鲁斯·占利的文章《粗制滥造的民族主义》。

2. 见第36期《麦克奈尔报告》（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1995年2月出版）所载卡尔·艾肯伯里文章《解释与影响中国的军火转让》，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89—190页。

3. 见1996年5月22日《纽约时报》所载戴维·桑格文章《美国的走私阴谋争取中国的武器援助》。

4. 见1996年8月20日《纽约时报》所载罗伯特·赫尔希文章《美国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中国》。

5. 见国会研究处1996年8月15日向国会提出的报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常规武器，1988—1995》第9页，作者为理查德·格里梅特。

6. 见1996年8月20日《纽约时报》所载菲利普·谢农文章《俄国超过美国成为向发展中国家出售武器的主要国家》。

7. 见1996年9月4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文章《造反派的新事业：一本抨击美国佬的书》。

8. 见1995年8月7日《洛杉矶时报》所载吉姆·曼文章《充满自信的中国不再希望美国的军事力量留在亚洲》。

第一章

1. 见亨利·基辛格所著《白宫岁月》（波士顿，里特尔—布朗公司，1979年出版），第1091页。

2. 见1994年5月1日一期《争鸣》杂志所载骆冰和李祖庆（译音）文章《军事领导人采取强硬的反美立场》。

3. 同上。

4. 同上。

5. 见1994年2月18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报道《中国扣留基督教游客达4天之久》。

6. 见“人权在中国”组织1994年10月3日报告《中国：利用刑事罪名打击持不同政见者》。

7. 见1994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文章《尽管美国发出呼吁，中国继续侵犯人权》。

8. 见1995年1月16日《北京青年报》所载张力文章《在中美黄海舰只对峙事件中回击挑衅》。

9. 见1994年12月14日《洛杉矶时报》所载吉姆·曼和阿特·派因合写的文章《据披露，美国舰只同中国潜艇曾发生对峙》。

10. 见1996年7月4日《解放军报》所载韦伟文章《究竟谁在威胁世界和平？》，新华社同日播发。

11. 见1996年4月19日《人民日报》所载宋以敏文章《世界力量新组合》。

12. 见《中国军队能打赢下一场战争吗？》，中文原书于1993年6月出版。

13. 见1996年6月6日《中国日报》（英文）所载卜文（译音）文章《美国在进行人权时代之前应当先看看自己》。

14. 见 1996 年 2 月 22 日新华社国内部播发任言实文章《请看美同的少年儿童状况》。

15. 见 1996 年 6 月 19 日《中国国防报》所载吕国英文章《坚决抵制殖民主义文化的渗透》。

16. 见 1996 年 4 月 22 日《解放日报》所载何方文章《多极秩序正在形成，超级大国将成历史》。

17. 见 1996 年 3 月第三期《求是》杂志所载周浩文章《政治核心、政治方向与政治立场》。

18. 见 1991 年 12 月 1 日一期《争鸣》杂志所载林百鸟（译音）文章《中共制定对美新政策》。

19. 见 1992 年 4 月 15 日一期《镜报》所载郑德林（译音）文章《邓说中国既不谋求霸权也不同北方邻国结盟》。

20. 见 1993 年 6 月 1 日一期《争鸣》所载骆冰和李祖庆合写文章《116 位将军就对美政策上书邓小平》。

21. 同上。

22. 见 1993 年 10 月的《美国对外政策》（业务通讯）所载唐纳德·扎格里亚文章，转引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 223 页。

23. 见 1994 年 1 月 1 日一期《争鸣》杂志所载张兰海（译音）文章《全国反间谍工作会议在兴山召开》。

24. 见 1994 年 1 月 1 日一期《争鸣》杂志所载张兰海（译音）文章《中共就其国际大文作出决定》。

25. 见 1996 年 7 月 1 日香港《虎报》文章《推销香烟是“新的鸦片战争”》。

26. 见 1996 年 3 月 15 日《时事新闻》，文章《伍尔西说，中国的对台政策被反美派所左右》。

27. 见 1995 年 8 月 15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所载奥维尔·谢尔文章《告诉中国，美国将等待北京平静下来》。

28. 见 1996 年 2 月 9 日《南华早报》所载林和立文章《已为防止抗议活动准备好经费》。

第二章

1. 见 1996 年 6 月 27 日《求是》杂志所载邢世忠文章《“中国威胁论”可以休矣》。

2. 见 1995 年 11 月 14 日新华社消息。

3. 见 1996 年 3 月 4 日《中国日报》（英文）所载严学同（译音）文章《中国的安全目标对世界不构成威胁》。

4. 见 1996 年春季号《环球季刊》所载科林·格雷文章《地理依旧是决定安全的因素》。

5. 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第 169—171 页。

6. 世界银行和中央情报局对中国人均收入的估计数字在 1800 美元至 3000 美元之间。

7. 见林仲平（译音）于 1994 年 6 月 17—19 日在斯汤顿山举行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问题的第 5 次牢会上提出的论文《中国军事现代化：认识、进展和前景》。

8. 这段概述所依据的是 1996 年春季号《华盛顿季刊》所载戴维·香博文章《中国的军队：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中的资料。

9. 同上。
10. 见 1996 年 6 月 21 日《解放军报》所登《科技强军的重要举措》。
11. 见 1996 年 8 月 16 日《亚洲时报》所登《由于保密不严，计划落入中国手中》一文。
12. 见 1996 年 5 月 21 日《华盛顿时报》，比尔·格茨文章《俄国和乌克兰在导弹问题上受到严厉警告》。
13. 同上。
14. 见 1996 年 5 月 22 日国际文传电讯社消息《副外长帕诺夫否认向中国出售导弹技术》。
15. 见 1996 年 7 月《明报》文章《传军委将裁军 50 万》。
16. 见 1993 年 3 月 17 日《纽约时报》所载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尽管存在赤字，中国仍增加军事预算》一文。
17. 见琼·托伊费尔·德雷耶为 1996 年 4 月 27—28 日美国海军军官学校讨论中国问题的首次年会准备的论文。
18. 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1996 年年鉴（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46 页。
19. 见 1996 年 7 月号《机构投资者》所载张大明（译音）文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司管束得了吗？》
20. 见 1995 年 11 月 16 日新华社报道。
21. 据法新社 1995 年 3 月 5 日报道。
22. 国际新闻社 1996 年 3 月 6 日自北京报道《中国宣布举行新的军事演习》。
23. 见 1993 年 8 月号《亚洲概览》所载李成（译音）和林恩·怀特合写文章《接替邓小平的是军队》。
24. 同上。
25. 见 1992 年 11 月 9 日《明报》。
26. 见 1996 年 7 月 17 日《明报》。
27. 这些数字所依据的是林仲平（译音）所阅读的中外资料。《台湾海峡的军事力量对比》（未发表的论文）。
28. 同上。
29. 同上。
30. 见 1996 年 1 月 16 日一期《广角镜》杂志所载《中国空军的新发展》一文。
31. 见 1996 年 3 月 12 日《华盛顿时报》听载比尔·格茨文章《中国加强军备，扩大打击范围》。另见 1996 年 8 月 11 日《简氏情报评论》所载布鲁斯·市朗斯文章《台湾的设施将建在菲律宾苏比克湾》。
32. 见 1995 年 4 月 24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所载迈克尔·理查森文章《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使东南亚人感到忧虑》。
33. 见格茨文章《中国加强军备》。
34. 见 1996 年 4 月 1 号《亚洲概览》所载戴维·德农和温迪·弗里德曼文章《中国安全战略：北京、东盟和华盛顿的观点》。一向先于其他报纸准确报道中国军队情况的《华盛顿时报》曾于 1994 年报道过美国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报告披露，中国在努力研制射程为 7410 英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DF—41，使中国有能力击中美国的西海岸。见 1994 年 5 月 5 日《华盛顿时报》。BBC

国际新闻部 1996 年 8 月 1 日自北京报道,中国在俄国科学家的帮助下正在研制一种射程为 8000 英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另见香博的《中国的军队》一文。

35. 见德农和弗里德曼的文章《中国的安全战略》。

36. 见香博文章《中国的军队》。

37. 见林仲平文章《中国军队的现代化》。

38. 1994 年的《简氏战舰年鉴》(伦敦简氏信息有限公司 1994 年出版)。

39. 1996 年 10 月 10 日一期的《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纳扬·钱达文章《不用现金购置航空母舰》;1996 年 8 月 6 日《金融时报》所载《英国将向中国提供先进的海军雷达》;1996 年 10 月 8 日法新社报道《看来中国将同英国公司达成机载预警系统交易》。

第三章

1. 见美国国务院 1995 年报告《中国的人权实况》。

2. 见 1995 年 12 月 3 日《纽约时报》所载比科·莱耶的文章《中国的佛教官殿》。

3. 见 1995 年 9 月 25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中国就西藏问题指责美国》。

4. 见 1996 年 6 月 27 日《国际先驱论坛报》援引法新社消息的报道《中国警告西藏“恐怖分子”》。

5. 见 1996 年 6 月 17 日《华盛顿时报》援引路透社报道《西藏的目标瞄准神王》。

6. 引自《美国利益》1991 年 5 月 4 日广播稿《布什的对华政策:不再是好好先生了?》。联邦新闻社 1996 年 6 月 6 日播发。

7. 见 1994 年 3 月 12 日《纽约时报》所载伊莱恩·西奥利诺文章《克里斯托弗的访华之行在冰冷的气氛下开始》。

8. 见 1994 年 3 月 13 日《纽约时报》所载伊莱恩·西奥利诺文章《中国拒不接受克里斯托弗要求改善人权的呼吁》。

9. 见 1994 年 5 月 29 日《纽约时报》所载伊莱恩·西奥利诺文章《克林顿和中国:希望是如何自我破灭的》。

10. 见 1994 年 3 月 31 日《远东经济评论》所载马克·克利福德文章《悼念的时刻》。

第四章

1. 见路透社 1994 年 1 月 30 日报道《对中国发行的 10 亿美元全球债券预计将有强有力的需求》。

2. 见路透社 1994 年 2 月 28 日报道《福特公司任命詹姆斯·保尔森为驻中国办事处负责人》。

3. 见新华社 1995 年 3 月 30 日报道。

4. 见 1994 年 5 月 26 日《华尔街日报》所载杰夫·科勒的报道《波音公司即将从中国获得大宗订货》。

5. 见路透社国际新闻 1994 年 5 月 28 日所载马克·奥尼尔的报道《肯德基家乡鸡公司宣布在中国进行两亿美元投资》。

6. 见合众国际社 1994 年 4 月 29 日报道《纽约州与中国一个省签署贸易协定》。

7. 见 1994 年 5 月号《中国商业评论》第 8 页文章《高级贸易代表团抵达华盛顿访问》。

8. 见 1993 年 5 月 10 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所载萨莉·戈尔和劳伦斯·朱克曼的报道《预计没有几家公司会仿效利瓦伊公司撤出中国》。
9. 见 1996 年 6 月 12 日《纽约时报》所载戴维·桑格的报道《美国责备盟国破坏其对华政策》。
10. 同上。
11. 见 1995 年 4 月 24 日《纽约时报》所载加里·米尔霍林和梅格·丹尼森的报道《中同犬儒主义的计算方法》。
12. 见美联社记者马克·克鲁德尔 1996 年 8 月 14 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人权批评家在中国不受欢迎》。
13. 见奥维尔·谢尔与本书作者的通信。
14. 见 1992 年 6 月 2 日《远东经济评论》所载粟野原的《亚洲院外活动集团：K 大街的那帮人》的报道中援引李洁明的话。
15. 见 1994 年 6 月 2 日《华尔街日报》所载约翰·菲亚尔卡的报道《基辛格先生对中国的见解——以及商业关系》。
16. 见 1989 年 6 月 14 日《洛杉矶时报》所载基辛格文章《对于中国来说，经济改革引起冲突的爆发》。
17. 见 1989 年 7 月 30 日《洛杉矶时报》发表的《中国：推进改革，不能断绝联系》。
18. 见新华社 1989 年 11 月 10 日报道《邓小平会见亨利·基辛格》。
19. 中国一位发言人说，李鹏与基辛格的会谈是在“友好、轻松和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见新华社 1990 年 9 月 8 日报道《李鹏会见基辛格》。
20. 见新华社 1996 年 4 月 19 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会见基辛格博士》。
21. 这篇文章是新华社 1996 年 3 月 31 日在发自波恩的一篇报道中所作的概述。
22. 见 1995 年 7 月 21 日《华盛顿邮报》所载基辛格文章《亚洲走向冲突》。
23. 见新华社 1988 年 7 月 17 日报道《基辛格呼吁放松对中国的技术转让》。
24. 见 1990 年 2 月 13 日菲亚尔卡的报道《基辛格先生》以及斯科特·汤普森发自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道《就美国对华政策举行的听证会》。
25. 见汤普森关于《听证会》的报道。
26. 见菲亚尔卡的报道《基辛格先生》。
27. 见 1989 年 12 月 14 日《华盛顿邮报》所载沃尔特·平卡斯的报道《基辛格说他在派遣代表团去中国访问的问题上没有发挥作用》。
28. 见汤普森关于《听证会》的报道。
29. 见 1989 年 4 月 30 日《纽约时报》所载杰夫·格特和萨拉·巴特利特的报道《基辛格和朋友们与旋转门》。
30. 见 1991 年 6 月 20 日《华盛顿邮报》所载劳伦斯·伊格尔伯格文章《如何使中国发生变化》。
31. 见 1990 年 1 月 23 日所载《华尔街日报》爱德华·庞德和安德里·帕斯托尔的报道《美国武器销售商取得的令人惊异的成功，费兰蒂如此认为》。
32. 见 1996 年 4 月 5 日《哈特福德新闻报》所载巴巴拉·纳吉的报道《联合技术公司通过文化慈善活动赢得朋友》。
33. 见 1989 年 10 月 12 日《纽约时报》所载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的报道《人民中国的庆祝活动，但是没有人民》。

34. 见新华社 1989 年 10 月 3 日报道《李鹏会见美国前国务卿黑格》。
 35. 见国务院新闻社 1994 年 4 月 22 日朱丽叶·海尔佩林的报道《约翰斯顿关于中国的信件引起问题》。另见 1993 年 12 月 31 日《亚特兰大宪法日报》琼·洛伊的报道《参议员的儿子在中国》。
 36. 见路透社记者本杰明·康·林 1996 年 1 月 18 日发自北京报道《中国成立以美国国会为目标的高级工作小组》。
 37. 见 1996 年 4 月 12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北京争取美国国会议员削弱台北的影响力》。
 38. 见西奥利诺的《克林顿与中国》。
 39. 见栗野原的《亚洲的院外活动集团》。
 40. 见希尔—诺尔顿国际公共事务公司 1991 年 6 月 1 日提出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第 9 页。
 41. 见 1996 年 9 月 18 日《商业电讯》(伊利诺伊州绍姆堡)的报道。
 42. 《美国之音》电台 1996 年 9 月 20 日在芝加哥对钱其琛的讲话作了报道。
 43. 关于这次听证会的情况引自《美国之音》电台 1996 年 9 月 20 日的报道。
 44. 见 1996 年 5 月 27 日《西雅图时报》所载斯坦利·霍尔姆斯的报道《波音公司发起保护市场的运动——为挽救与中国贸易的公司展开游说》。
 45. 同上。
- ### 第五章
1. 本章列举的有关中美贸易的所有数字均引自商业部公布的报告。
 2. 见 1996 年 10 月 19 日《纽约时报》所载理查德·史蒂文森的报道《贸易逆差缩小,但是幅度很小》。
 3. 见 1996 年 9 月 23 日《洛杉矶时报》报道援引的内容。
 4. 见 1996 年 9 月 17 日《费城问询报》文章《美国:谁偷走了梦想?》。
 5. 见路透社 1996 年 9 月 8 日发自北京报道。
 6. 见路透社 1996 年 9 月 11 日发自香港的报道。
 7. 见新华社 1996 年 9 月 4 日发自北京报道。
 8. 引自查默斯·约翰逊 1996 年 4 月的研究报告《民族主义与市场: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未发表)。
 9. 见世界银行《变革》杂志 1996 年 3—4 月号所载杰弗里·萨克斯和 WingThyeWoo 的文章《对中同转变经验的再思考》。
 10. 见 1996 年 5 月 11 日《经济学家》杂志文章《不停叩击,保持开放》。
 11. 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996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 1996 年全国贸易情况估计报告》。
 12. 同上。
 13. 见 1996 年 9 月 12 日《远东经济评论》刊登马特·福尼的报道《火的考验》。
 14. 见 1995 年 10 月 27 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银行给予的特权使电器产品出口增加》。
 15. 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996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 1996 年全国贸易情况估计报告》。
 16. 见众议院等款委员会 1996 年 6 月 11 日《贸易小组委员会听证会》。

17. 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996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 1996 年全国贸易情况估计报告》。

18. 《国际税务评论》1996 年 6 月号、《中国商业评论》1996 年 5 月号、《经济学家》1996 年 5 月 11 日一期分别对这些情况作了描述。

19. 见 1996 年 9 月 19 日《国会日报》。

20. 见 1996 年 6 月 20 日《国际光驱论坛报》文章《保护主义诱惑在北京的较量》。

21. 见 1996 年 6 月 11 日《国际商报》文章《商品进口许可证细则》。另见对外广播新闻处 1996 年 9 月 19 日的报道。

22. 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996 年 4 月发表的《关于外国贸易壁垒的 1996 年全国贸易情况估计报告》。

23. 关于麦道公司在中国的活动情况主要是根据《华尔街日报》1996 年 5 月 22 日发表的约瑟夫·卡恩的报道《麦道公司对中国的崇高希望从来没有真正高涨过》。

24. 同上。

25. 见 1996 年 5 月 26 日《西雅图时报》所载斯坦利·霍尔姆斯的报道《且看波音公司如何讨好北京》。

26. 见 1996 年 7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所载桑德拉·管原的报道《由于在中国有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波音公司为中国出力》。

27. 见《商业周刊》1996 年 8 月 5 日一期所载布鲁斯·艾因霍恩的文章《中国联系》。

28. 见美国参议院 1996 年 2 月 22 日《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

29. 见美国工业安全国际学会 1996 年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发表的《知识产权损失趋势》。

30. 见艾因霍恩的报道《中国联系》。

31. 见卡恩的报道《麦道公司的崇高希望》。

32. 见艾因霍恩的报道《中国联系》。

33. 这个信息引自劳联—产联的研究报告，部分信息由该报告的作者提供。

第六章

1. 我们对中美两国官员在上海举行的深夜谈判主要是根据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中对这件事情经过的描述。

2. 见 1996 年 3 月 22 日《纽约时报》所载塞思·费森的报道《台湾的紧张局势：论战》。

3. 见法新社 1996 年 4 月 14 日援引台湾《联合晚报》同一天的报道《安全首脑说中国取消了进攻计划》。

4. 见 1996 年 1 月 23 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的报道《中国在威胁台湾的时候，它确信美国在听着》。

5. 见乔纳森·斯彭斯所著《探求现代中国》一书（纽约 W·W·诺顿出版公司 1990 年出版）第 53—57 页。

6. 见 1996 年 3 月 24 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的报道《台湾领导人赢得选举并取得授权》。

第七章

1. 见 1995 年 11 月 15 日《华盛顿邮报》所载玛丽·乔丹《日本变得咄咄

逼人》一文。

2. 见 1996 年 5 月 25 日《纽约日报》所载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愤怒的岛民准备为基地而战》一文。

3. 同上。

4. 我们对日本改变战略立场的叙述系取材于 1996 年夏季号《生存》季刊所载迈克尔·格林和本杰明·塞尔大的《日本改变对华政策：从商业自由主义到勉强的现实主义》一文。

5. 见 1996 年 3 月 2 日东京《新闻》。

6. 见 1996 年 4 月 17 日《纽约时报》所载艾莉森·米切尔的《美国在东亚发挥军事作用得到东京支持》。

7. 见 1996 年 4 月 2 日《金融时报》所载《中国就美日关系发出警告》一文。

8. 法新社 1996 年 4 月 18 日自北京报道。

9. 见外国广播新闻 (FBIS) 1996 年 5 月 24 日引用的《中国日报》(英文) 1996 年 5 月 23 日《美日条约害大于利》一文。

10. 见基辛格的《白宫岁月》，第 1089 页。

11. 见 1996 年 9 月 19 日《纽约时报》所载帕特里克·泰勒的《改变态度，北京控制反日运动》。

12. 引自 1996 年 9 月 19 日的《国际先驱论坛报》。

13. 引自 1996 年 8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

14. 见彼得·卡曾斯但和大河原二人合著的《日本的国家安全》一书(纽约伊萨卡：康奈尔东亚丛书，1993 年版)。

15. 见 1995 年 1 月 10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所载伊迪丝·特里的《中国遏制日本在亚洲的势力》一文。

16. 见 1994 年 11 月 10 日新华社消息。

17. 见 1995 年 11 月 15 日《金融时报》所载《江加强同汉城的关系》。

18. 引自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尔的《即将来临的美日战争》一书(纽约：圣马丁出版公司，1992 年版)，第 266 页。

19. 匡文金(译音)《日本希望同美国一起制止危机》，1995 年 5 月 3 日《海峡时报》(新加坡)，引自 1996 年 5 月 21 日《朝日新闻》。

20. 防卫厅《日本的防务：新时代的对策》(东京，1996 年)，《日本时报》转载。

21. 见 1996 年 8 月 15 日武装力量新闻社消息。

22. 引自 1996 年 7 月 12 日《亚洲周刊》。

23. 见 1996 年 6 月 17 日新加坡《海峡时报》所载《政治偏向可能影响到三峡工程的承包》一文。

24. 见 1996 年 2 月 12 日《纽约时报》所载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日本和中国》。

25. 同上

第八章

1. 作者有关中国军队现代化和能力的信息摘自 1994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美国事业研究所在斯汤顿希尔召开的人民解放军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包括保罗·戈德温和约翰·号德威尔的《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投放：2000 年？》和林仲平(译音)的《中国军事现代化》。

2. 作者引用的有关中国可能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的一些技术信息摘自费利克斯·常的《台湾海峡的常规战》，1996年秋季号的《环球季刊》，第577—607页。

结论

1. 见1996年8月12日《商业日报》所载《中国又出现盗版》一文。
2. 见美国商务部的贸易数字。
3. 见约翰逊《民族主义和市场》一文。
4. 见1995年6月25日《纽约时报》所载艾伦·考埃尔《德国对西藏人权的关心与德中贸易关系发生冲突》一文。
5. 见1996年7月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治学院科学和国际事务中心发表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报告》。
6. 引自1996年9月12日《远东经济评论》。
7. 这种观点摘自安德鲁·哈纳米的文章《日本和东北亚的军事力量对比》，载于《东亚事务》1994年冬季/春季号。

序 言

(至于就美国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绝对有必要不动声色地满怀仇恨……我们必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

——中国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糜振玉中将*

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世界上力量最强的国家美国已经成了全球对手,这两个国家关系紧张,利益冲突,今后会出现更严峻、更危险的时期。仅仅十来年前,即在80年代中期,这两个太平洋大国还彼此把对方视为实际上的和未来的战略伙伴。它们各自都希望与对方结成一个出于需要的联盟,防止苏联控制亚洲。但是,到了90年代初期,冲突就成了中美关系的主线。因此,举例而言,像糜振玉将军这样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就会在1996年广泛发行的一部中国官员的文集中撰文谈及在一场长期争霸战中的仇恨问题。“本书作者全都是各自领域内的权威,”那本*糜振玉将军已严正指出,他从未讲过此话。请参见书末所附的《笨拙的谎言——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文。——编者注文集的编者说,“他们的观点反映了政府内和学术界内关于中国应当如何迎接下个世纪的大辩论。”(注1)

如果中国保持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美国依旧那么天真,两国之间现正隐约显现的冲突甚至可能导致军事上的敌对行动。毕竟,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曾三次在亚洲参与重大战争,每一次都是为了防止某一个国家在那里取得支配权;而现在看来,今后一二十年中,中国无疑会在太平洋彼岸居于支配地位。但是,即便中美并不实际开战,它们之间的争夺也将成为21世纪头几十年中主要的全球争夺。这一争夺将迫使其他国家表明立场,并将涉及所有重要的竞争方面:军事力量的强弱,经济上的繁荣程度,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大小以及有关被接受为国际准则的价值观和惯常做法的竞争。

我们的这些结论是以下述两个命题为基础的:一个是,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备尝艰辛之后,现在正担负起大国角色。它认为——这样认为也颇有理由——这种角色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出几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而且它正在朝着成为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前进。这个军事大国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辽阔的太平洋地区内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雄心勃勃的大国,它的目标是支配亚洲,其办法不是入侵和占领邻国,而是使自己远比邻国强大,从而使东亚发生的一切都必须至少得到中国的默许。

中国力量的增长及其以迫人的气势追逐本国利益的做法,不仅符合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作用的认识,而且符合一种中国领导人乐于加以利用的根深蒂固的心理需要。中国的雄心所依靠的动力是由于历史上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形成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奇怪的、因而不大能为自满自足的西方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当独裁专制在世界上越来越成为过时货色的时候,中国统治者还在努力维持其独裁专制。他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受到敌人包围的国家,利用仇外情绪来加强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相信,唤起人民的爱国心并使世界上存在一个要把以前帝国主义给中国的地位和尊严带来的侮辱长期延续下去的大敌,这是确保国民忠诚的一个可靠的办法。不然的话,人民就会对国内的许多事情产生不满。反美成了一个涉及国家尊严的问题。

第二个命题是，至少一百年来，美国在亚洲追逐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支配那个地区。鉴于支配亚洲正是中国极力要做的事情，它的目标同美国的利益就势必冲突，而且这种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其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正迅速地使欧洲黯然失色的地区。像在 19 世纪那样，东亚的重大角逐涉及该地区的均势，即中国逐渐威胁到美国所保障和照管下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保持着的大致平衡。在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2 月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中国虽在言词上气势汹汹，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却很薄弱。借用毛式宣传以前形容中国那些年的敌人——苏联——时所用的说法，那时中国是一只纸老虎，即表面上很吓人，实际上却没有能力向境外投送力量。这种状况正在迅速变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中国放弃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曾使它的形象如此可怕的那些做法。

严重官僚体制的、受到牢牢控制的中国即将收回世界上最自由放任的实体——香港。不论这次收回行动进行得顺利与否——我们的推测是，会有大量的政治弹压，但是，至少在起始阶段，不会造成什么经济混乱——它都将为中国提供世界上最繁忙的深水港和集装箱码头、一个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及一个在美国贸易伙伴中居第 13 位、每年与美国的双向贸易额达 240 亿美元的强大经济实体。

1999 年，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将回归中国。这一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将完成北京主权向历史上的中国大陆的全部地盘的延伸。但是，台湾依旧是收复领土方面的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而这肯定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紧张。1996 年 3 月，中国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军事演习，目的在于在台湾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威吓选民；美国则派遣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到那一地区专门对准中国显示武力。这个事件很快被美国公众遗忘了。然而，它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件。它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对峙，也是证明存在一个中美冲突的潜在燃点的明确无误的证据。在那个地区，中美两国不仅有着直接敌对的目标，而已双方有朝一日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需要为实现其目标而战。1996 年在台湾海峡发生的对峙可能预兆着在未来随着一个越来越强大、自信和越来越具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设法收复它所认为的它的国土的一部分而可能发生的对峙。

事实上，不论结果如何，台湾都将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题。如果中国进攻台湾，美国除了援救台湾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它就有在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其他亚洲友邦中丧失信誉的危险，而援救就意味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交战。在台湾人民同意与大陆统一这种极少可能的情况下，接管会和平进行。但这样就会使中国得到另一块经济上的大肥肉，即美国第 9 大贸易伙伴和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地方。不仅如此，台湾位于一些海运线的正中，而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日本所使用的石油和原料全都经由那些海运线运输。换言之，中国若是完全统一了，那就会打破均势，大大加强中国的经济力量和战略力量。

1972 年中美恢复关系后的最初几年是充溢着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情绪的时期；双方都松了一口气，觉得相互之间的敌对已经让位于共同利益了。如今，这种情绪早已不复存在。近来，已经没有人谈论战略合作了，倒是有许多人在谈论中美关系变得充满不信任的种种情况以及觉得双方的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认识。这些议论涉及诸如中国在靠近台湾的

区域内试射导弹以及美国那两艘航空母舰在距中国海岸不远的海域巡逻等具体事件。北京曾怒气冲冲地警告华盛顿不要涉足台湾海峡，尽管那是一条国际航道。中国的一位没有披露姓名的官员甚至居心叵测地提到瞄准洛杉矶的核导弹。这种敌对状态的诸要素中还包括中国不停地侵犯人权和向伊朗出售导弹技术及向巴基斯坦出售可用来制造核武器的特殊磁铁。中国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一座可以生产钚的秘密核反应堆；它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材料和核技术；向伊朗和伊拉克两国转让了大量的常规武器。中国向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出售或转计的军事装备中包括主战坦克，反坦克导弹、火箭发射器、战斗机以及地对地导弹——这还不包括中国在研制大规模毁灭武器方面向其他国家提供的帮助。（注2）

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对美国的对抗措施及其他一些姿态感到恼怒。中国报界为迎合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强烈的民众，把美国的这些措施和姿态说成使人想起帝国主义侵略岁月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华盛顿作梗使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热切希望成了泡影；它谴责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并恭敬地接待了流亡的达赖喇嘛；它允许台湾总统李登辉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它警告说要对中国向外国出售武器的行动施以报复；它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拖延战术。对台武器销售在继续进行，国会还表决在中国发动进攻时将支持台湾。美国报界大事宣扬人权组织关于中国实际上在用有意饿死的办法屠杀孤儿院中很大一部分儿童的报告。1996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在显著位置的一条消息报道，联邦官员正在搜捕中国的两家国营公司的官员，他们的“罪名是把2000支AK—47式冲锋枪走私到美国”。（注3）

在此之前两天，《华尔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为在中国市场上牟取利润而作出的大规模努力这一努力不仅在经济上给该公司造成了损失，而且在国会中招致指责，说该公司为了赚钱，向中国提供了机密的军事技术。与此同时，美国对华贸易赤字已达400亿美元，中国大有超过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之势。（注4）而且，中国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摆脱两代人时间以来被强加的经济停滞状态。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与日本不同，它既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美国的盟友。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证明的，经过长期辩论之后，中国领导人已经把美国确定为它在全世界的主要敌人。在60和70年代，中国指责苏联在亚洲谋求霸权，而今，它把这一指责加到中国正式确定的敌人——美国头上了，与此同时，它同以前的苏联敌人的和解倒是有了很大的进展。

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有过一些看来变得缓和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是1996年6月两国谈判代表商定比尔·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内进行互访。但是，中国的和平攻势是一个策略步骤，它可能掩饰、但却不能消除两国间导致关系紧张的那些基本分歧。在美国这方面，国会、报界以及公众都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分歧。人们看到，中国，一个幅员辽阔、终将变得十分强大的国家，而且是这个地球上尚存的最后一个共产党大国，正在以有违于美国利益、有悖于美国价值观的方式行事。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弗兰克·沃尔夫在众议院就中国最惠国地位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的发言就表述了这种情绪。他列举了中国的种种行为，从中国公司在美国销售AK—47式冲锋枪（他称之为“可能杀死美国青少年的枪支”），到据称中国由前苏联购买SS—18导弹，到迫害基督教徒，到在西藏实行弹压以及从那些在草草的、完全是作姿态的审判之后处决的犯人身上取下肾和角膜用于移植手

术等等。“在所有三个令人关注的方面，”沃尔夫宣称，“即人权、武器扩散和贸易这三个方面，局势都恶化了。”这位议员关于中国购买 SS—18 导弹的说法尚未得到证实，尽管威廉·佩里国防部长已公开表示对中国试图向俄国人购买这些经过测试的洲际弹道导弹感到忧虑。毫无疑问，过去两年中，中国从俄国购买了价值约 44 亿美元的先进军事装备，其中包括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潜艇和防空系统。（注 5）从 1994 年到 1995 年，俄国的武器销售增长了 62%，在向发展中国家售卖军火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则是它最大的买主，而且其购买数量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买主。（注 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现在购买的武器正是当年苏联为实现中国称之为霸权主义野心的那些图谋而部署的武器中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中国的宣传机器发出的反美言论也委实有些过分，其论点无非是说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一个胡作非为的国家，对中国的所有行为都有怨言，怂恿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其同台湾统一和发展经济的正当雄心为宗旨的“遏制中国”思潮。“不论我们做什么事情，你们总是不喜欢，这显然是要遏制中国。”北京的一位外交专家 1996 年在一次采访中说，“在这中情况下，中国再讲美国任何好话，在政治上就不恰当了。事实上，从政治上说，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居心险恶的超级大国、一个危险的敌人、一个横行霸道的超级大国是非常正确的。”

甚至在刚刚宣布江泽民将应邀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之后，中国报界和中国领导人就用异常严厉的措辞把美国斥为中国在全世界的主要敌手。就好像从中受到暗示一样，五名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大多是以往参加过反政府民主运动的人——写了一本名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此书愤怒地抨击美国，并很快成了全中国谈论的话题。书中对美国提出许许多多的指责，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在台湾问题上支持“分裂主义者”，从而“使中国采取的任何行动都被世人谴责为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该书作者之一张小波（即张藏藏——译者注）在北京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非常喜欢美国小说和电影，”他说，“但是，今天，我们觉得那个国家相当可憎。”

（注 7）

中美关系这种趋冷状态究竟是暂时的、是历史进程表上一条上升线中向下的短短一折呢，还是中美关系已经永久地滑向了冲突？许多专家——包括国务院的许多人和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中国通在内——争论说，中国和美国有多得多的理由实行合作而不是发生冲突，因此，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官员与中国官员的看法不谋而合。这种观点认为，国会那种恪守道德的介入、白宫制定的前后不一的政策以及报界耸人听闻的宣传，都是对一种本应保持下去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干扰。美国的做法是在刺激中国，向它挑衅，惹它恼怒，而这样做得不到任何好处。事实上，这派意见还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羸弱，不论是对美国而言，还是对其邻国而言，都不构成扩张的威胁。中国是一个防范心很重、感情容易受伤害、常讲气话的国家。但是，它需要美国，既需要作为贸易伙伴的美国，也需要作为保障东亚稳定的力量的美国。从长远来说，中国和美国注定要成为全球伙伴，尽管两国关系会不时出现紧张时期，就像 1996 年 3 月在台湾海峡事件中那样。

我们的假定与此不同。我们相信，中国和美国确实具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交流领域。中国在贸易、技术和维持和平环境以利于经济发展等方

面需要美国。不仅如此，尽管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书广受欢迎，钦佩美国、对美国友好的中国人仍然大有人在。

但是，尽管这种需要和友好的感情是很强烈的，它们却同我们在此将述及的其他一些需要和利益相抵触。我们将证明，中国日益增强的、同该国的雄心及仇外冲动相联系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它的侵略性。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中国政府之所以甘冒同美国交战的风险，不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国家的利益，而是因为这样做符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如果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如果收入差距增大，如果腐败现象继续败坏领导层的声誉，或是出现新的、类似 1989 年学生示威那样通过电视向世界转播的要求增加自由的运动，这个政权就会用爱国的旗帜把自己裹起来。而这样做的主要途径是把中国的各种问题归咎于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

我们的论点是，过去十来年中，中国为自己确定了与美国利益直接相悖的目标，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首要大国，减少美国的影响，防止日美两国建立某种“遏制中国”阵线，并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南中国海和东海，以便控制该地区重要的海运线。中国的目标是取得某种霸权。它的目标是确保它那个地区内所有的国家——不论是要在东海行使石油勘探权的日本，还是要就美国海军舰只访问它的港口一事作决定的泰国——都不会不首先考虑中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

反过来，这也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建立一种将对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日益提出挑战的新的全球秩序。中国同前苏联密切的军事合作，它向中亚和北非的伊斯兰国家提供的技术上和政治上的帮助，以及它在东亚的隐约可见的控制地位，使它在在一个非正式的国家网中处于中心地位。这个网络内的许多国家都有与美相悖的目标和理念，它们中有许多国家理解中国对西方长期称霸全球的不满。哈佛大学的塞缪尔·亨廷顿论证说，在这种正在出现的世界秩序中，居主导地位的将是他所你的文明的冲突。

我们则更多地从老式的政治联盟与均势的角度看问题。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不久即将变成全球第二大强国的中国将随着世界面貌在新的千年中发生变化而成为一支支配力量，而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敌人。

历史上有一段时期与此有着可怕的相似之处。从 1941 年至 1945 年，美国同有史以来对人民镇压最残酷的独裁统治国家之一苏联保持着战略伙伴关系，因为这样一种伙伴关系对于击败纳粹德国的侵略是必要的。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个联盟也完结了，代替它的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比较自然的竞争。

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同中国在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友好关系与它战时同苏联的关系是相似的。两者都是对立的双方迫于眼前的共同威胁而结成的联盟——一个是迫于纳粹德国造成的威胁，一个是迫于苏联扩张主义造成的威胁。一旦威胁消除，与之相关的联盟也就成了从前的盟友之间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根本差异的牺牲品。应当指出，在联盟存在期间，许多专业人士、学者，特别是记者，同时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和国务院专家，都用当年美国同苏联结成战时联盟时所使用的这种虚幻的多棱镜来观察中国。

在 40 年代初，历史上最凶残的大屠杀刽子手约瑟夫·斯大林被说成是一位固执而古板的父亲般的人物。中国那位受到类似的宽厚评价的邓小平倒是有几个有利的条件。他曾两次遭到毛泽东极其激进的追随者们的清洗，因此，

当他重新掌权时，他似乎就体现了从激进的、反美的中国向温和的、亲西方的中国的转变。第二，他个子那么小，仅有 5 英尺高，因此给人一种无害的印象。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邓小平和斯大林不同，他在许多方面确实是一位伟大的、值得钦佩的人物。他不曾试图把中国的控制扩大到它的疆域以外。他倡导的政策比以往有过的政策要开明得多。在邓小平经历了第二次政治屈辱复出之后的将近 20 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登载的所有那些封面文章曾提醒我们说，中国正在走着资本主义道路。世界上生意最红火、赢利最多的肯德基炸鸡店，就设在距存放毛主席遗体的那座纪念堂一箭之遥的地方。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建立了股票市场。《芝麻街》中的大鸟访问了中国。10 万名大陆学生到美国留学。在中国境内，在几年前还是生产队和集体农场的那些经济特区内，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宝洁公司在中国销售的香皂比在美国卖的还多。摩托罗拉出售手提电话可谓生意兴隆。波音飞机公司全部产量的 10% 销售在中国。中国的私人生活天地及文化与知识自由的领域有了引人注目的扩大。

从对中国的这种看法中产生的令人宽慰的见解是：以前曾是那样令人不安地不同于今天的这个国家，正在变得与我们越来越相似，而只要它与我们相似，我们相信，我们的利益与它的利益就将是共同的，因而也就不大可能发生冲突。

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中国的许多特征，尤其是忽视了它事实上是一个与美国极少共同点的国家这一点。例如，毛泽东至今还躺在那家美国快餐店附近的纪念堂内，仍被官方尊为现代中国之父。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政治犯最多的国家——它正式承认的数字为 3000 人。它是这样一个国家：为了驱散学生示威，它调来坦克和装甲步兵，并开枪打死好几百名——有可能是两千名——自己的人民，而事后——尽管全世界都从电视实况转播中看到了那次军事行动——却发起大规模宣传运动，否认杀过人。在 1989 年天安门学生暴动期间，我们两人中有一位正在北京，亲眼看到中国士兵在街角摆放花圈，祭奠在镇压那次突然被说成“反革命暴乱”的行动中丧生的士兵。政府控制的媒体对死去的学生却只字未提。当美国电视上播出一名中国人边模仿中国军队用自动步枪开火的动作边述说当天他所目睹的情景的镜头后，他很快在一次全国性的搜捕中被抓获，并以从事反革命宣传罪被判处 10 年徒刑。*

此人被判刑这件事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局势中还有几个残存的因素：第一，这个政权在感觉受到威胁时，仍然乞灵于政治谎言；第二，当它感到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有丧失的危险时，它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第三，那里没有真正的、应有的法律程序；第四，不论负责处理中国同外国关系的中国外交部的代表们可能多么温文尔雅、成熟老练、通情达理，掌握决策权的中国领导层内部却有一条强硬路线。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条路线把美国、它的价值观和它的生活方式视为对中国的威胁。

当然，中国仍旧以武力占领着西藏，对西藏的宗教活动和文化活动实行严格的限制。1995 年，中国当局给世界各国演出了一幕*这一段文字，以及下面关于西藏的一段文字，又是本书作者借用谎言进行反华攻击诬蔑的例子。下文中还有许多这类谎言，望读者明鉴。——编者注绝妙的好戏。执掌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和组成某种官方“科学”无神论最高委员会的那些官僚们否决了以西藏宗教当局挑选的 6 岁男孩作为班禅喇嘛——藏传佛教中仅次于达赖喇嘛的第二号最受崇敬的人物——的转世灵童。中国把一些僧侣召到北

京，强迫他们挑选另一名男孩。西藏人最初挑选的那个牧民的儿子被关在北京的一个秘密地点。他的父母被报界指责为搞阴谋和进行欺骗的人。后来他们便失踪了，估计是被抓起来了。

中国侵犯人权并不是中美关系紧张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这种事件突出地表明了总的关系状况的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今天存在的这种侵犯人权事件的程度是衡量我问过去在中国问题上自欺欺人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尺度。那时我们以为中国在迅速地变为某种自由的国度，与我们越来越相似。第二，人权问题突出地表明，尽管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但它的政治本质在多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变。第三，中国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恳请、威胁和要求故意表示轻蔑，这既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也反映出它自信它体现了与西方不同的处事方式。

长期以来，美国决策人一直寄希望于中国变成民主国家。这些乐观派最终可能证明是正确的。推动各国朝全球民主的方向前进的势力是强大的，中国大概不会永远不受它们的影响。但是，出于好几个原因，人们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首先，这有悖于中国的政治信仰。中国在其三千年的历史中，从未形成过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或司法和传媒独立的概念。它有史以来从未根据征求被统治者同意或尊重大多数人意志的原则行事。中国始终受着一个自我挑选、自我延续的集团的统治。这个集团行事诡秘，把反对它的行为视为叛国。

第二个原因是与第一个相联系的。这就是：要想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在中国当权的官僚们就得放弃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但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何时有过这样做的打算。中国的传统是，个人的好处来自政治权力——不论这种好处是涉及由国家负责维护的禁宫，还是国家提供的仆人或是一位日本商人为换取进口许可证而馈赠的一辆奔驰汽车——而这个官僚体系是不会为了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原则便自愿放弃这些好处的。

不仅如此，中国领导人把民主改革与社会动乱等同起来的看法大概是发自内心的。中国在为它的千百万人民创造比较富裕的生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个国家仍然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那里的贫富差距在增大，那里的骚乱和失业现象严重，那里许多人的头脑里整天转动着不断增高的期望。看来，那个国家的人民既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感到高兴，又不满足于腐败、犯罪、地方官员小小不言的滥用权力行为以及由于以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提供的许多保障被取消而致使现在的生活朝不保夕。面对社会暴乱前景的中国领导人肯定要强调爱国团结和绝对领导。

最后，要使中国政府按照尊重民众意志的概念行事，那就意味着要失去它对一些地区的控制，而它觉得它的国家利益是不允许它失去对那些地区的控制的。例如，如果按照民主原则，而不是按照北京的绝对命令来治理西藏，西藏人民将创立一个向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出挑战的独立运动。中国若实行民主，那将迫使中国领导人承认台湾人民拥有自己决定是维持该岛事实上的独立，还是进一步走向法律上的独立抑或成为政府设在北京的中国的一部分的权利。但是，给予台湾人任何这样的权力都将产生北京不能接受的两个后果：它将损害中国坚持要实行统一的不可谈判的立场，并将给大陆提供一个有害的先例。他们会问：既然在台湾人的政治归属问题上征询他们的意见，那为什么不征询其他中国人对自己归属的意见？中国统治集团是绝对不愿意遭受一个走向真正民主的步骤将给它的声望带来的损失、给它的权力造成的

破坏的。

例如，正当中国人准备收回香港的时候，中国宣布撤消香港经过民众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有人说，这个决定本身是民主的，因为它是由北京任命的香港居民组成的筹委会作出的。是这个委员会，而不是北京的官僚们投票撤消了这个议会。而且，筹委会中还有一名持不同意见的委员——冯检基——投票反对撤消这个立法机构。然而，冯检基在他投了唯一的反对票的第二天便接到通知，说他已被从筹委会中除名，今后不得再参加筹委会的表决。鉴于和谐地处理香港回归对中国的重要性，人们还以为中国实际上会欢迎他这唯一的反对票呢。那本来会造成一种表面印象，使人觉得这次表决的结果包含了投票人一定程度的自由选择。

但是，不然。在关系到自己对权力的控制的问题上，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对一致意见情有独钟。实际上，在接管香港之前的几个月中，中国在许多细小的方面竭力确保无人对它的控制权提出异议。当一位名叫黎智英的服装零售商兼报纸发行人在他在香港办的杂志《Next》上刊登了开罪于中国的文章时，北京政府很快查封了他在中国境内开设的服装连锁店，既惩罚他又儆效尤。但在1995年黎智英创办了《苹果日报》后（这家报纸的记者立即被禁止报道官方举办的任何有关中国的活动），这份新报纸很快成了这个殖民地第二大畅销报。这是一个迹象，说明香港人民对自由的习惯程度是北京政权所始料不及的。后来，北京当局同英国人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中有一件是同1997年6月30日——即回归当日——的保安有关的。英国人表示相信香港警方有此能力，中国人则要求从他们自己的公安部派一支部队去。其原因倒不在于中国人担心会有人对前去参加庆典的高级领导人行刺，而是担心民主派会举行反对中国统治的示威。

这从某种普遍意义上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过去二百年的历史可作判断依据的话，各国的民主程度越高，它们彼此交战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是独裁的国家，就越是容易开战。确实，如果北京现政权继续进行军事冒险——就像它1996年在台湾海峡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同美国发生起码是有限的海空冲突的现实可能。不过，我们仍然相信发生实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对此我们可以感到欣慰。中国并不谋求使用武力去占领邻国的领土或者进攻美国。这里不存在东欧那样的情况，没有卫星国或仆从政府，没有坦克驻在邻国的领土上。不仅如此，由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某种仍被称作共产党的东西所握有的权力——在中国已经消亡，这个国家也丝毫没有当年曾使苏联更具威胁性的那种救世主式的冲动。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

不过，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毕竟大于它们实行合作的可能性。中国现在并没有取代苏联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它在逐步成为一种不同类型的挑战。这种挑战有其更难对付之处，因为中国人与苏联人截然不同，他们不是一个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之上的军事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建立可靠军事力量的经济强国。关键在于中国力量的稳步增长，不仅是在中国境内的增长，而且是在整个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中国设想自己将在全球发挥的作用以及它正在同西方的其他对手建立的关系是与美国为敌的。此外，还有一个由复杂而棘手的台湾问题构成的非常具体的潜在燃点。这是因为台湾局势包含两个不可调和的因素：其一，台湾人民不愿被北京现政权统治；其二，北京把统一视为如此重要的事情，以至它决不会放弃这个目标。随着

中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随着北京政权逐渐失去耐心，它出兵攻打台湾——以及美国作出反应——的可能性会不断增加。

如果中国在不能通过谈判实现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目标的情况下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一种可能是通过海上封锁，一种可能是发动全面军事进攻——那将出现什么局面呢？多年来，美国一直提醒中国注意它是坚决主张和平统一的，到那时它能袖手旁观、默认中国使用武力吗？如果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卷入同中国的冲突，那卷入的规模和结果又将如何呢？如果美国不去援救台湾、听任这个岛屿被占领，这对美国在亚太其他地方保持可靠的力量将意味着什么？由美国来保障军事安全、为从日本到澳大利亚的各国带来了一个非凡的和平与经济增长时期的均势，将会受到什么影响？

这些都是未来将会面临的问题。但是，近来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态度越来越具有刺激性、越来越咄咄逼人了。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挑衅行动几乎肯定会加剧紧张状态：1995年初，它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有争议的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它向巴基斯坦出售了核武器技术，向美国的敌人伊朗出售了导弹。它向几乎所有同美国有争执的国家——伊朗、苏丹、尼日利亚——提供道义上的、有时还有物质上的支持。它向邻国发出外交警告，要它们把中国的利益置于比美国等“外界”大国的利益优先的地位。

它是一个暗示有核武器瞄准美国的核大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被这种武器瞄准的国家。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过去10年中，中国的自我概念及它对美国在亚洲扮演的角色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1992年以来，共产党领导层内传阅的党内文件把美国说成中国的实际敌人。1995年，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年会上，中国外长钱其琛语惊四座，宣称现在是美国停止把自己视为“东方的救世主”的时候了。钱其琛说：“我们不承认美国是一个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的国家。”（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8）这一声明暗示着中国的战略考虑发生了变化。现在，它的设想是，美国撤离后，中国将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国家，而这正是它所希冀的。

眼下，南中国海由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菲律宾四国瓜分。当中国的海军、空军和两栖作战部队力量增强后，它将有能力控制整个南中国海。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中国明确宣布的目标是要占领遥远南方的岛屿和礁滩，直至中国军队几乎可以看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这将不仅改变亚洲的均势，而且将使中国扼制唯一可使用的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际海运线。美国军舰和货轮每天都穿越南中国海，运送日本所使用的几乎全部石油的油轮也是如此。

同中国的激烈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冲突将是中美关系最有可能呈现的状况。中国和美国在亚洲唯一明确共同目的是防止朝鲜发生第二次全面战争。两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拥有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尽管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两国经济关系也充满冲突。简言之，给美国同欧洲或者美国同其他亚洲国家——日本、泰国、菲律宾、台湾等——之间带来共同件的那种共同利益或共同价值观，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是少之又少。不仅如此，中国在政治上是不可预测的，陷入分裂和派系斗争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这两者将加重它的不安全感、偏执心理和傲慢态度，使它更倾向于把恐吓、威胁和仇外情绪当做对外政策的工具来使用。

1995年和1996年，中国的表现就像一个不受外交惯例约束，甚至不受

它自己作出的公开承诺约束的胡作非为的国家。今后一二十年内，中国将成为地球上第二大军事强国，并且拥有与这种地位相称的经济力量。或许，最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发出了许多信号，表明它把西方视为它在精神和实际上的敌人；而在这一格局中。美国与西方完全是等同的。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 1997 年 4 月 29 日在华盛顿发表讲话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

〔新华社华盛顿 1997 年 4 月 29 日电〕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 29 日应邀出席了由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华盛顿联合举办的午餐会，并在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建立面向 21 世纪的中美关系》的讲话。讲话如下：

感谢对外关系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邀请，感谢主席先生刚才热情友好的介绍。很高兴同在座的各界知名人士见面，我愿借此机会就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和香港问题谈一些看法。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世纪之交。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谋求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国际生活的主流。同时，世界形势仍存在一些不确定、不安定因素。一些地区动乱和冲突不断，穷国和富国的差距继续拉大，国际犯罪、恐怖主义与环境恶化对人类的生存与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与破坏。人们都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 21 世纪。

中美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全球经济繁荣、改善人类环境等许多重大问题负有共同的责任。双方保持接触的需要不是在减弱，而是在不断增强；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的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继续扩大。双方应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加强合作，同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把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带入 21 世纪。

我高兴地看到，中美关系近来得到了较大改善，高层往来不断增多，经贸合作不断扩大，两军交往稳步发展。在两国领导人的支持下，中美成功地首次举行了环境与发展讨论会，开辟了合作的新领域。目前，双方正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今明两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作积极准备，两国关系面临着进一步发展的机遇。

但不能不指出，在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也不时听到一些不协调的声音，出现这种或那种干扰。有一种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说法，似乎中国已取代前苏联成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有人预言，中国和美国将走上对抗的道路，甚至走向冲突，因此主张遏制中国。还有一些人甚至拿中国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德国和日本相比，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就必然要对外扩张。我不得不指出，这些看法是十分错误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没有扩张的传统，相反却饱经列强的侵略、欺凌和宰割。中国从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也从没有向海外派驻一兵一卒。

从现实的角度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最大希望是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不断提高 12 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同各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国防政策完全是防御性的，中国国防开支的绝对数字是大国中最低的，按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及按人均计算也是世界上最底的国家之一。据统计，1996 年美国的国防预算超过 2600 亿美元，人均 996 美元；中国的国防预算约 87 亿美元，人均 7 美元，让我们给这些基本事实和数字一个说话的机会吧！

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仍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能力去威胁任何人，也不需要威胁任何人。即使今后中

国强大起来了，也不会搞侵略扩张，不会谋求霸权，这一点已写进中国的宪法。

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不是过去的德国和日本，中国就是中国，中国绝不会走别的国家的老路。

那些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人，既没有兴趣去研究历史，也不想认真地去了解现实。他们感兴趣的是在苏联解体以后，为美国寻找新的“敌人”，即使找不到，也要制造一个。似乎只有这样，美国才能生存，才能维护超级大国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旧时代“冷战思维”在新形势下的反映，是很可悲的。

现在美国国内还有所谓中国在美从事“政治捐款”的说法，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中国有句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一贯严格奉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既反对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也决不会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国深受内政被干涉之害，因而从以任何方式干涉别国的内政。在美国有“政治捐款”，有“金钱政治”，但这和我们中国无关。有些人借题发挥，企图向中国栽赃，损害中国的形象，目的无非是发泄对中美关系改善的不满。我相信，中美关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采取这种不正当的手法企图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不会得逞的。

目前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问题，一些人担心中国会成为“又一个日本”。事实上，中方顺差的数字被大大夸大了。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可以让两国的专家去继续讨论。但可以肯定他说，在对外贸易上中国也不会成为“又一个日本”。

日本是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竞争力很强，中国则是正在发展的国家，工业底子薄。日本对美国出口主要是以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而中国对美出口主要是以纺织品、鞋、玩具等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是鞋和玩具等大宗商品，是美国已基本不生产和生产很少的商品，不会影响到美国就业，相反会给美国零售业和消费者带来巨大好处。

另一方面，中国从美进口大量为中国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飞机、机械、电子、通讯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一种竞争关系。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对美国构成挑战。

我高兴地看到，中美经贸合作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1996年中美贸易额达423亿美元，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截止到1996年底，美国对华投资项目已达2.2万多个，实际投资额142.9亿美元。我们欢迎更多的美国企业参与中国经济建设进程，参与中国市场的竞争，使中美经贸合作的潜力进一步挖掘出来。

我愿告诉各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将继续开放市场，进一步扩大从美国的进口。同时，我们也希望美方进一步放宽对中国技术出口和金融信贷的限制，排除各种限制美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人为障碍。目前美方年度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不仅损害中美经贸关系，而且干扰了整个中美关系。美国的企业界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呼吁一劳永逸地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使中美经贸关系建立在长期稳定和坚实的基础上。这是十分明智和有远见的。

中国愿意加入世贸组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和其他中国贸易伙伴的利益。最近，中美在日内瓦最新一轮

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希望双方谈判代表加倍努力，在平等磋商的基础上，争取使这一问题早日得到解决。总之，不管是“最惠国待遇”也好，“加入世贸组织”也好，都应当是促进世界贸易，增加国与国之间合作的机制，而不应当成为利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

当今世界是一个缤纷多彩的世界。中美之间由于社会制度、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看法各异，存在一些分歧是不足为怪的。美国有一些人，把中美在人权观上的不同作为划分中国是否民主的标志。这并不科学。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美国有美国的国情。在中国的民主制度下，人民享有广泛的自由和人权，只不过这种自由和人权的表现方式与美国的不同罢了。中国的民主制度是中国人民选择的，正如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美国人民选择的一样。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人权问题，并根据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和具体国情，努力实现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保障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并加入了 17 个国际人权公约，比美国迄今加入的还多两个。中国曾多次积极评价《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经认真研究，准备于今年年底前首先签署《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对在人权领域存在的分歧，中方历来主张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和交流加以处理。对抗不是好的选择，它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影响两国在其它领域的合作。自 1990 年以来，西方国家连续七次在联合国日内瓦人权会上搞针对中国的提案均未被通过，说明这种做法不合情理，不得人心。

美国有些人担心中国扩散武器威胁美国的安全。事实上，中国一贯反对武器扩散，积极参与了各项国际裁军活动，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裁军主张。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国根据自己承担的国际条约义务制定和实施了相应的出口管制措施，并且还在不断完善。对于常规武器的出口，中国也一贯采取十分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中国的武器出口十分有限，在国际武器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与占国际武器市场近 60% 的美国是无法相比的。

中美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上的目标是一致的，也有很多共同利益。近年来，双方在不扩散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对话，达成了一些共识，中方愿继续同美方就不扩散问题保持对话和磋商。中方在不扩散问题上最为关切的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美国售台武器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并对中国大陆的安全构成威胁，也不利于台湾海峡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希望美国政府认真对待中方的关切，严格遵守中美“8·17”公报的规定，减少并停止向中国台湾地区扩散武器与相关技术，以实际行动为中美在不扩散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的条件。

应当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影响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最大障碍。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和不可动摇的民族意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江泽民主席提

出的关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一贯方针和具体纲领。其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相信，不仅中国，任何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不会容忍分裂自己祖国的行为。经历过南北战争的美国人民，应当更能理解中国人民渴望统一、反对分裂的决心和意志。美国领导人多次重申美方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我们希望这些承诺能够得到遵守。

需要注意的是，台湾当局正在使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金钱收买手段在内来推行他们分裂祖国、谋求独立的活动。要防止其图谋得逞，避免使台湾问题再度干扰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现在距离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目前香港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信心更为加强，回流移民在增加；香港市民和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很强；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特区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其自治程度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作为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不变。香港继续使用港币，并同美元保持联系汇率，中央政府不从香港收取一元港币的税，香港特区政府全部由当地人组成，中央政府不派一官一吏。外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保护。国际上有人担心将来香港的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会受到限制，实际上香港回归后，广大港人所享有的广泛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不是少了，而是更多了，其中许多项权利是在英国管治香港的情况下港人所无法企及的。届时中央政府只负责掌管防务和外交，中央政府各部门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实行“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符合香港的利益，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包括美国在内的与香港有广泛经济和贸易联系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今年是中美上海公报发表 25 周年。25 年前，中美领导人以政治家的勇气和胆略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大门。25 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再次面临改善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应拿出当年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的那种战略远见和胆识，排除各种干扰，向既定的目标前进。这样，在 21 世纪来临时，我们将看到一个造福于我们两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让我们为建立这样一个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而共同努力！

1997年5月9日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
江泽民主席谈中英关系

〔据新华社北京1997年5月9日报道〕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驻京记者陈梦兰（AndrenKoppel）的采访。

在谈到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级会晤时，江泽民主席说，去年11月，我和克林顿总统在马尼拉会晤时共同商定，我今年秋天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克林顿总统明年访华。这次访问将使我有机会接触美国各界人士，同美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

两国领导人进行互访和接触，有助于共同寻求建立面向21世纪的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在记者问到中美是否要发生冲突时，江泽民主席说，我不认为中美两国要发生冲突。中国在历史上饱经外国侵略扩张之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爱和平，一心一意致力于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们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就是要努力为国内经济建设争取一个长期和平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自卫性质的，今后我们的国防开支预算不到一百亿美元，与美国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备水平是很低的。中国从来没有“扩张”的意图。至于有些人以“冷战思维”杜撰出来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相信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这样的论调，是能够作出正确判断的。

出版前言

正值中美关系近来有较大改善之际，美国一些人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忽甚嚣尘上。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二先生今年2月出版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可谓这一思潮的代表作。现经作者同意授权，此书中译本得以与我国读者见面。

为了让读者一览此书全貌，除书中对我国领导人的人身攻击及少数几处与正题关系不大的细节文字略有删节之外，中译本保留了原书的全部内容。

书中引用的我国报刊和有关人士的言论，大部转引自外电外刊，故均据原书中的英文表述译成中文。

为便于读者全面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我们在此书正文之前辑录了江泽民主席1997年5月9日在北京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驻北京记者采访时的两段谈话，以及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1997年4月29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建立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

此外，我们还在书后附录了中美学者对此书的六篇评论，供读者参考。

原书各章中的注释皆附于正文之后，中译本亦照此办理。另外，原书中有几个当页脚注；中译本在编辑过程中又加了几个当页脚注。前者均标明为“原书脚注”，后者则标明为“编者注”，以资区别。

谨此说明。

新华出版社
1997年5月

第一章美国是敌人

一旦中国强大到可以自立，它可能会抛开我们。再过些时候，它甚至可能与我们为敌，如果它对自身利益的认识需要这样做的话。（注1）

——亨利·基辛格

1994年初，中国各省的许多共产党官员被召到北京来开会。前来开会的有中国所有29个省和自治区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还有各大中央机关和各省及大城市的代表。与会者汇集到坐落于巨大的天安门广场西侧的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后，很快就被告知了开会的原因。原来是要把美国确定为中国在全球的主要对手并宣布一个最终目标：“在适当的时机”建立“一个全球反霸统一战线”。

在中国经过精心挑选的攻击性词汇中，“霸权主义者”这个词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一个在亚洲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威胁到中国的独立与主权的国家。事实上，从60年代到80年代，这个词多年内一直专门用来称谓中国在那些年的首要敌人——苏联。但是，在1994年初的这次会上所说的“霸权主义者”指的是谁，人们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会上的主要讲话者是总参谋长张万年，讲话的题目是《加强军队建设，加速军队现代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的干涉与颠覆，捍卫祖国》。张将军讲话的核心内容是：“面对美国霸权主义者公然干涉我国内政，公开支持我国国内的敌对分子和大陆以外及海外那些反对和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势力的破坏稳定活动，我们必须更加大力地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2）

尽管中国向来爱用言词做姿态，但张万年指责美国“公开支持”中国国内的“敌对势力”时所用的字眼是自60年代末期——当时美国仍被用一些没完没了重复的陈腐词语描绘为帝国主义大敌——以来很少听到的。这种措辞当然与中国对美国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属于同类性质。不论是在考验美国对武器扩散等问题的决心方面，在违反国际人权标准方面，还是在进行大规模军力扩充方面，中国都采取了这样的态势。就好像是要证明张万年的用词并不是偶然讲了些过头话，会上的其他发言者也都使用了他的那种反美措辞。政治局常委胡锦涛代表中共最高机构政治局讲了话。他对与会的党的官员们说：“根据美国的称霸全球的战略，它目前的主要对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中国内政、颠覆中国政府和扼制中国的发展，这是美国遵循的战略原则。”（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3）另一名政治局委员丁关根谈了当前需要做的“宣传工作”。以下是他的讲话的部分要点：美国的反华战略的目的在于扼杀中国的社会主义，使中国沦为一个附属国。美国用人权作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它是以意识形态论是非的。这是一种颠覆战略。美国支持并利用中国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来从事颠覆和煽动活动。（注4）

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更公开地支持中国国内的势力？扼制中国的发展？这些明显敌对的话语出自一个至少在公开场合大谈同美国发展友好关系的国家之口。采取这种敌对态度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事实上，中国多年来一直把美国描绘成某种敌人，即便在它的官方政策的目标是培育友好关系的时期——就官方表态而言，现在的目标依然是这样——也是如此。实际上，在两国恢复关系以来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中，任何其他据称是友好的国家都不曾比中国更起劲地或者用更过激的言词攻击过美

国。对于美国来说，好像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是比较友好、坦诚、温和、务实、不强调意识形态的中国，它不仅把美国看作战略伙伴，而且把它看作经济技术方面的帮手；另一个则是故意采取仇外态度、总是抱有防范心理、封闭、易怒、比较注重意识形态的中国，它既把美国看作道义上与文化上的危险，又把它视为实现其国家雄心的最终障碍。对美国采取的这两种态度中，有时是这一种占上风，有时是另一种占上风。但是，1994年于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那次会议却与以往的这种交替有所不同。当政治局高级成员、总参谋长和掌握报纸、电台、电视报道内容的共产党宣传首脑向来自中国各地的党的代表们强调美国是一个一心搞颠覆和煽动的霸权主义国家的时候，这就是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其敌对程度就比最近几十年所看到的又升了一级。不仅如此，这是一种酝酿已久的变化。这是领导层内部就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进行了将近十年的一场长期斗争的顶点。这场斗争涉及执政党内和颇有政治权势的军队内好几种彼此竞争的倾向。通过追溯这场斗争的各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向来对美国抱着矛盾态度、向来对美国的影响充满疑虑的中国，何以从对太平洋彼岸的那个超级大国采取基本上友好的立场，转变为采取一种基本上是不友好的、把美国定为中国在全球的主要敌人的立场。

事情始自80年代末期，其中揉合着好几个问题。这里涉及自那时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其中包括最重大的那一个变化——苏联的解体。这是一个对中国有着巨大的、确实是不可估量的影响的事件。但是，事情还同一场围绕着那个对中国今天的面貌起了最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而进行的鲜为人知的斗争有关。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中国转而采取反美立场的做法曾遭到邓小平的有力抵制，但他没有成功。实际上，北京那次会议的反美调子，将美国视为中国敌人的思想取得胜利，表明邓小平——在撰写本书时他还活着，但已不能视事，也失去了权力——在他漫长一生的最后一场斗争中打了败仗。

1994年是中国农历的狗年。从美国的角度看，它也是一个坏中国之年，也就是那个无视世界其他国家的恳请和警告、危险地一意孤行、难打交道而又自以为是的中国之年，人们对这一年中的各种事件持这一看法，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受到控制的报界乃至一些本来可以指望其对美国采取友善态度的中国民间团体和个人突然猛烈地发表起反美言论。这些愤怒的言论中有一些是当时的局势引起的。1994年，由于中国的人权记录极糟，美国国内就是否取消中国的最惠国贸易地位展开了辩论。那时，美国人对于中国在西藏实行的控制和文化政策提出了尤其坦率的批评，中国则一如既往，把这种批评视作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但是，中国当时也在无视防止核武器扩散协议——中国没有在这些协议上签字，但是保证予以遵守——而向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出售导弹和核技术，后来又一再否认出售过这些东西。世人普遍认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武器竞赛给世界带来了发生核战争的最严重的可能性。北京却蔑视这种看法，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武器技术。当沃伦·克里斯托弗国务卿于1994年3月中旬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人在私下会晤中使他受到如此蒙羞受辱的对待，以至他有两年半的时间没有再度踏足北京，这对于一个到大马士革访问了十几次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

这一年还发生了许多小的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单独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历史意义，但是，把它们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多么暴躁易怒、防范多

疑、苛刻无情和无视美国的意见。2 月间，中国以从事没有明确解释的“非法宗教活动”（显然是指散发了一些小册子）的罪名逮捕了几名外国基督教徒，把他们关押了四天，不得与外界接触（这是违反中国同其他国家订立的领事协定的，这种协定要求在逮捕外国人后要立即通知有关国家的领事馆），后来又没收了他们的物品和 5000 美元，然后驱逐出境。（注 5）3 月份，非官方团体——如保护劳动人民权利联盟等——的 17 名组织音遭到逮捕或者干脆失踪了。中国甲从纵火到妨碍交通（！）等普通罪名指控持不同政见者。人权监督人员说，对他们的“判刑是极其严厉的”。（注 6）1994 年 4 月 1 日，中国当局再度逮捕了在美国最有名气的争取民主的不同政见分子。由于在 1978 年和 1979 年要求在中国加强民主而已经坐了 15 年监狱的魏京生在前去同美国人权官员约翰·沙特克进行了一次私下会晤后不久再次被监禁起来。那一年中，中国停止了就开放它的监狱接受红十字会视察问题同红十字会进行的会谈；它干扰美国之音的广播，并继续对生产价值数千万美元的盗版光盘和计算机软件的工厂采取纵容政策。在克林顿总统作出将人权问题同最惠国待遇脱钩的重大让步的几月之后，《纽约时报》报道：“人权状况继续恶化，同华盛顿的关系依然深陷在下信任和争论不休的泥淖之中。”（注 7）

此外，1994 年美国同中国之间还进行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一游戏虽然从绝对规模上说不是十分严重，但它却是自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有中美两国军队卷入的第一次实际冲突。事情发生在 10 月 27 日至 29 日，地点是在黄海上。当时，以“小鹰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一支美国海军特混舰队正在那里炫耀武力，但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北朝鲜拒不允许国际上对一些核电厂进行检查的做法。世界其他国家担心，那些核电厂是一项武器制造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派遣了一艘长 330 英尺、重 5000 吨的“汉”级核潜艇进入了黄海水域，该潜艇一度曾达到距“小鹰号”只有 21 海里的地方。在美国特混舰队和中国潜艇返回各自的基地之前，中国还匆忙派出一些歼 6 式战斗机，让它们从美国舰队旁边飞过。后来，美国官员对这次事件轻描淡写，中国的受到控制的传媒却猛烈抨击美国对那艘潜艇进行“骚扰”和“无理纠缠”。这些报纸问，美国为什么要“从美国大老远跑到中国大门口”来活动？（注 8）后来，就在美国人极力淡化这件事的同时，中国的一位官员在北京的一次气氛本来很友好的宴会上抛出一句让人无言以对的话来。下一次再发生这种事，他说，中国将下令飞行员“毫不留情地开火”。（注 9）

简言之，当时的情况虽很糟糕（到 1996 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对峙时，情况就更糟了），但看来这还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召开 1994 年的北京会议，也不能解释表明中国在对美国采取一种几乎比自两国于 1971 年恢复直接接触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为敌对的态度许多其他迹象。这次黄海事件发生在那次北京会议之后，所以，这两次事件看来是相同的根本原因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互为因果。几年前，在中国于 1989 年镇压了由学生带头的争取民主示威之后，在人权问题上发生的冲突比这时要严重得多。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不时发生。虽说最惠国待遇问题让中国特别不舒服，但看来光是这个问题本身还构不成这个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在秘密会议上猛烈指责美国搞干涉和颠覆的理由。

中国的强硬言论和像黄海上发生的那种事件与其说是对一种暂时局势作出的暂时反应，不如说是中国对美国的态度的根本变化的结果。对美国使

用“霸权”、“颠覆”和“干涉”这样的字眼，这标志着中国战略考虑的一种变化。以前，北京把美国的力量看作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的；现在，它已认定美国的力量是一种威胁，不仅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且威胁到中国逐步增强力量和在美国发挥最有影响的作用的计划。总之，中国已经决定：尽管中美两国之间有贸易往来，有外交接触，有技术转让，尽管在人民共和国开了许多麦当劳汉堡包店和肯德基炸鸡店，甚至尽管两国之间仍然存在有限的合作，但美国是中国在全球的主要对手。

这种思想上的变化是本书论述的核心。以非常具有现实政治特点的方式考虑问题的中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势力范围、均势和争夺支配权的斗争。这是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一直对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抱有好感的原因之一。基辛格说过，国际关系中只有三种可能性：均势；一国居于支配地位；混乱。道义原则、良好的意图和友好的感情在对世界的这种看法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即便为了顾及舆论而用上述字眼来表述政策和抗议也罢。在中国看来，它同美国之间的明显斗争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决定世界的面貌。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这是很难理解的，也确实有许多人，包括不少中国问题专家，不相信这一点。在中国问题上，有一派意见对于战略对抗之说不予重视，而倾向于把两国的分歧看作暂时的、反常的，是由于美国的前后不一和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道德说教引起的，认为这些分析可以用精明的、非说教式的、前后一致的外交活动（实际上，这种外交活动通常包括对中国人作出单方面让步）来弥合。许多分析家会争论说，中国在1994年发表的那些言论是对双边关系中的暂时倒退作出的一种反应。同样，他们争论说，像张万年总参谋长发表的那种讲话不过是试图夸大外部威胁，以便在国民预算中为军队争取稍大一点的份额——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将军们常爱干这样的事。

这种分析的唯一弊病在于，它既忽略了中国领导人说些什么，也忽略了他们在为同美国的长期冲突作准备方面做着些什么。例如，显然没有多少人注意中国是正值美国官员忙着宣布两国关系有了很大改善的当儿采取这种态度的。1996年7月，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到北京去同中国领导人举行高级会谈。在此之前，他曾宣布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有了引人注目的缓和，前景很光明。中国主席江泽民将访问华盛顿；比尔·克林顿——假定他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将访问北京。无须说，鉴于这样一种气氛，美国人对这些发展自然是兴奋莫名，把它们看作一个转折点，一个突破。中国方面却没有发表这类热情的言论。实际上，过去几年中，某种外交姿态在美国报刊上引起一些关于改善关系的议论，而中国报纸则刊登具有强烈敌对意味的反美社论，这已经成了常有的事。正当美国人在莱克访问后变得乐观起来的时候，中国的《解放军报》却向中国人民发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像中国的受控制的传媒中向来的做法一样，该报的文章是经过字斟句酌的：

在霸权野心的驱使下，美国日益显示武力。美国一再对中国制造事端，干涉中国内政。它还纵容台独势力。（注10）

与此同时，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段话：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称霸世界，不容许在……欧亚大陆上出现一个威胁美国主导权的大国。

因此把在它想象中最可能向它提出重大挑战的国家视为主要对手。（注 11）

从中国上层统治集团的角度来看，这种指责是符合实际的。50 年来，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亚洲占据的优势实际上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由于日本受到宪法的限制，只能保持一支防御性力量。中国又是处于贫穷羸弱状态，美国没有任何有能力向它的最有影响力地位提出挑战的竞争对手。它扮演的保证东亚均势的超级大国角色实际上是没有争议的。如今，一个比较强大而且自信的中国的确威胁着旧有的秩序，一种使大多数亚洲国家——近来也包括中国自己在内——得以专注于经济发展，而军事开支的负担则大体上由美国纳税人承担的秩序。但是，这种状况存在已久，中国从未有所抱怨。到 1993 年或 1994 年乃至 1996 年，美国在亚洲的力量一直没有加强，在军事上也没有增强咄咄逼人的态势。它没有给中国造成新的威胁。因此，北京讲话调子的变化一定是反应了一种变化，不是美国的行动的变化，而是中国对事情的看法的变化。《人民日报》的那篇社论道破了这是一种什么变化：“一个威胁（美国）主导权的大国……在欧亚大陆的出现。”中国这家受党控制的官方报纸对于未来超级大国冲突的性质的论述不可能比这更明白了。从中国的角度看，美国支配亚洲本来就是不可取的，这个时代应当逐步结束。中国领导人这样自问：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由中国主宰的这个地区内，为什么要由遥远的、缺点很多、自私自利的美国充当霸主？根据我们的观察，现在，整个北京领导层都接受了这个问题所代表的观点。北京存在的分歧是策略上的，即包括许多经济部门的人士和负责外交的人士在内的稳健派鼓吹在今后 10 年采取一种非对抗性政策，以避免军事冲突和维持中美贸易关系。军队和安全部门中更具鹰派特征的反美派则主张立即采取更强硬的反美路线。不过，就连北京的“鸽派”也承认，中国的在亚洲取代美国力量的目标未来很可能使两国发生冲突。中国比美国更明确地承认这一点；美国则更执著于同中国合作而不是同它对抗的观点。个中原因，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

在我们于 1996 年对中国战略思想家进行的采访中，他们毫不掩饰这样一种共识：中美两国已经成了竞争对手，而且这种竞争将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而加剧。设在北京的中国战略和管理研究会的一位资深分析家说：“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影响到美国的支配角色。……今后 15 年内，美中之间不会有根本的冲突，但是，15 年之后，根本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一位成员，是这样说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人没有好感。”

中国至少有一派意见主张动作要快，认为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即趁它尚未被美国或一些为回应中国的挑战而组建的地区性联盟封锁的时候——确立自己在亚洲的支配地位。这是 1993 年作为仅供高级官员参考的内部文件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国军队能打赢下一场战争吗？》的书的主题。这本极其说明问题的书阴差阳错地发行给了北京的一家书店，被一名美国人买到了。书中包含着官方讲话所回避的那种言论，关于迫使美国承认中国的支配权的目标在这本本来是不供公众阅读的书中作了明白无误的表述。

“2000 年之后，亚大地区很可能逐渐成为美国的战略重点，”该书告诫说。它主张趁着美国人把精力放在别处的时候现在就行动。该书的作者们声称，冷战刚结束的这几年是一个将持续 10 年或稍长一些的过渡期的开始。“换

句话说，从本世纪末到下世纪初，世界军事对抗的主题将是全球各地的局部或地区战争。因此，谁能在这个过渡时期取得主动，谁就能在未来的军事秩序中获得决定性的地位。”这个结论所依据的假定是：各国为争夺支配权而不断进行斗争，这是国际秩序的特点；中国必须加入这一斗争，而它的主要敌手必定是美国。这一假定是符合人们已经知道的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思想的。

“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一度被‘三大国’关系掩盖了。苏联解体后，现在又逐步显现出来，”书中说，“专注于各自在亚大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中美两国将始终处于对抗状态。”（以上两段中的引语系据书中英文译出——译者注）（注12）

以前，中国的言论中很少这样明确地谈到美国是中国的战略敌人，但是，美国是敌人的思想决非自今日始。诚然，以前有过中国报界对美国作友善报道的时候——例如1979年数百名中国记者陪同当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他的历史性访问的时候。但是，美国对于中国向来是成问题的，比大多数美国人所意识到的更成问题。我们总是被用某种方式证明为颠覆思想和放肆行为、色情、毒品、社会腐朽的源泉，是对中国报界常说的“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威胁。但是，当中国在90年代中期开始把美国称作不仅是道德上的敌人，而且也是一个战略上的威胁、一个敌对国家的时候，这就是把调子提高了一档。美国被中国官方传媒正式定为全球敌人，这是值得注意的。要是不理会中国说我们什么话，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的评论尽管有时夸张得荒谬，确实有些自我解嘲的味道，但却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的真实想法。

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态度有时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是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界定性要素，也肯定是北京时常发生的权力斗争中的一个因素。有关这一点的最重要的例子是，在70年代初，党的主席毛泽东作出的与美国恢复关系的决定就是与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同林彪的生死斗争相联系的。那时，世人大都把国防部长林彪视为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是他把毛泽东的小红书变成了全国的圣物，使“伟大舵手”成为自斯大林的俄国以来不曾有过的那种大规模个人崇拜的对象。事实上，林彪在树立对毛泽东的崇拜、在先是煽起继而镇压文化革命动乱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已使他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权力，致使毛泽东本人的权力有黯然失色之虞。

但是，林彪在意识形态上是个激进派，这就决定了他把美国看作中国的主要敌人。因此，毛泽东在1971年作出的同尼克松政府建立接触、邀请美国总统访华的决定对于林彪是一个直接的、简直是摧毁性的打击。后来发生的事情至今还是个谜。看来是林彪发动了旨在推翻毛泽东的未遂政变，政变失败后，他试图逃亡苏联，终因飞机坠毁——或者是被击落——而丧生。不管是哪种情况，总之是林彪知道打开对美关系意味着他的权力的终结，也意味着共产党中国历史上激进的、反西方的时代的结束。

当然，毛泽东也是一个激进派，他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但是，他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对本国人民控制最严厉的主要统治者。毛泽东与其说是一位政治领导人，不如说是一位活着的神，是一样人人都得顶礼膜拜的国家宗教的主要偶像。看来他相信——尽管他这样相信是错误的，而林彪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他在战略均势中可以利用美国对付苏联，也可以用美国这个大棒摧毁林彪，而又不致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可信性。

然而，事实是，同美国建立联系使得中国的生活性质本身发生了变化，

并给北京政权造成了一种持续的窘境。这种窘境在宣传中也反映出来了。中国一直想从美国那里得到好处，但是，它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将面临自己的权威和权力受到损害的前景。美国作为一个实体、而不是作为一个遥远的意识形态抽象物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存在，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的共产党权力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美国在中国是具有巨大吸引力的，不仅对普通人是这样，对中国上层人士也是如此。在中文中，“美国”这个词是“美丽的国家”的意思。千百万中国人把美国看作慷慨而充满机会的国家。持不同政见人士从美国的榜样中受到激励。那些统治中国的官僚们自己也因同美国人做生意发了财或者送自己的子女到美国留学，即便在美国和它的影响被描绘成邪恶的时期也是这样。

但是，对于决定中国政策的那个自我挑选的诡秘集团来说，中美关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美国崇尚的自由、受限制的政府、不受限制的文化创造、法治以及政治、性关系、音乐、舞蹈和电影的不受妨碍的自由表现等价值观，会破坏中国政府的地位与合法性。这个政府代表的大体上是与美国所代表的截然相反的东西——是纪律而不是自由，是控制而不是权利，是传统而不是创新。特别是对于一个正在借助于民族主义作为控制权力的手段的中国政府来说，美国是一个随时可以利用的天敌。

因此，即使是在两国正式关系不错的情况下，中国的宣传机器也把美国当作一个道义威胁来对待。例如，1979年秋，在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那次庆祝性访问之后，中国政府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美国道义与物质影响——给它起的代号是“精神污染”——的宣传运动。下面这件事大概不是偶然的：两国建交后没过几个月，中国发生了强大的政治抗议运动，亦即近年来好几次这样的运动中的第一次。这就是北京的民主墙运动，其中心是距中国高级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中南海不远处的一条主要大街的一段。当时，官方的主要宣传口号之一是号召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和军事现代化。但是，在民主墙上，一位名叫魏京生的年轻电工贴了一张大字报，呼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即实行民主。魏京生说，没有这一条，其他几个现代化都无法实现。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民主墙造成的问题可以追溯到美国的影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美国不费什么力气就能对中国的秩序、稳定和中共人民服从权威的习惯产生有害的影响。

中国为抵制美国的影响、警告人民提防这种影响所作的努力通常不能直接采取反美的形式，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期是不能那样做的。不能提出“抵制美国民主的恶劣影响，抵制美国自由的样板”之类口号，而要用提醒人们防范“精神污染”或“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像中国报刊近些时候所提的“全盘西化”等言词来传递反美信息。这些宣传运动据称是针对——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色情作品、犯罪、毒品、卖淫和贪污受贿的。其根本的目标则是美国，是美国所树立的样板。

实际上，如果说中国抱怨美国的新闻报道只强调消极的东西，同样的抱怨也适用于中国对美国的报道。这类报道全是有关侵犯人权（例如侵犯墨西哥移民的人权）、社会分化、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离婚率高、焚烧南方的黑人教堂、吸毒现象的消息。“更加使人不满的是，本身的人权记录很差的美国却蛮横地批评许多别的国家。”登载在英文《中国日报》上的一篇典型的文章就是这样写的（注13）。1996年的另一篇综合各种报道的文章指责美国是“当今世界进行过大规模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的国家之一，”被

用作试验的人中有数千名儿童，主要是黑人儿童。（注 14）

有害的文化影响是另一个题目。“某些敌视中国的外国势力和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从未停止过他们对中国的渗透和分裂活动，”1996 年的一篇典型的文章在谈到“殖民主义文化沉渣泛起”的时候这样说。文章说：“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注 15）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说，美国“正处在相对衰落时期，国内问题越来越严重，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逐渐减弱。”（注 16）中国的《求是》杂志在其 1996 年 3 月号上发表的评美国压制中国的野心的社论中说：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西化”和“分裂”活动不会改变，那些势力很大、串通一气的野心家不会放弃他们遏制中国的图谋。……他们阴谋摧毁作为社会主义堡垒的中国，使中国处于屈从的地位。（此段引文，系按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 17）

在考虑中国官方对美国的态度从 80 年代末期开始发生的巨大变化时，必须牢记美国对中国生活的影响所具有的颠覆性质。回顾一下主要领导人的言论，研究一下那个时期的文件，就可以看出中国国内就应当对美国采取的正确态度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也就可以把那场斗争的各个阶段同中国及其他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整个局势中的头一个要素是最为明显的：随着苏联的解体，美中两国都感到自己可以比以前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在 1972 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苏联正处于其力量的巅峰。这对美国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但它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因为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同它也靠得更近，而且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之间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一带发生了武装冲突。然而，到了 80 年代中期，由于俄国人陷在阿富汗战争中不能自拔，经济上又困难重重，苏联似乎已不再那么具有威胁性了。而且，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视察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译者注）期间发表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这是他那个以失败告终的挽救苏联使之免于崩溃的计划的一部分）。他说，苏联正在向中国伸出橄榄枝。在彼此交恶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曾是中美接近的基础的中苏裂痕显示出了将要愈合的迹象。

这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当时中国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的未来在于同美国紧密合作，另一派则把美国人视为今后中国实现自己雄心的障碍。中国的两位主张现代化的自由派人士——总理赵紫阳和共产党书记胡耀邦惟恐同苏联过于接近，因为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体现了他们正谋求在中国加以改变的东西。相反，他们论证说，中国应当继续倒向美国，因为美国与苏联形成鲜明对照，它有钱，有市场，也有技术来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建议却正合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心意。邓小平主张同苏联修好主要是为了使中国能减少北部边界为防范苏联可能的入侵所需要的庞大军费。反正，到 1987 年，胡耀邦被整下去了，赵紫阳也因为试图削弱共产党的权力而受到抨击。邓小平推行他的等距离战略的道路开通了。他的算盘是：中国可以同美苏两国部保持友好关系，挑动它们相互争斗而自己坐收渔利。

但是，一些重要事件的发生打乱了邓小平的计划，最终导致美国成为中

国的主要敌人。一个是 1989 年在北京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另一个事件是苏联的实际垮台和解体。第三件是 1991 年海湾战争期间在击败伊拉克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美国技术实力。下面依次谈谈这几个事件： 天安门事件：1989 年学生占领天安门事件的声势之大，时间之久，使中国领导层深感不安，也产生了好几个后果。后果之一是赵紫阳总理（他大概是近些年中最亲美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等温和派领导人被撤职。另一个后果是强硬派认为示威者——他们相信示威者的目标是推翻共产党——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美国的启发。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并没有错。曾记否，那次运动的象征是学生们在受到军事镇压的仅几天之前在广场上树立起来的“民主女神”（基本是“自由女神”的复制品）。当中国对这场运动的镇压在全球引起极大的负面反响时，北京认为是美国带头掀起了谴责中国的大合唱。当时布什政府宣称中断同中国的一切高级接触，并允许所有侥幸逃出中国警网的学生领袖在美国避难。强硬派明白表示，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咎于邓小平向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敞开中国大门的政策，因为正是美国人把有关民主的有害思想带进中国来的。

苏联的削弱及其后的崩溃：俄国的削弱使北京摆脱了同美国的战略关系的束缚，但北面这个共产帝国的崩溃也带来了一个教训。政治改革，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所容忍的自由辩论以及他愿意弱化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竟导致了苏共被推翻。中国共产党不愿步其后尘。他们感到，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宽容是要丧失政权的。戈尔巴乔夫在作出太多的让步之后，被抛到一边，连累整个党也被打垮了。自 1979 年民主墙运动以来，整整 10 年中，知识分子不断地闹事。不仅如此，天安门运动还得到政府和党的官僚体系核心中的一些人——例如《人民日报》的一些记者——的同情。于是，这个政权就想一劳水逸地打掉这个不幸的倾向，免得学生组织与其他人团结起来，支持像赵紫阳这样的人物，把他扶上台，就像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权时，莫斯科的示威确保了胜利那样。

海湾战争：全世界的军事和战略专家都强调中国对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显示的可怕的技术和军事实力的重视。例如，中国人明白他们落后得有多远；明白美国用来对付伊拉克的那些武器也可能用来对付中国，如果中国同美国发生冲突的话；也明白如果它自己想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诸岛造成可靠的威胁，或者更重要的是，如果它有朝一日要采取军事行动“解放”台湾的话，它就必须掌握

*事实上，据后来披露，布什于次日便派了两名高级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到北京去向中国领导人解释美国的行动。——原书脚注。美国人所显示的那种技术。海湾战争使中国军事现代化有了新的侧重点，其中包括 1996 年 3 月在台湾附近发射的那种精确的中程导弹的部署。

这些彼此间隔不到两年的事件使中国上层为之震惊和震撼。他们掌握的权力和享受的特权都仰赖于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而今，这个制度似乎遭受着内外夹攻。最重要的是，这些划时代的巨变加强了领导层中强调要对世界其他国家采取高度民族主义、甚至沙文主义立场的那些人的力量。中国领导层中向来有那么一种怀有仇外情绪的人，这种人在中国人称之为老革命的那批人中特别有势力。所谓老革命，指的是最初的那些干部，他们参加过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长征，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放弃毛式社会主义、大量接受外国方式的做法感到沮丧。

老革命同军队内部的势力、中国庞大而有权势的安全体系以及其他一些每当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就感到异常荣耀的人构成了一支对几乎所有外国的和资本主义的东西都极为怀疑的政治力量。几乎每周都莅临北京的那些外国或外国公司的代表团是看不到这些人的。这些人过去整过他们的一些同胞，理由只是那些同胞与外国人有过接触；这些人在内心深处相信外国人所带来的只是毁灭与道德败坏，他们一心要从中国身上赚钱并使中国始终处于羸弱和俯首贴耳状态。

这股势力在中国国内是一直存在的，尽管外国人基本上看不到他们。但他们确实存在，而且，在任何涉及或者似乎涉及中国主权、同台湾统一或者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们的影响都特别大。中国特有的那种爱国主义，前面我们曾称之为因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形成的民族主义，植根于那个漫长的、蒙羞受辱的世纪。在那个世纪中，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向中国广大老百姓兜售鸦片，在中国土地上归他们所有的飞地上受到他们自己的警察和法庭的保护，还常常出兵中国以惩罚稍有不顺从的中国人。中国人还动辄见罪，常把别国可能比较容易泰然处之的分歧视为对其国家尊严的侵犯，因而需要作出毫不妥协的反应。1992年，布什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因为台湾要想拥有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支比它大得多的空军的可靠的威慑力量，就必须保持一个现代化的防空体系。此项决定所造成的正是一种加剧中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局势。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笔交易对于维持亚洲稳定与均势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却感到这是对中国的国家概念本身的冒犯。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战略方面对它同美国之间的冲突的理解，与美国的一系列影响到中国国家尊严的言行——中国的保守派、老革命及军队一安全部门利用了这些言行——所激起的更带感情色彩的敌对情绪，是相吻合的。在美国，报纸读者和电视观众看到了中国的一系列令人着恼的行动，这使美国人对中国的标准态度发生了变化。在中美建交之初，当两国合力完成对付苏联力量这一艰巨任务的时候，中国曾得益于它在美国的良好形象。熊猫大概是这一形象的最好体现。那时，中国显得像熊猫一样可爱、随和、渴求友谊，在军事上不构成威胁，欢迎进行和平接触。一些电视和电影专题片帮助树立了这一形象——伊萨克·斯特恩制作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介绍大鸟在中国的游历的公共电视专题片；还有帕瓦罗蒂对中国的访问。在后面这部片子中，人们看到中国人站起来为意大利歌剧鼓掌的场面。

然而，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发生之后的数月和数年中，这一形象被另一种形象取代了：1989年6月4日，一位勇敢的年轻人面对一长串中国坦克独自站在长安街上。国会和民间团体批评了中国人的许多不端的行为和危险的政策，从向美国走私AK—47冲锋枪——这些武器运到美国后，可能已经落入了黑社会和毒贩手中——到中国不遵守防止核扩散条约等等。

换句话说，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比较恃强的和野心勃勃的角色，引起了反应，特别是美国的反应。这种反应表现为好几种形式，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它们刺激了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在私下里，中国领导人想必担起心来：美国人时常讲的一些话可能证明是真的。鼓吹同北京“接触”而不是对它实行“遏制”的人大都预言了一种中国领导人最害怕的结局：两国接触的增多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化和共产党的垮台。事实上，这也正是使中国上层统治者最感惊恐的结果，也是他们不惜以镇压学生来避免的结果。

小结：中国的行动是由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引起的，是由压制不同意见、维持共产党的权力的需要引起的，是由中国地区野心的增长引起的，也是由中国对财富与力量的肆无忌惮地奋力追求引起的。这些行动在美国造成了不利的反应。持续不断的批评反过来又导致中国反美情绪的高涨，即普遍认为美国怀有要使中国继续处于软弱无力、贫穷和屈从状态的不可告人的动机。

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反美情绪成了北京党政圈子内的主流。官方传媒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提醒人们防范“和平演变”——即所谓美国阴谋利用多元化和中国经济中不断壮大的市场部分所享有的自由来颠覆共产党的统治的代称。当时曾在党政官员内部传阅一些激烈反美的文件。中共宣传部和外交部于 1991 年末联合起草的一项抨击美国的秘密的十点文件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文件警告中国官员对于同美国的任何形式的接触都要倍加小心，指责美国企图通过削弱中国和其他国家来达到称霸全球的目的。（注 18）

尽管中国方面作出这样愤怒的反应，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却竭力节制领导层中许多人的反美情绪，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也的确拥有足够的力量来防止反美情绪在中国领导圈子内居于支配地位，1992 年，邓小平用好几周的时间对中国南方进行了受到广泛宣传的视察，宣称经济改革不仅应当恢复，而且应当加速进行。许多人相信这次视察挽救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界相对开放的政策。到 1992 年底，他利用他的巨大声望使他的观点在党内占了上风。他说服北京及地方上的领导人们相信，使他们肯定能保住权力、避免重蹈苏联各级领导覆辙的唯一办法就是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唯一办法，他说，就是快速向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即便这意味着从同美国对抗的立场上退缩，那也只好如此，因为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和重要的投资和技术来源。那一年年初，邓小平宣称，“中美两国意识形态不同，但它们的根本利益是没有冲突的。”（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 19）

在这场斗争中，邓小平赢得了一半胜利。中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接受了他开出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处方，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继续力主实行同美国对抗的政策。1992 年 8 月，当美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的消息传到北京时，邓小平抵制同美国全面对抗的要求的做法使军队领导人特别失望。新当选的比尔·克林顿宣布他将以贸易为武器迫使中国改善人权、走向民主之后，邓小平仍不愿意在意识形态上对美国宣战，这使左派也感到沮丧。既然左派和军队都认为敌人是美国，这种看法成为中国官方政策——尽管没有宣布——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到 1993 年 4 月，潮流显然变得对邓小平不利了。当时，116 名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上书他和党的书记江泽民，要求结束中国的“对美国忍让、克制和妥协”的政策。（注 20）信中对中国没有就美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和克林顿的贸易威胁进行报复表示遗憾。“五一”节前一天，数十名人民解放军将军签署了致邓小平的另一封信，信的题目是《采取行动，反对霸权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讹诈与挑战》（注 21）。一份阐述军人感到不满的理由的文件争论说：“中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政策不同而长期存在冲突。因此，事实将证明，彻底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

（注 22）后来，到 1993 年 10 月，公安部门也加入反美大合唱，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反间谍会议。会上，官员们指责美国以及据称是其同谋的日本和台

湾在中国境内建立了广泛的间谍活动网。公安部长贾春旺在会上说：“美国利用敌对分子、外交官、记者以及学术人员的交流从事间谍活动。”（此话以及上下文中一系列的“引语”均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 23）

在 1993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开始举行的秘密的非常会议上，把美国定为中国正式敌人的势头又增强了。一连 11 天，分别代表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及文职思想库的中国顶尖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专家们关在北京的京西宾馆内商讨中国的宏伟战略。香港的《争鸣》杂志刊登的一篇有关这次会议的详尽报道被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是准确的。该杂志常被北京的一些政治派别作为透露消息的非官方机关刊物。这则报道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中国共产党把谁当做它在国际上的大敌？是美国。”

这次会议的最后报告中包括为中国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长期战略政策拟定的一个大纲。报告说：

从现阶段到下个世纪初，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它对中国的战略是通过经济活动和贸易来控制 and 制裁中国，迫使中国改变它的意识形态方针，使它更倾向于西方；利用交流和宣传向中国上层渗透它的意识形态；向中国境内境外的敌对势力提供金钱援助，等待时机挑起动乱；支持和鼓励西方集团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借以达到它们的政治目标；制造中国威胁亚洲邻国论，在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国家之间散布不和；以及操纵日本和韩国，使它们奉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注 24）

这次秘密会议上取得的共识也在报告中得到反映，这就是：中国应当通过同第三世界国家，最主要是同俄国结盟，来对付它的敌人美国。《争鸣》报道说，老一辈的军事领导人对于同俄国结盟特别热心，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年都是在苏联学习过的。不管怎么说，反正在中同对美国的敌视变得越来越明显的同时，中国一直在朝那个方向前进。1996 年 4 月，叶利钦到北京访问，同江泽民签署了一项确认以抗衡美国力量为目标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的宣言。到这时，俄国已经成了向中国提供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的主要国家了。这些装备和技术中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先进的苏—27 战斗机和“基洛”级潜艇。此外，数千名俄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现在正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自己的军事工业工作。

中国官员在秘密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在报刊中甚至被当做民众的意见反映出来。在一种针锋相对式的斗争中，中国把它自己干的许多事情怪罪到美国头上。1996 年的一些文章谴责美国把中国当做它的危害较大的垃圾的倾倒场。（这是一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歪曲，事实是美国把废纸运到中国的回收工厂去加工。）另一场宣传战是围绕美国对中国的香烟出口进行的。在那场斗争中，把中国人民历史上受到的屈辱同当今的仇外心理结合起来了。

“我们实际上是面临着又一次鸦片战争，”一位研究人员被引述说。他显然忘记了中国的国营香烟工厂生产着数十种品牌的香烟。“西方制造商通过一切可行的合法或非法途径向中国倾销香烟，这可以与 18（原文如此——作者注）世纪中叶的鸦片倾销相比。唯一不同的是，今天在中国的开放政策下，西方国家不再需要用炮舰叩开我们的大门了。”（注 25）

到 90 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机器和中国领导人的讲话表明民族主义的反美情绪的势头更猛了。出现频率最高的用以表述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有害战略的词是“遏制”（containment），它指的是一种旨在防止中国成为强国，使

它始终处于没有影响的羸弱和贫穷状态的政策。实际上，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指出的，“containment”在译成中文时所用的两个字，反过来译成英文中的“throttling”（扼杀）更准确。不管怎么说，中国开始把这个词当做一种通用的指责来使用了。对于美国采取的行动，只要是中方所不喜欢的，几乎一律扣上这样一个词。例如，1996年，当美国采取措施加强它同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关系的时候，中国新闻界就批评这些措施是“遏制”。就连美国同越南和印度加强关系以及美国抱怨中国对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也都被共产党的传媒贴上了“遏制”的标签。

1996年5月底或6月初，即在中美在台湾海峡对峙之后不久，《中国可以说不》很快成了中国近些年最热门的畅销书之一。据该书面世后不久我们在北京采访过的一些人说，这部高度民族主义的反美宣言反映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观点。在北京的控制严密的气氛下，由一些不知名的年轻知识分子写的这本书得以出版，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官方是希望它问世的。实际上，中国驻华盛顿首任大使柴泽民还为它写了前言”。这本书把美国描绘成一个傲慢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并敦促中国采取行动，其中包括以下步骤：

反击美国文化与经济帝国主义。

与俄国结成反美联盟。

抵制美国的小麦和其他产品。

要求美国对其使用火药、纸张及中国发明的其他产品给予赔偿。

宣称中国不仅宁愿不要最惠国地位，并且要对美国产品征收高额进口关税。

1994年初，面对党和军队领导人努力达成的反美共识，现已年老体衰、不能视事的邓小平退却了。他继续吁求对美国采取温和态度，因为美国的市场对于仍是邓小平的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他希望中国起码在它加强军事力量以便能够实现自己的国际目标的这个时期内把反美的调门放缓和一些。

这同反美派所希望的没有多少不同，尽管反美派在表达对美*这是此书谎言连篇的又一例证：《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没有柴泽民写的前言。——编者注国的不满时不大谨慎，而邓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更谨慎一些。一些美国评论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就对一名日本记者说过，看来，中国政府已经处在“那些希望同美国发生冲突的参与决策的人的影响之下了。……根据我的判断，舍此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注26）一年以前，汉学家奥维尔·谢尔写道：“许多领导人无耻地竭力煽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此作为取得合法性的替代手段。”（注27）专门报道中国政局的香港记者林和立说：“在邓后时代之初，一个缺乏合法性与权力基础的领导班子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民族主义’这张牌。”林和立接着说，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中国的传媒为什么把中国在同美国的贸易纠纷中捍卫自己的立场视作“维护国家主权与中华民族尊严”的斗争。（注28）

即使在克林顿政府向中国保证它今后不再把最惠国地位问题同人权联系起来之后，中国传媒愤怒的反美调子仍然没变。强硬派民族主义者无视邓小平的告诫，相信中国两个目的都能达到——既可以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做好与美国对抗的准备，同时又可以从与美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中得到好处。我们在下文会看到，他们的策略是复杂多面的，包括在美国大事游说、使用经济战手法以及一种强调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强调它与美国巨人相比比较弱

小的自我描述。接下来便是召开像 1994 年初在北京开过的那种全国性党的会议。中国是在做这样的赌博：它能够为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做好准备，尽管它在公开场合否认其最终目标。迄今为止，这个战略是非常成功的。

第二章“我们决不称霸”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

自毛主席的鼎盛时期起，“我们决不称霸”就是一个常提的口号。实际上，它是中国在经历了从激进的毛主义到邓小平时代的各个不同的政治时期之后仍在使用的很少几个口号之一。中国公开表示的立场一直是：它谋求的是发展世界一流的经济；保持军事力量只是为了防御；决不干涉别国内政。三十年来，中国一直保证决不首先进攻别的国家——只会在遭到别国进攻的时候进行反击。它发誓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它自称是一个正在艰苦奋斗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超级大国的能力或野心。

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即中国军官和战略思想家们至今仍在研读的那部以精辟的格言写就的《兵法》的作者，认为否认和欺骗是任何成功的国家保护自身利益的核心手段。用孙子这位中国的马基雅弗利（意大利中世纪政治思想家，他认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的话说，就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在分析中国的目标和雄心以及它们同美国的目标和雄心是否有根本冲突时，这个概念是不是依然有用呢？

中国对那些认为它有长远的称霸野心的人嗤之以鼻。不同意官方的那种把中国视为正在艰苦奋斗的羸弱国家的看法的人，被它的宣传机器指责为阴险的反华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以不正当手段、咄咄逼人的架势谋求“遏制中国”。因此，举例来说，官方控制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谴责它所称的“中国威胁论”，说它“荒谬绝伦”。新华社在 1996 年 6 月 27 日播发文章说：“中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外交所谋求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一年早些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邢世忠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它绝不会谋求霸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实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注 1）1995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向韩国议会保证说：“说中国强大了就会给其他国家造成威胁，这是没有根据的。中国永远不参加军备竞赛，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注 2）后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一位高级官员又讲了这样一番话：“经济建设将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它的安全战略是要保持有利于经济的环境并尽最大的努力去防止军事对抗，不论是在境内还是境外。”（注 3）

美国的许多专家相信这类说法，理由是，即使中国抱有支配整个亚洲的野心，经济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将一直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以至“中国威胁”将退居次要地位，即便在理论上不是这样，在实际上也将是如此。但是，对于这种乐观而天真的看法，人们至少有三个理由提出怀疑。第一点，中国现在正开始进入它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不妨称为恢复国家强盛地位的时代。第二点，中国是一个如此大国，自然也是一个强国，它一定会倾向于支配其所在地区，即使作为一项国策它并不打算这样做也罢。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采取的一些行动及它制定的一些战略目标暴露出它声称自己甘居第三世界国家的地位是言不由衷的。总之，中国历来对它本身的认识、它的人力物力基本状况以及它对自己的民族利益的估价这几个

因素合在一起，使得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处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关头：即中国由持续了两百年的民族衰落转入在国际上重新变得强大有力的时期。实际上，那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亚洲病夫，以至于它的贫穷羸弱已经不显得有什么不正常了。但是，在中国漫长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它都属于世界上最富最强的国家之列。不仅如此，在历史上，中国争取富强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它已知的整个世界之内取得最有影响的地位。中国一直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在中文中，“中国”一词的字面意思是“中央王国”），它周边的所有国家向中国统治者进贡，就像附属国向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君主进贡一样。但是，从18世纪末叶起，由于它的中央政府贪污腐败和软弱无力，也由于远处的国家（在这里指的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相对强大而充满活力，中国进入了一个衰落时期。这是它曾经陷入的衰落时期之一，这次衰落持续了将近二百年，经历了好几个动乱阶段。最末一次改朝换代时期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由扩张主义、殖民主义、技术优越的欧洲支配的新世界。为了迎接这一挑战，19世纪中叶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试图从内部改革帝制。根据为此目的发明的一个公式——“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中国在保留儒家政府体制和社会组织的同时，有选择地借鉴了技术优越的西方国家的一些东西。这次尝试失败了。中国在先是欧洲、后是日本的侵略面前毫无防御能力，于是，在1911年，腐朽过时的帝制被孙中山创立和领导的一场政治运动摧垮了。王朝被共和国、至少是被称为共和国的东西所取代。但是，这个共和国很快又成了国内分裂、外敌——特别是日本——侵略的牺牲品。

在本世纪的头25年内，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痛苦的结论：中国（用孙中山的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说，是“一盘散沙”）要想再度富强起来，非得进行深刻的变革不可。“中学为体”的思想让位于对中国的价值观本身的探索性和批判性的研究了。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的价值观鼓励惰性、对当权者唯命是从以及对事情采取不科学、不民主的态度。那个时期的巨大躁动的产物之一就是1921年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另一个产物是今天依然统治着台湾的国民党。国民党也是苏联在20年代培植起来的——直至它同共产党发生公开冲突。这场冲突至今仍未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终于摆脱了日本侵略者及欧洲帝国主义者的蹂躏，于是，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试图重新建立一种自由市场独裁制度，以此作为实现国家复兴的手段。但是这一努力被内战破坏了。后来，当共产党于1949年取得了胜利、大约50年来第一次使整个中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权统治之下后，又实行起中央计划体制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致使中国遭到苏联式的经济失败。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统治方式使党的政策变本加厉。毛泽东本是湖南省的一位农民，干革命起家，终于成了某种帝王式的人物。他生活在古代皇帝的禁宫内，终日被谄媚者包围，由他挑动的倾轧连绵不断。

毛泽东既是为了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也是为了消灭政敌而开展的无休无止而且越来越激进的运动造成了全国的混乱。报纸、杂志、电影和装到每座农家小屋的高音喇叭宣称国家在不断前进，经济在快速增长，农业大丰收，外交取得胜利，传播全国的喜讯——或者像那个无所不在的口号所说的，“争取更大的胜利！”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在3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经济上、技术上、军事上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在50

年的内乱期间，曾宣布过好几个“新”中国的诞生，亦即国家好几次获得新生。但是，国家的每一次新生都未能兑现它的领导人为它许下的诺言。20年代最重要的进步杂志叫《新青年》。国民党为振兴国家而作出的努力叫做“新生活”运动。共产党接管后，成立了新华社。毛派开展的宣传运动抨击“四旧”，又是赞扬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但是，事实上，毛泽东到了晚年是名副其实的旧东西的化身。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历史时期是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两度被打倒的邓小平恢复权力粉碎了左翼激进分子之后不久开始的。邓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大概也是像列宁、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和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中的最后一位。邓建树了这样一项惊人的业绩：放弃中央计划、实行真正有远见的经济改革，同时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国内的团结。邓允许建立一种混合经济，从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发展之一——实际上，自中国开始进行首批自由市场试验以来的这15年是整个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强劲的时期。70年代以后，那个已经用滥了的、业已变得没有意义的“新”字不再那么常见了，但是，事实上，到这时一个新中国倒是真的终于出现了。这个新中国是世界以往所不曾见过的，是一个共产党掌权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但却是一个正在变成经济强国的国家。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长期衰落的局面终于彻底结束了，它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显赫地位恢复了。

这里存在着一个看似大谬不然实则顺理成章的现象。在毛泽东执政时代，中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心要充当救世主、以征服世界为己任、使其他国家畏惧的那样一个国家，但那时，它事实上却是一个虚弱的巨人——只靠其幅员和意识形态来吓人，而不具备世界级的军事或经济力量，因而也不能对它疆界之外的事情发生影响。只是在中国摒弃了它的意识形态，接受了一种修正过的资本主义，放松了对其人民的控制并放弃了共产主义的那套救世主式的言论之后，中国才获得了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实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方对中国怕得要命的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是处于停滞的无所作为状态。西方欢迎中国的改革，认为这个国家会因此而变得比较温和、讲道理，与其他国家更相似，因而危险性也就会减小。殊不知，中国至此才第一次有力量威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

总之，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中国逐步具备了恢复其历史上的显赫地位的条件。先是消灭了外国的剥削，打退了外国的侵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对中国历史的伟大贡献在于，它完成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国内稳定的任务。共产党当政也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因为中国得以保护自己不受外国的干涉，这在一百多年来还是第一次。但是，只是在邓小平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潜力。鉴于这个国家的基本要素，它的这种潜力是巨大的。实际上，这些要素——幅员、人口和经济资源——在历史上曾确保了它的超级大国地位；将来，这些要素还将确保它的超级大国地位。

首先是它的幅员。中国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大洲。它巍然屹立在亚洲大陆上。除去俄国的亚洲部分，中国的面积占整个东亚的70%。它同朝鲜、俄国、新建立的几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尔、缅甸、老挝和越南诸国交界。中国的疆界从东北面的西伯利亚冰原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植被茂密的热带地区。它的境内有三大水系——黄河、长江和珠江——以及世界最大的沙漠之一塔克拉玛

干沙漠和世界最高山脉〔埃弗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者注）是中国和尼泊尔边界的一部分〕。中国甚至同那些它与之并不交界的亚洲国家也显得很靠近。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与它相距大概有数百海里之遥，但是，造成这个距离的是南中国海。大多数客观的分析家都猜测中国会对南中国海上的一些靠近印度尼西亚领海的小岛提出主权要求。倘若它如愿以偿，上述距离就将不复存在。

其次是海上。中国的航海史从那些有关勇敢的探险者、决心征服异族的庞大舰队以及胆大妄为的海盗船的故事中可见一斑。但是，那些探险者未能铺平帝国之路；那些海盗没有得到好下场；而前去征服日本的那支最著名的舰队则被日本所说的“神风”这个名称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度使用，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字眼——摧垮了。事实上，尽管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从南中国海的热带水域一直延伸到北面比较冷的黄海，但它以前称不上一个海上强国。它不懂得英国人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已明白了的道理：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

现在，由于中国认识到要成为世界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就得利用自己优越的地理位置，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近来采取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利用一种使它能控制亚洲重要海运线和贸易通道的海上地理环境为目的。换言之，中国的地理位置和现代世界的性质驱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海上强国，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中国对内中口海上的一些边远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这些岛屿中有一些距它的海岸线甚远，而且现在被别的国家占据着，那些国家也无意让出来。这件事关系到石油勘探和捕鱼基地，也关系到向世界上过往船只最多的海运线之一——例如日本和东亚另几个“小龙”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的石油和原料大都是经由这条海运线运送的——投送海上力量的能力。正如科林·格雷在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所说的，陆海结合能使中国具备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基本条件：

正在出现的中国这个超级国家地处欧亚大陆，亦即历史上的“心脏地带”的东部“边缘”，而它的漫长海岸线控制着日本这个重要海运、制造业兼贸易帝国的主要海上交通线。中国既有实力，又有优越的位置。与那个无人惋惜的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国不是一个陆锁国，即使美国采取深谋远虑的遏制政策也不能把它封锁起来。……由于它的幅员、人口、社会习俗与地理位置等原因，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潜在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是怎样估计都不为过的。

（注4）

此外还有人口因素。人们常说，中国人口约为13亿，远远多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比位居第二的人口大国印度多4亿；是美国人口的4倍，俄国的5倍，日本的10倍。世界人口的大约20%居住在中国，还有数千万华人散居在东南亚各国和美国。正是这些才华横溢而又注重勤奋与成就的人使得世界上这块叫做“中国”的广阔土地具有极大的分量，尤其是在他们40年来第一次欣喜地摆脱了毛泽东时代对他们的行动的严格限制之后的今天。这件事不仅对中国国内的实力，而巨也对它在国外可能施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来自虽然侨居国外，但是在文化上和经济上仍然心向祖国的大批华人——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些华人，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那些拥有经济实力的华人，就是塞繆尔·亨廷顿等人所说的“大中华”的一部分。这个“大中华”指的是一种没有明确宣布的共荣圈，在这个共荣圈内，富有的华侨成为大力同中国增进经济联系的核

心。（注5）

这种情况会带来财富，或者会导致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到下世纪初的某个时候，中国几乎肯定会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其力量大大超过它的任何一个邻国，而且，在绝对意义上——尽管不是在人均意义上——也会超过美国和日本。这并不是说，现在中国按人均计算已是一个富国——实际上，就人均而言，它仍是一个穷国（注6），而且，中国正为巨大的失业、工业效率低下、平均教育水平低、人口过多以及持续贫困，尤其是自然条件不佳的农村地区的持续贫困问题所苦恼。但是，中国是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它的人均数字依然很低，它的绝对数字也会使它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不仅如此，自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以平均10%的年率增长，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望尘莫及的。而且，*据亨廷顿说，在印度尼西亚，华人占总人口比例不到3%，但是握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左右；泰国的华人占总人口10%，但该国10个最大的财团中有9个为华人控制，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是华人创造的。——原书脚注香港为中国提供了世界上最大最富的集装箱港口和亚洲最重要的空运中心之一。如果中国再把台湾收回来，那将把这个居世界第19位的经济实体加到它的已经非常可观的总数中去。台湾的对美贸易有70亿美元顺差，它拥有许多高技术工业，还有2100万受教育程度极高极富创业精神的人口。

但是，即便没有台湾，未来的中国的贸易额也将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它的价格低廉的消费品的产量也将是最高的，而且它还将拥有许多迅速发展的工业。中国的辽阔国土盛产一些重要的原料，其中包括石油、铁矿和煤炭；它声称是其领土的南中国海的一些地方蕴含丰富的石油。中国的污染程度也将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实际上，污染将成为中国经济大规模发展的一个直接结果，这一问题确是一个潜伏着的国际问题。迄今为止，中国一直不愿意花钱控制污染，现在已经导致了一些灾难性的后果。将来，中国燃烧的碳氢化合物、释放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残留化学物质和工业废物将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多，给大气层、臭氧层和酸雨带来的后果不难预测。从更笼统的意义上说，中国经济，也像它的幅员、人口和近海的地理位置一样，将使中国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国家，不论它的政府是否把支配亚洲定为自己的目标。

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及其会变为一个富国的潜力，将来有可能使这个国家走上好几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一条道路是许多人（尽管不是中国领导人）满怀希望预言的，即，随着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它也会更加以民主和温和的方式行事，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依赖于国际秩序和稳定，它以咄咄逼人的或不计后果的方式行事的可能性会减少。而且也确有一些力量是不利于一个极权主义的中国无限期存在下去的：地方上独立的经济力量的增强及随之而来的中央政府的影响的减少；从外部世界涌入中国的大量信息；来自内部的要求民主的压力，包括地方官员的民主选举和全国议会的有所进步。一些议员实际上已有时对中央权威投反对票了。

另一仲可能性——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要比前者大得多——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影响促使它朝着更加咄咄逼人、更加无视国际舆论的方向前进。在下文中我们会清楚地证明，中国现在就已经在有效地利用它新近建立起来的经济实力，以不结合同或者转向其他市场相要挟，借以推行大国外交，特别是抵御时它的人权记录的批评。当然，中国将来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是无法预言的——就像在70年代中期几乎没有人能预言它到90年代

中册会成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贸易大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玩股票、各省派商业代表团到纽约和尼日利亚做生意的国家一样。但是，中国十分可能——我们要说是最有可能——成为某种社团主义的、军事化的和民族主义的回家，一个与墨索里尼或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有些相似的国家。这种法西斯主义除掉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中的优等民族论和武装救世论这两个成分。的确，由于当年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法西斯主义”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能太重了些。

不过，看来中国确实是在朝着 20 世纪初的法西斯主义所具有的一些重要特征的方向前进。把国家视为人的组织的最高形式加以崇拜，要求个人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幸福。军队成了国家最有权势的组织，它握有最高的政治权力——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它还建立了许多商业企业，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也成了有影响的势力。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党在继续实行统治，它控制着信息，要求国民政治服从。金融利益集团和国家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即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连锁董事会。高级政治领导人的子女们借此控制着国家的企业、军火制造公司和银行业务。在中国事务中，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受过伤害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意识是很重要的，这是指一种历史上遭受过的屈辱尚未平复的感觉，一种极度的、敏感的、防范心很重的民族自豪感，一种对外国人很强的怀疑心。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人和军队利益一致，都希望保持没有争议的权力，强调秩序，这种秩序是由一个庞大而且效率极高并与一个顺从的、毫无独立性可言的司法部门紧密合作的保安和警察体系来维持的。

中国还有其他一些特点。这些特点虽然使情况变得复杂一些，但并没有减轻它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和自信的国家性质。其中一个特点是，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并可能导致动乱和暴力活动。即便是暂时的、周期性的经济活动下降都可能进一步威胁一个其威望已经由于腐败和高压而严重受损的政府的稳定与合法性。一度廉洁贫穷的中国现在富得多了，但是，它现在也成了某种贿赂现象——即没完没了的送礼——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中国还有数千万到处流浪的失业者，他们往往是以前依靠农业社的救济而勉强糊口的农民，而今，集体农业被个体耕作代替了，他们在农村中也就无事可做了。整个国家的生活福利设施依然不足。大城市中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高档商店。但是，也正是在这些大城市里，人们在寒冷的冬夜排着令人沮丧的没有尽头的长队，等候挤满人的公共汽车，来把他们送回破旧、阴暗、脏兮兮的混凝土小房间里的家。

人们常常提到的证明共产党能够继续掌权的一个理由是，迄今为止经济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如果失败，或者即使是步伐放慢，后果就可能是政治骚乱，甚至是混乱。倘若经济停滞或政治衰朽，中国人民不会消极承受，而会继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去实现新近在他们心中燃起的对更好的生活的高期望。他们将大批地、往往是非法地移居国外——贿赂“蛇船”船主，以便把他们送到纽约或巴西。接着就会出现诸如国际毒品交易之类的非法活动的大泛滥。毒品交易在华南一些地区已经成了痼疾。此外，在以那些仍在非法制作盗版计算机软件和 CD 唱片的工厂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海盗行径继续存在的同时，还会出现旧式的、受到官方保护的海盗活动，现在，这种海盗活动已经成了靠近中国的海上的一大难题。普通犯罪活动作为经济改革的一个有害的伴随物也会继续增加，随之带来各种治安问题。

发生骚乱的中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难题会比处于繁荣稳定状态的中国带来的难题更可怕。这样一个中国更有可能被一个由军队和警察把持的极权主义政府所控制。而这样一个政权，由于需要煽动爱国情绪——把中国遇到的问题归咎于来自外国的“精神污染”、“遏制”或其他形式的侵害，在处理对外政策时几乎肯定会更加具有民族主义倾向，更加自以为是，如果不是干脆实行冒险主义的话。

无论中国今后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它的基本条件都确保它能取得地区超级大国的地位，不管它是否把实现这一目标当作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国策来对待。但是，事实上，取得超级大国地位，这就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国策，即便中国的宣传机器始终否认这一点也罢。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亚洲最有影响的力量。

说明这一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迹象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开支和它的军事野心，尽管许多美国分析家认为中国军队人数大多也太落后，永远不会成为对美国的威胁，大概连它的邻国也威胁不了。美国一派很重要的意见认为，中国在许多年内将没有能力采取旨在取得对台湾的控制权的成功的军事行动，更不要说威胁它的邻国、日本或美国了。

“中国并没有为获得力量投送能力作什么努力”，这是美国一位军事分析家对我们作的解释。他使用的这个军事术语指的是一个国家在远离本国国土的地方进行长时间作战的能力。“它缺乏运输手段，缺乏后勤能力，也缺乏交火力。”中国有许多喷气式飞机，但都陈旧过时了。它向俄国购买苏—27 喷气式战斗机固然是一个重要步骤，但这并没有使它具备一流的空中力量。它向俄国人购买了几艘“基洛”级潜艇，但是，它的海军规模很小，只有 15 艘驱逐舰和 35 艘快速护卫舰，而且海军的远距离补给能力很有限。这些舰只缺乏防空装备，所以，即使中国当真要采取海上行动，那也只能在以陆地为基地的飞机可以达到的范围内行动。显而易见，这也限制了它的力量投送能力。“从他们现在所花的钱看来，他们不像是在开展重大的军事现代化运动，”这位美国分析家说，“他们采取的是一种逐步的、低速的、比较谨慎的方针。”

这一论点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大部分没有说到点子上。中国在下个十年内不会成为一个可与美国较量的军事大国。但是，衡量任何国家的军事力量的重要已度部不是它的绝对力量，而是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亚洲已经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最有力量的国家了，而且它的力量还在迅速增强。它并没有受到来自任何邻国——这些国家几乎全都处于相对弱小状态——的令人信服的威胁，而且它的军费增长速度比任何其他主要国家都快。

实际上，苏联的崩溃已使中美两国处于相似的军事地位，尽管其中一国的地位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衡量，另一国是队地区的角度来衡量。鉴于俄国人已经不在话下——例如他们连车臣地方叛乱都镇压不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便没有敌手了。美国的技术、卫星、航空母舰和导弹系统使它的力量投送范围和它的威力都达到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仅有的另外两个本来有能力向美国的军事实力挑战的国家，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就使它们实际上被长期解除了进攻性武装。因此，随着冷战结束时苏联的崩溃，美同在国际上突然处于一种无人挑战的地位了。

上述情况，特别是日本军事力量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俄国力量的衰弱和财

力的枯竭，使中国在亚洲也占据了类似的优势。在亚洲，北京也突然变得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强大了。这是可能改变的。俄国可能再度崛起。日本可能重新武装。但是，至少在目前——几乎可以肯定在今后十年或更长时间内——中国将在亚洲占据军事上的优势。它是唯一部署有核武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就投入现役的运载工具的数目而言，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核国家，到 70 年代末期它在这方面就已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注 7）它的陆海空军人数是亚洲最多的，军费开支无论就绝对数额而言还是就相对数额而言都超过邻近的任何国家。换言之，由于中国在继续快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只有它将有能力在东亚向美国的力量提出挑战，也只有美国将具有那种能抗衡中国地区优势的影响。

虽然中国一向认为必须为争夺支配权而斗争，但是，近几年来，它进行这种斗争的方式有了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去世之前，中国战略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他的人民战争学说。那个学说起源于红军用以在中国取得胜利的那种战略和战术。到 60 年代，这个学说归结为以下三个相关的看法：中国面临的唯一的严重军事威胁来自苏联；苏联若进攻中国，其主攻方向将是陆上入侵；中国武器不如苏联，因此应当让入侵者深入中国腹地，然后再发起主要的反攻，使用较小的部队一点一点地把苏联军队打垮。中国把军事顶算中的很大一部分用在准备对付它所意识到的苏联威胁上。它的许多最精锐的作战部队都驻扎在中苏边界或中国的西南部和西藏，以对付印度和越南这两个同苏联结盟并由苏联武装起来的国家。简言之，当时中国受到一些不友好的国家的部分包围，那些国家的进攻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中国所拥有的进攻力量。

到了 80 年代中期，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发动入侵的可能性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中国卷入一场重大战争或核战争的可能性也很小了。与它交界的两个军事力量最强的亚洲国家——印度和越南（它们都曾与中国发生过短暂的战争，印度是在 1962 年，越南是在 1979 年）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它们最重要的盟友。据此，到了 80 年代末期，中国认定，今后的冲突不大可能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发生，而更有可能在靠近中国边界或中国海岸的地方发生。这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修改它的整个防务学说以及它的作战部队的组织结构奠定了基础。（注 8）

由于军费顶算太紧——1989 年以前尤其如此——这项工作进展缓慢。后来，在 1991 年发生了海湾战争。正如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戴维·香博所说，这场战争对中国的计划人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香博说他“在 1991 年春季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同中国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人员进行了多次讨论”。据他说，“海湾战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沙漠风暴’行动的军事性质和盟国的速胜使中国高级指挥人员惊叹不已。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曾预言美国的军队会陷入一场与苏联在阿富汗的遭遇相似的地面战争脱不了身。但盟军的战略和能力的每一要素都令人民解放军目瞪口呆，使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切地认识到自己是多么落后。人民解放军不得不面对现代化战争的各种要素：精确制导武器；潜隐技术；电子对抗手段；对军事目标的精确轰炸，把连带破坏减到最低限度；机载指挥和控制系统；空中加油；歼击机和人员的最低限度的损失；在反弹道导弹防御中使用卫星；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情报收集；预警和侦察；使用设在地球另一边的指挥部；使用反弹道导弹防御手段；大规模空运和快速部署能力；部队在沙漠条件下生存的能力；使用特别行动突击队等等。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见识

高技术战争，他们惊呆了。”（注9）

很快地，新的座右铭变成了“在未来的高技术条件下打现代比局部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都开始了采购新武器的工作。强调高技术武器投资的思想不仅为高级军官们接受，最高政治领导人除了支持军队现代化之外也没有其他选择。连武器研制者们也被誉为中国的英雄。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以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可以说比国家主席更重要）的身份同其他军委委员一道出席“首届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颁奖大会”，向军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表示祝贺。没有公布任何得奖者的名字，也没有说明取得了哪些技术上的突破，但是，显而易见，这是一次重要活动。（注10）

并非所有武器制造者都是中国人。据一位负责监视中国军队动向的美国高级军官说，美国情报机构在1993年前后曾竭力要查明在中国工作的前苏联最优秀的武器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不断增加的数目。那数目很难确定。最可靠的估计是，约有800人居住在中国，从事全职工作。还有许多人常到中国去，受聘担任顾问。此外还有留在俄国国内单独或集体为中国工作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

他们中有些人通过互互联网同他们的中国雇主联络，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给中国，对中国方面的要求作出回应。这位美国军官说，后面这两类人——即非长期居住在中国的那些人——最难统计。但是，他估计，他们的总人数大概在一万人上下。不论精确数字是多少，显而易见，美国制定应急计划的人员必须假定中国可以得到俄国的实验室中或它的武装部队的武器清单中任何与军事有关的高技术或先进武器系统。俄国的军界工业界集团中不乏军事技术方面的世界一流人才，他们突然之间成了就业不足、薪水低下的一族。如今，这个集团已经如此腐败，如此渴望金钱，以至于所有东西似乎都可以出卖了。

例如，1995年曾有报道说，中国特工通过向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注）附近的一个俄国基地的工作人员行贿的办法，得到了“成卡车”的计划和资料。那些资料都是与俄国两种最先进的攻击直升机——卡—50单座对地面支援直升机和卡—52双座教练战斗直升机——有关的。（注11）

这类武器采购工作对打局部战争的中国是有帮助的。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是，俄国政府无法控制它的最令人生畏的、最先进的战略武器被转让给中国的活动。1996年5月，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宣布，中国已经向俄国、可能也向乌克兰提出了供应“部分SS—18技术”的要求。（注12）这种射程为6800英里的高度先进的多弹头导弹的唯一用途只能是袭击美国。“我们坚决反对、而且一直坚决反对这种转让。”佩里说。（注13）俄国出售SS—18技术是违反美国同前苏联之间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协议的。根据该协议，SS—18导弹到2002年应当销毁。这样做也违反1987年的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根据该协议，27个国家应当遵守对于它们所能出售或转让的导弹或导弹技术的限制。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使中国拥有一种经过证明和试射的战略武器，这种武器曾是冷战期间盛行的核恐怖平衡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俄同人会不会真的把这种武器卖给中国呢？一位原本是要对报界否认佩里讲话中引用的信息的俄国官方发言人的讲话实际上倒是加剧了美国的忧虑。“就我所知，”副外长亚历山大·帕诺夫宣称，“俄国没有向中国出售

任何这类东西。”不过，他补充说，鉴于技术有可能从“非国家”来源泄漏出去，“此事需要审查。”（注 14）

“非国家来源”！根据苏联官方发言人所承认的，这种属于历来研制过的杀伤力最强的大规模毁灭武器之一的导弹，有可能已经落入俄国军界工业界集团内部的或者其活动不受政府管束的自由职业者的掌握之中了。

中国搜罗前苏联能够提供的所有高技术军事装备的成功努力反映了中国扩充军力背后的雄心。1996 年 7 月，香港一家以能够获取准确的中国内部消息而著称的报纸——《明报》报道说，中同最高指挥部门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从二十多年减少到十年左右”。

（注 15）这样的快速是颇为惊人的。但是，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看到的，中国能否“赶上”西方，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从军事上说，中国在东亚已经基本处于无人挑战的地位了，而且它的军费在继续以每年超过 10% 的速度增加。

它的军费究竟有多少，这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度防务开支是 87 亿美元。同美国每年花费的 2650 亿美元比起来，这个数字显得很渺小。美国总审计局在 1995 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中说，从 1986 年到 1994 年，中国的防务预算增加了 159% 但是，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实际增加幅度只有 4%。然而，总审计局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官方防务预算中没有包括它从出售武器中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商业活动中所获得的利润总额，也不包括由其他预算项目支付的重要武器采购的花费。”总审计局引用其他估计数字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实际防务开支为两倍或三倍于宣布的数字。我们认为，实际高出的倍数要比这大得多——其实应为官方数字的十至二十倍。*“北京公布的防务开支数字通常把西方国家防务预算中所包括的许多项目排除在外。”一位研究中国军队情况的重要学者说。（注 16）例如，它的官方预算中不包括人民武装警察的开支，大概是因为这支部队大体上只用于维持国内治安的缘故。但是，武警主要是由以前的军人组成的（这些军人之所以被撤编，是为了减少军队本身的人数），而且它起的是一支可在国际冲突中使用的唇备军的作用。官方预算中还不包括核武器研制费用和军人的退休金。1995 年，中国人向俄国购买了 72 架苏—27 喷气式战斗机，价值 28 亿美元，全部由国务院支付，不算作防务开支。（注 17）中国提供的数字还不包括研究与发展费用。例如，研制核武器的花费有一部分算在能源部的预算中，研制飞机的钱有一部分来自航空航天部。北京也不把它卖武器的进项算在内，尽管中国到 1988 年已经成了世界第六大军火商，仅在 1987 年至 1991 年之间就卖出了价值将近 80 亿美元的武器。（注 18）

中国的数字也没有把军队拥有和经营的工商企业获得的收益包括在内。拥有不为人知、来源大都未加说明的财力的中国军队已经不声不响地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据《结构投资者》报道，中国军队控制着“一个由大约两万家企业组成的松散的网络——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虚拟公司”。它“作为该国军队的不可分

*关于作者这种毫无根据的论断，请参看附录中糜振玉《笨拙的谎言——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文。——编者注。割的一部分在运作，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了中国的最畅销名牌。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司基本上上下受法律约束，经商的部队所享受的优惠往往使它们处于绝对商业优势地位。”（注 19）

要对中国的防务预算进行现实的分析，还应当把那个叫做购买力平价的因素考虑在内（就这一点而言，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预算进行分析时也应当这样做）。例如，中国的一名士兵的劳工成本相当于 100 美元，而五角大楼的能力相同的士兵的劳工成本为 3000 美元，这样说来，中国的可比开支实际上就是实际开支的 30 倍。从食品供应到钢铁到武器系统，样样都是如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国家规定的连生产成本都赚不回来的价格“购买”武器。确实，1995 年末中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防务白皮书声称，中国的防务预算中，有 68% 是用于薪饷、食品、军装、训练、设施的兴建和维修以及水、电和取暖（注 20），所有这一切，在任何西方国家都要比在中国贵得多。

中国用于军事现代化计划上的钱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计是把公布的数字乘以 3。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 1995 年得出结论说，中国的实际防务开支至少是官方公布的数字的 4 倍。（注 21）如果把人民武装警察算进去，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数字还得再增加，增至 5 倍。如果把购买力平价算得保守一些，我们要把这个数字再乘以 2，电就是 10 倍。中国官方公布的 1996 年军事预算为 698 亿元人民币，亦即 87 亿美元。（注 22）西方最保守的分析家会把这个数字乘以 3，即为 261 亿美元。这就已经接近于日本 250 亿美元防务预算的一半了。我们把它乘以 10，也就是说，中国每年的实际防务开支在 870 亿美元左右，这就差下多为美国军费的三分之一了。不仅如此，中国 1996 年的数字比 1995 年高 11.3%，1995 年比 1994 年高 14.6%。即使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这个增幅也是很高的。无论如何，不管是否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中国政府任何其他部门的预算都远没有防务预算增加的速度快。

中国防务预算的增加是近年来才有的事。在 1989 年发生天安门事件之前，由于邓小平握有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党的领导之下，它的预算一直低于其他一些部门的预算，包括用于经济发展的预算。实际上，邓小平于 70 年代中期复出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经历了文化革命和国防部长林彪政变未遂事件之后，毛泽东需要恢复对军队的控制。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邓小平在同毛泽东的几个排在前面的接班人进行的权力斗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已经使军队服从于经济增长的大目标了。从 1984 年至 1988 年，防务预算实际上是下降的。（注 23）

到 1989 年年底，军官们把军队在被党的领导人利用来粉碎天安门示威之后赢得的筹码拿来兑现，已经把上述趋势扭转过来了。自那以后，军事预算不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际上（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都在不断增加。到 1994 年，当邓小平已经因年老体弱而不能影响决策的时候，军队的政治权力进一步增强了，它在总预算中的份额继续获得实际增长，即使在预算的其他部分有所下降的时候也是如此。（注 24）

中国加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将兵力从 80 年代的 400 万装备不足的现役军人缩减成一支效率较高的现代化军队，设想到 1998 年减为 250 万人。（注 25）一些铁道兵、工程兵和基建兵在“转民”之后还在继续执行原先的任务，许多军人“退役”到了武警部队。不过，许多裁员还是真的，而且，正如一篇文章所说，这种裁员将“大大增加新武器，特别是高技术电子武器的研究费用”。（注 26）

总起来说，重点是在研究中国军队的西方分析家们所你的“精良部分”上，特别是核部队和导弹部队以及能把中国军事力量投送到距中国海岸越来越远的地方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例如，中国称为 M—9 和 M—11 的那

两种已被部署在面向台湾的福建省的导弹就属于这种力量。这两种导弹都是中程机动导弹，可从火车或卡车上发射，发射后可迅速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 1996 年 3 月向台湾附近发射导弹所带给人们的主要军事教训是，那些导弹的命中精度极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还在建立一些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的快速反应部队，其中包括“拳头”部队（这个名字表明了他们的攻击力量），即能够参加两栖作战和空降行动的快速反应部队——换言之，就是那种一接到命令就可以在外国（或台湾）海岸登陆或者可以伞降到东海和南中国海中有争议的岛屿上去的部队。这种快速反应部队在 1988 年有 1.5 万人，到 90 年代中期已经增加到超过 20 万人了。（注 27）

中国新的外向性军事态势的另一个反映是在中国沿海或沿海岛屿上修建新机场（以及改进港口设施）。这些新机场大大增加了中国军用飞机的续航距离。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例子是中国于 1990 年 7 月在南中国海上的帕拉塞尔群岛（即西沙群岛——译者注）中的伍迪岛（即永兴岛——译者注）上建成的 2600 米长的跑道。这个新建的空军基地上通常停着 30—40 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还有一些飞机库、燃料库和空对空导弹库。有了这个基地，中国的一些军用飞机就可以到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译者注）去作战了。（注 28）1994 年 3 月，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法厄里·克罗斯礁（即永暑礁——译者注）上架设了预警雷达装置，以便支持人民解放军今后在那个有争议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注 29）

有可能在南中国海参战的军用飞机中包括苏—27 飞机，那是中国在走投无路的俄国削价出售的军火市场上购买的首批武器。苏—27 喷气式战斗机是前苏联用来对付美国的 F—16 战斗机的。人民解放军空军先是得到了 12 架苏—27，那批飞机是 1992 年 6 月运到中国的。中国又精明地同俄国人讨价还价，答应再多买一些飞机，如果俄国人不但提供零部件而且向中国转让现代飞机技术、使这种飞机能在中国组装的话。1993 年，俄国人同意了。据说，在中国组装的第一批苏—27 飞机于 1995 年 8 月交给了空军。（注 30）到 1996 年 3 月，中国空军至少已经部署了 27 架苏—27。还有 60 架也已买下或组装好，但是其中究竟有多少架已经投入部署，尚不得而知。预定今后 10 年还要在中国再制造 150 架苏—27，由俄国提供先进的航空电子仪器、引擎和其他设备。（注 31）

部署苏—27 飞机反映出中国的目标是控制整个南中国海。这种飞机可以从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伍迪岛上的基地向南一直飞到斯普拉特利群岛并在该地区至少巡逻一个小时。（注 32）苏—27 飞机能执行远距离任务；如果有航空母舰或空中加油机的支持，它能把整个亚洲置于中国空军的袭击范围之内。一些迹象表明，中国可能正在设法购买或建造一艘航空母舰，而且它一直在争取获得空中加油能力。中国的空中加油飞机，连同至少 15 架有能力在空中接受加油的军用飞机，将在 1997 年投入使用，届时对中国的所有亚洲邻国而言，军事力量的对比都将发生变化。（注 33）此外，由于中国购买了 10 架俄制伊尔—76 飞机，它的空军的力量投送能力也将增强。伊尔—76 是一种大机身的运输机，可用作加油机、快速部署部队的空运飞机或者帮助苏—27 军用飞机提高作战能力的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

再说一遍，中国不仅已经具有了亚洲最大的军事力量，而且也是唯一部署了核武器的亚洲国家。它的中程导弹已经使得 1962 年与中国打了一仗的印度感到不安了。眼下，日本由于有美日安全条约建立起来的“核保护伞”而

用不着担心。在条约中，美国承诺在日本遭到袭击时前来拯救它。中国的导弹目前时美国也没有构成可怕的威胁。中国目前部署的远程导弹大部采用液体燃料，这就是说，它们最适宜用来进行报复性打击，因为使液体燃料火箭做好发射准备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很容易被间谍卫星发现。中国能否发射打得到美国东海岸的导弹也值得怀疑。但是，这种状况在迅速发生变化。中国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在 1996 年同意了新的核禁试条约，但是，在谈判进行的过程中，它实施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核试验计划，其目的是研制比较小的、更可靠的核弹头，以便把它们装在打得到美国的新一代导弹上。

确实，有关中国核计划的各种调查业已证明，北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研制和试验射程在 5000 到 8000 英里的导弹上。（注 34）中国已经制造了好几代“东风”（“东方红”）导弹，其中的“东风—31”尤其令中国的邻国担心，因为它不仅是机动的，而且系由固体燃料推动，这就是说，中国将拥有这样一种导弹：它可以在中国各处移动（大概不会被发现），从而能使任何邻国——包括俄国、印度和日本——的几乎全部领土都进入它的射程，而且它可以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射。（注 35）据说，中国为 2000 年定下的目标是要有 30 枚放置在加固发射井内、由固体燃料推动（即能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发射）并携有分导多弹头（即携带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导弹。根据高估对手略胜于低估对于的原则，美国的谋划人员必须假定这 100 多个弹头将对准或者能够对准美国。（注 36）

对中国核计划的这种描述是否有些危言耸听？1995 年，一位中国官员悄声对到访的美国人小蔡斯·弗里曼说，如果美国保卫台湾的代价是中国对洛杉矶发动核袭击，那它是不会冒此风险的。许多美国官员马上会说，这不是官方的评论，因而不值得重视；就连弗里曼本人事后也认为此说法并不重要。但是，说这话的那位中国官员事实上是透露了中国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一部分计划。中国既然拥有打得到美国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当美国军队进行干预、阻止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势的时候，它就能以动用核武器相威胁。鉴于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巨大优势，这样做似乎是丧失理性的。但是，一些美国分析家争辩说，数十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有意助长这样一种认识：不能根据通常的和西方的那种对风险得失的估量来预测中国使用核武器的决定。

所有可能性中最令人不安的一种是中国已经从俄国人那里得到 SS—18 导弹，或者至少是制造这种导弹的能力。如果中国买到了这种导弹，那就使它能从头开始研制一种类似的导弹所需要的时间减少好几年。实际上，关于中国人在研制自己的导弹的报道中，有一些可能证明是中国军事部门故意编造出来的掩饰性文章，目的在于掩盖它购买 SS—18 这一事实。这种导弹大概会被改换名字，算作“东风”系列的一部分，以便在它的来源问题上掩人耳目。

中国的海军从未比今天更受重视。它采购新武器的行动体现了中国军力扩充方面新近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部署新武器系统的速度在加快。一位学者指出，在 80 年代末期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更换它的过时常规武器的努力大体上一直局限于‘只看不买’和自己研制。”（注 37）但是，到了 90 年代，这种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例如，自 1991 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至少把 4 艘新的驱逐舰、5 艘快速护卫舰和 9 艘快速袭击导弹艇投入了部署。1994 年，又有 35 艘现代化军舰在建造之中，另外 46 艘军舰的采购也已列入

计划。（注 38）

鉴于中国的这些活动，一些研究中国军队情况的专家开始改变他们直到 90 年代初还坚持的看法，转而接受这样的观点：北京的政策已不再是有节制的和防御性的了，它对亚洲总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威胁比以前大多了。还有一些人仍旧认为中国是在对一个过时的系统进行更新，这样做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早就应当做此努力了。这种着眼于绝对力量而不是相对力量的看法自然又是不得要领的。例如，中国拥有 9200 辆坦克，越南有 2000 辆，菲律宾有 126 辆。中国有 50 艘驱逐舰和快速护卫舰，越南有 7 艘，菲律宾有 1 艘。中国的 5845 架作战飞机与美国的飞机相比大部分是陈旧过时的，但是，在任何空战中，数量都是起很大作用的，而邻国越南和菲律宾的飞机数目分别为 190 架和 43 架。

许多年来，军事专家们注意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讲起话来虚张声势，但是在实际上对于使用他们的军事力量还是非常谨慎的。他们 1950 年在朝鲜参战，那是因为他们当真担心美国计划入侵中国。他们在 1962 年中印边界发生的领土争端中动用了军队，但是，在那之前他们曾警告过：如果印度继续在那个地区进行军事试探，中国将采取报复行动。70 年代中期，中国还在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注）一带同苏联军队发生过一些小冲突。但是，所有这些交战行动都起因于中国所认为的对它自己领土的现实威胁，而算不上真正的向其他国家投送力量的行动。这些行动似乎证明了中国基本上采取防御态势和谨慎行事这条原则。

但是，近些年来，中国的气势壮起来了。1974 年，它从南越手中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上的好几个岛屿。1979 年，它违反了至今仍时常重申的决不首先动用武力的诺言，向边界那一边的北越发动了进攻。1988 年，中国人在斯普拉特利群岛海域击沉了越南的三艘船只，至少 75 名越南水手死亡或失踪。自那以后，中国逐步地又占领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另外一些岛屿。1994 年发生了前面说过的涉及一艘中国潜艇和一些美国舰只的黄海事件。1995 年，中国派遣一支海军部队从菲律宾手中夺取了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1996 年，它向靠近台湾海岸的水域发射了导弹，试图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威吓该岛居民——华盛顿对这次小小的炫耀武力行动相当重视，克林顿政府作出了反应。在这次台湾事件期间，中国曾警告美国不要进入台湾海峡，尽管那是一条国际航道。

简言之，中国现在愿意在其境外动用军队，看来至少是愿意以此进行试探，即试探其他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它们的政治决心有多大，有谁会来援助它们。它选择越南作为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想看看苏联会不会报复。在米斯奇夫礁事件中，看来它是在试探菲律宾最亲密的友邦——它的缔约盟友英国和它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邻国会不会作出反应。迄今为止，这些攻击行动都是小规模，但是，它们也表明了中国决心把它的力量延伸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中国海的纵深地带。

人们只要看一下地图，很快就会发现，中国若能控制它宣称拥有主权的那些岛屿，它就会向前取得多大的进展。那些岛屿实际上处在一条把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连结在一起、控制着从日本到中东再到欧洲的最重要的海运线的内陆水路上。米斯奇夫礁位于南中国海的东南部，距离没有争议的中国领土的最近点——海南岛大约 800 海里，但是距菲律宾的最近点——巴拉望岛海岸只有大约 135 海里。中国已安上雷达装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中的法厄里克

罗斯礁（即永暑礁——译者注）还要往南。

香港为海军舰只提供着进出全亚洲最好的深水港的便利。这个港口位于南中国海的北部门户。作为香港回归安排的一部分，英国人出钱在香港的昂船洲上建立了一个新的海军基地，其中包括一段 400 米长的深水泊位，连航空母舰都可以容纳。一些英国分析家相信，中国打算把昂船洲变成南方的一个主要海军基地，它可以从那里控制整个南中国海。

为了采购先进武器，迅速提高它的力量投送能力，中国现在越来越放眼外国了——不仅是俄国，现在还加上了西欧国家。1996 年下半年，很可能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进行的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射未能把台湾吓倒的缘故，这种交易的数量大大增加了。这一年的秋天，曾普遍传说中国向法国购买“克莱蒙梭号”航空母舰一事快成交了，据说该舰上配备有全部更新过的电子和雷达系统。虽说要想组建一支现代化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还需要其他一些舰只，而中国海军在几年之内还配不齐所有这些舰只，但是，购置“克莱蒙梭号”，特别是一艘配备着最新式的电子系统的“克莱蒙梭号”，这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

1996 年底，中国又采取行动在机载顶警雷达系统方面急起直追。这种系统是现代化战争的一个要素。8 月间，它从英国的防务电子公司 Racal 公司购买了 6 至 8 部水下搜索雷达。此种雷达主要是供海上巡逻飞机搜索潜艇目的。1996 年 10 月，中国还同时与英国和以色列洽谈购买机载预警系统事宜，以便把它的伊尔—76 飞机改装成机载顶警与控制系统。这种系统使用雷达和高功率电脑来发现敌人的飞机并协调空中、海上和地面部队的进攻。总之，这种飞机可以使中国的军用飞机在台湾和南中国海上空“加倍地发挥威力”。（注 39）像早些时候向俄国购买的数十亿美元武器一样，这些全部是现金交易。下面我们会看到，这种交易所需要的钱来自美国。

除此之外，中国还有一个动作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一直在修建一条从西南面的云南省经缅甸到孟加拉湾的铁路。这条铁路建成后，中国就可以向印度洋中的海军舰只提供补给了。这样一个步骤将使东南亚和南亚的力量对比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发生明显的改变。中国军队将存在于东南亚的陆上和海上的各条战线。就南亚而言，印度军事计划人员对我们说过，他们对中国将能够在他们的东部沿海附近部署一支舰队这样一种前景感到惶恐不安。中国现在已经在印度洋上属于缅甸的岛屿驻扎了人员来监督印度的空中和海上行动了。

第三章 讲话声音大手中棍子小

身正不怕影子歪。

——前政治犯刘青

美国人看待捍卫别人人权问题往往像看待选择性手术一样——只要风险不是太大，就值得一做。美国的理想主义促使我们去推动别人创造一个各国政府都尊重其公民的权利、不时他们实施任何暴行的世界——条件是其他利益，例如贸易利益和安全利益，不能受到威胁。然而，中国在考虑它同美国的关系时，人权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就触及到对于中国现领导而言是不容谈判的几个问题的核心。这些问题是：主权，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国家尊严，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专制政府的无可争议的权力。这个政府仍在 1949 年夺取权力的共产党的体系内运作——如果说不是仍在它原本的意识形态范围之内运作的话。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抵制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是一个政治

*此书作者在这一章中集中在人权问题上攻击诬蔑中国。为了解真相，请见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7 年 3 月 13 日发表的《利用人权制造对抗的又一表现——评美国国务院 1996 年（人权报告）中国部分》。——编者注生存问题。北京对美国进行的永无休止的、有时是隐晦的、但永远是多战线的斗争就是为了这种政治上的生存。这一斗争包括时其他国家施加极大的外交压力，呼吁泛亚文化团结，在美国国内使劲游说，而最有效的是，采取一种旨在争取美国公司站在中国一边的精明的经济赏罚制度。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美国以前采用的威胁中国的办法，是对中国在美国销售的产品征收高额进口税——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如果那里的政权不停止监禁持不同政见者的话。这种主张不过是一种笨拙的、使人一眼就能看穿的虚声恫吓，因而它遭到了惨败。中国则以美国之道还治美国之身。北京扬言要时美国采取相当于经济制裁的措施，即实际上抵制美国的高技术产品，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如果美国不取消它的施压和威胁的政策的话。两者的差别在于，中国的恫吓受到了认真对待，它的战略实施得十分成功。

截至 1996 年底，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一直没有对美国作出任何重大让步。实际上，它还想出一些办法来公开蔑视、甚至是羞辱美国。的确是“羞辱”。1994 年，正当克林顿政府考虑是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还是将这个决定同人权挂钩的时候，中国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肯定是为了对美国的决定施加影响。美国政府刚一宣布“脱钩”，同意不论中国怎样对待不同政见都给它最惠国待遇，北京安全部门就把弦绷紧了，又开始抓人，进行先前推迟的政治审讯，镇压那些据认为向外国人出卖了“国家机密”的人。“这一年中，（中国）政府继续大范围地侵犯人权，它的这些行为都是证据确凿的，”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 1995 年情况的年度报告中这样说，“总的说来，当局在 1995 年加紧了对不同政见的镇压。到这一年年底，对中央当局公开表示的不同意见几乎全部破恐吓、流放、监禁或行政拘留压制下去了。”（注 1）

美国人所没有认识到的是，北京的镇压在多大程度上是一场反对西方影响、特别是反对美国影响的斗争的一部分。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和外交影响使它得以在这场斗争中取胜。中国选择抓人、关人的时机都是要突显美国对于影响中国国内政策是多么无能为力。最近的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是，中国人在 1996 年秋判了王丹（他是仍然留在中国的天安门运动中最重要学生领袖）11 年徒刑。就在白宫和国务院的一个代表团离开北京几个小时之后，北京“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那个代表团是来北京安排沃伦·克里斯托弗预定几周之后要进行的访问的。美国代表团在会谈中谈到了人权问题，特别提及王丹的案子。那时，王丹已被单独监禁了 1 年零 5 个月，本来早就可以审讯和定罪，而他们偏偏选中那个时候来审判他，定他的罪，这就把美国置于一个人们业已熟悉的尴尬境地：要么为抗议王丹被判刑而取消克里斯托弗的访问，要么不取消这次访问，但两者都会有损于美国的形象。若是取消访问，那就会使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受制于一位 27 岁的前学生所受的待遇；如果不取消访问，那就无异于公开放弃了自己以前提出的要求：只有中国改善人权记录，两国关系才能正常。

在王丹的事情上，美国采取了第二种做法。就在王丹被判刑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华盛顿宣布，克里斯托弗的访问将按计划进行。至此，美国长

期以来在中国蔑视它的力量面前，在人权问题上节节后退的过程终于完成了。从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起，在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同中国保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包括偶尔的高级会晤，但是同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李鹏总理和江泽民主席保持一定的距离。在 1992 年竞选期间，身为候选人的比尔·克林顿曾抨击这一政策，说它软弱、不够有力。“布什政府不是在国际上带头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实行改革，而是姑息独裁者，恳求他们有所进步，拒绝对顽固不化的态度施以惩罚。”1994 年 1 月，克林顿在他的国情咨文中讲的下面这段话博得了掌声：“我们在同中国建立比较具有建设性的关系的同时，必须继续坚持那个国家的人权记录要有明显改善的迹象。”

考虑到后来的带有相当大的“姑息独裁者”成分的行动，现在看来，这些掷地有声的讲话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讲话声音大、手中棍子小”的决心，先是 1994 年关于最惠国地位永远同中国的人权记录“脱钩”的决定。美国作出这一姿态后，中国立即重新开始镇压不同政见人士，包括再度逮捕魏京生和许多别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有 15 名主张建立自由工会的人。接着是 1996 年夏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的北京和解之行。这次访问后，克林顿政府喜滋滋地宣布邀请江泽民 1997 年进行互访。此举甚至把美国同那些对中国最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领导人保持距离这个门面都抛掉了。几个月后，正当新的总统竞选拉开序幕的时候，克林顿对《纽约时报》承认：“我认为，公平地说，我对中国的政策是同我在竞选中讲过的话有些不同。”“有些不同”，这是总统自从政以来所用过的最重要的轻描淡写词语之一。此后发生的王丹事件以及让克里斯托弗按计划访问的决定，标志着美国又朝着进一步“脱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从这时起，不论中国在人权方面采取多么残酷的镇压行动，美国连最起码的形式上的抗议也不提了。中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美国则是无条件投降。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论点不是说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应当把人权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特别是把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表现同美国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这本来就不是好主意。它是一项没有效用的政策，而且有悖于美国的另外两个目标——同中国建立起一种经济关系并取得它的战略合作。

但是，克林顿政府所实行的颇不高明的、笨拙的、前后不一的对华政策突出地显示了中美关系的几个特点。例如，它发出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在任何意志较量中，美国都会在对方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前退缩。它还表明，除非北京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否则，不论华盛顿政府可能采取什么政策，人权将始终是美中两国发生严重冲突的根源。在美国国内，将永远有一些势力强大的集团和一部分舆论希望惩罚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集团，其中包括国会、人权组织和新闻界的许多人士，是白宫和国务院所不能忽视的。在人权问题上的摩擦今后将无限期地存在下去。

最重要的是，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软弱和退缩更有可能使今后必然发生冲突，而不是防止冲突。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最终目标是促使中同以负责任的态度行事，变得更民主一些。以莱克对北京的访问开始的同中国的和解，是送给中国现领导的一份礼物，他们对美国和对人权问题的强硬方针将被证明是正确的。江泽民和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力量得到了加强，他们对美国的强硬路线被证明是有效的。江泽民的努力也许会失败。但是，倘若

他如愿以偿，他的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美国的巨大胜利。这一胜利是克林顿政府拱手让给他的；这一胜利在蔑视美国意愿的做法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颇有号召力的这样一个时候提高了他的威望。

有人认为，那种被称为“接触”——即同中国保持并发展各种正常往来和交流——的方针，较之批评、制裁和孤立更能为中国向好的方向转变开辟广阔得多的道路。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这种观点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中国在自美国同它正式建交以来的将近二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此仅举一例来说明这种变化：以前在中国，同性恋者是要坐牢的，在毛泽东统治下的一些更为激进的时期，这种人还会被处死。而现在，北京有了同性恋酒吧。这只是表明党对个人生活的控制几乎完全放松的一个迹象。就连以前被监禁过的民主墙时期的不同政见人士，尽管几乎是时时刻刻处于监视之下，但现在也可以经商，在中国新兴的自由企业界中发财致富了。要是在过去，他们会被迫不停地参加学习和思想灌输会议，阅读和讨论《人民日报》社论，而且，只要上级党的领导号召清理阶级敌人，他们就会在工作单位内受到公开批判。

这些情况同不久以前相比都是非常重要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人民不必再忍受国家强行规定的贫穷，过那种物质贫乏且不自在的日子，而是获得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权利。这包括在中国国内或到国外去学习，自己谋职，迁往其他城市，拥有电话，租用办公室，从事商业活动。中国在实质上已经由一个极权社会变为一个专政国家了：在极权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管制；而在专政国家内，管制与禁令只适用于政治生活。现实情况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现在对西方界定的人权相当冷漠，对于那些关心尚被监禁的中国不同政见者的人士而言，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有迹象表明，人民对于自己不再遭受以前那种可怕的侵扰感念不已，对政府感到满意。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这种满意态度主要取决于政府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和它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它是否尊重公民自由权利。

情况确实如此，尽管对于违犯政治规则所施行的惩罚是迅捷而严厉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那里的法院在庄严的外表和应有的审理程序这些方面也许与西方的法院没有两样，但是它们不过是为安全警察所采取的行动加盖橡皮图章而已。在中国的法庭上，几乎没有无罪释放这一说，至少在政治案件中肯定没有这种事。任何人都不会在上诉中获胜。中国也没有哪一家报纸或杂志是不受政府控制的。不经官方批准，任何组织、俱乐部、协会，甚至宗教或娱乐团体，都不可能存在。任何锐意改革的报纸主编都不会去为错判的被告申冤，除非他做好自己下狱的准备。一旦你触犯了当局，你就会陷入孤立，没有谁来救助你，也没有谁来安慰你。你就得独力面对这个庞大国家机器的无可争议的权力。中国仍然是一个在某些情况下连它自己的法律、程序和提供保护的保障——实际上也就是它自己的宪法——都会遭到违反的国家。一些人权组织（它们以往汇编的有关中国的资料一向是准确的）估计，那个国家约有 3000 名政治犯，尽管事实上无人能确切地知道它的政治犯有多少。这个数字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自然是大大减少了。那时，为了完成本单位的“右派”指标，某些党的官员只好将自己属下人员的 5% 或 10% 定为政治犯，因此有数十万人被送到偏远地区的劳改营。但是，中国今天依然是警察握有裁决权、对人施以残酷的惩罚、实行卡夫卡*式的司法程序和以奥威尔”式的理由来辩解的国家。

大约在 1995 年，“严打”一词开始在中国经常见诸报端。它指的是一场加紧打击不断上升的犯罪活动的运动。这个词是特指“穷追猛打”杀人、盗窃、强奸和侵吞公款等普通罪犯的。被控以这类罪名而遭到逮捕的人空前之多。他们在通常持续二十来分钟的审判后被定罪，然后被公开处决，即被人用一颗子弹击中后脑而毙命。这种事例成千上万。

但是，“严打”也表明了特别是自 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以来，这个政权在用什么办法加紧它的政治控制。发生了那次学生暴动之后，该政权显然感到，它要想能够承受大力实行经济自由化所包含的风险，就必须对不同政见采取更加明白无误的强硬政策。90 年代中期，特别是在邓小平还活着但已不能视事、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发中权力斗争的时刻，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政策，这些政策对中国的人权记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

自 1959 年中国派兵粉碎了以达赖喇嘛为核心的独立运动以来，中国一直在对西藏进行一场消耗战。中国军队入侵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中国采取行动消除他的一切残留影响。新近发生的最为荒谬的事件是，中国实际上把一个 6 岁男孩监禁了起来。这个男孩是两藏僧侣们征求达赖喇嘛的意见后选来作为西藏第二个最

*弗刚兹·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作家，擅写超现实主义作品，多描述个人与国家或大型组织的抗争，代表作有《判决》等。——译者注

**乔治·奥威尔。1903—1950，英国讽刺小说家，著有《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等。——译者注受敬重的人物——班禅喇嘛的新的转世灵童的。在该男孩失踪几个月之后，中国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的代表才承认，“应男孩父母的请求，该男孩被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了。”新华社报道说，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那个孩子“有被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绑架的危险，他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无须说，中国对那个小男孩的幸福与安全的关心并不包括提供有关他和他的父母的下落的信息，更不包括他们发表的任何证实他们曾要求对他们的儿子实行保护的声明。

诚然，许多世纪以来，西藏一直是一个封建神权政体。关于它，西方人写下了不少充满柔情的无聊作品。把那里描绘成一个人民在一位和善佛王的仁厚治理之下，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地方，这是不准确的，就像把美国印第安人说成品格高尚的民族那种狂想式描写是不准确的一样。但是，即便西藏人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并不是圣徒，他们毕竟有着长达 2000 年之久的文化和生后方式。如今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被摧毁，就像上个世纪北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被摧毁一样，只是战争没有那样公开，杀人远没有那么多而已。自从西藏在 1959 年基本上被吞并以来，中国对那个地方采取的政策一直是对西藏的土地实行大规模的殖民化，消灭西藏文化的许多方面，对于人民表示出来的任何拥护流亡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全体西藏人民部承认他是某种精神权威——的情绪实行残酷镇压。过去，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最残酷的时期，即从 5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独身的僧侣被迫还俗，而且还被迫把佛经当手纸来用。据一位研究西藏事务的学者说，当地原有的 6254 座寺庙，除了 13 座以外，全部被关闭。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政府所在地兼宗教中心的布达拉宫，现在只对游客开放。游客在中国导游的带领下匆匆地转一圈，参观它的一部分。据一位游客说，“西藏人则只能伤心地站在外面。”（注 2）

美国领导人并不是不知道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在 1992 年竞选期间，比尔·克林顿曾谈到西藏人“在北京压迫者”的压制下继续受到“残酷的迫害”。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确认对他的任命的听证会上敦促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有效的手段”，说“那里侵犯人权的现象十分惊人”。通常，在美国使用了这类批评言词时，中国人总是指责它别有用心。例如，官方的新华社在1996年曾宣称：“美国政府 and 国会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达赖喇嘛的分裂主义活动。”（注3）自1994年以来，中国人便把人们熟悉的“严打”一词用在报纸所称的西藏“分裂主义”或“分离主义”活动上，他们越来越大叫大嚷地把达赖喇嘛同这两种罪行以及宣传机构所你的“恐怖主义”活动联系在一起。西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白钊在1996年6月间说：“我们必须开展严打运动，根除一切形式的分离主义，制止敌人的恐怖主义活动。”（注4）（尽管白钊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但他却没有清楚地阐释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就在白钊这次讲话的前后，《西藏日报》在报道为西藏制定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时宣称：“我们必须广泛深入地公开揭露和批判达赖喇嘛，剥掉他的‘宗教领袖’外衣。”这家报纸还说：“我们还必须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清楚地懂得他的所谓‘西藏独立’、‘高度自治’和‘大西藏’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党。”（注5）（这里的一些“引语”，如同上下文中许多“引语”一样，引自外电外报，均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

事实上，达赖喇嘛在多次谈话中都声明过，他愿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条件是要给予西藏具有实际意义的自治。但是，中国的政策只是理论上的自治（确实，在中国范围内，西藏的正式名称是“西藏自治区”），而过去凡年中国采取的行动表明，它所实行的是汉人定居与文化灭绝的政策。”所以才会有

*中国在西藏采取的高压手段使得“自治区”这一概念的名声大受毁损，以至在保证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享有高度自治时，使用了一个新提法，即“特别行政区”。即便只是为了不使怀疑派联想到中国的其他一些自治区，也有必要这样做。——原书脚搜查寺庙，禁止张挂达赖喇嘛照片，对僧侣进行“再教育”以及把中国存在的党、政、橡皮图章式的法院体系、假人民代表大会和宣传机关等各种机构引进西藏之类的节情。

这就好比某个外国占领了意大利，在经济上把它掠夺一空，迫使教皇逃亡，关闭主要教堂，禁止张挂教皇的肖像、禁读他的著作、禁止他发表意见，把教士和主教们集中起来接受“教育”，在此同时又宣称意大利是一个自治区，它的文化、宗教信仰和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占领当局一丝不苟的尊重。

中国成功地抵制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始于1993年底或1994年初，即在中国的反美强硬派在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中占上风之后不久，北京实行强硬斗争策略的时候。这些强硬派争论说，人权问题提供了一个同美国对抗、证明它缺乏决心、从而使自己逃避惩罚的机会。他们希望向克林顿政府的那个主要的要求挑战：中国必须有人权方面有所进步，否则它就会受到惩罚，即它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将被征收高额关税。

为这场冲突埋下伏笔的是当时尚未就任总统的克林顿本人，因为他对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提出异议，公开称中国领导人为“压迫者”和“暴君”。克林顿竞选期间的中国问题主要顾问是温斯顿·洛德。此人以前是亨利·基辛格的助手，当过美国驻北京大使，是始终不渝的共和党人，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同布什政府闹崩了。在80年代，洛德在宣扬当时政府官员和学术专家中存在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下述流行观点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毛泽分之后的中国正在相当自然地演变着，而且——这是20世纪末期政治发展的规律使然——

—是在背离共产主义，朝着市场经济和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的方向演变。

那个时期，西方对中国的乐观态度真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整个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那个国家受到的控制是如此之严，外国人几乎不可能同任何中国人有任何私下交往。而今它在迅速地发生变比，美国专家兴高采烈是可以理解的。同美国交往的扩大，包括贸易、旅游、派遣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以及两国之间的通婚，正在发挥它在理论上应当发挥的作用——使中国本身更加开放和民主。而且，由于在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发生了那么多可喜的变化，于是便很容易看到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巧合关系。人们认为，和平演变正在进行，这种演变既是中国人的天才和意愿造成的，也是美国的榜样激发的。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发生，使形势急转直下。

这次事件使几个月前才结束大使任期离开北京的洛德感到幻灭。他开始在电视和报刊上发表意见，宣言不讳地批评中国政府，而且预言它很快会垮台。他宣称，这个政权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一度甚至暗示“几周或几个月”之后中国领导人就会被推翻。还有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也错误地理解了天安门事件的含意，不能肯定这个政权的未来会是什么样。但是，两年后，洛德仍然暗示说，一俟邓小平去世，“我们将会看到朝着建立一个更务实、更具改革精神的政府的方向出现重大发展，朝着建立一个即便不是民主的、也是更为多元比的制度的方向出现重大的进展。”（注6）

就在那前后，洛德摒弃了布什政府的小心翼翼的对华政策，后来又成了克林顿的支持者。他明确地表示支持克林顿在竞选中就中国问题发表的主要讲话（虽然中国问题不是他的竞选的一个重要题目、但是他的这些讲话还是引起了报界的广泛注意）。讲话的大意是，布什的政策软得丢人，而他克林顿的政策则要强硬一些。洛德坚信，中国现领导人很快将被取代，这是符合西方的如下执著信念的：我们的榜样终将使中国人变得更像我们，终将放弃官僚独裁，变成自由市场开明派。在80年代，中国人朝着那个方向走得那么快、那么远，以至于即使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人们也觉得靠拢西方的势头不可能不在那个令人憎恶的当政集团消失之时立即恢复；而鉴于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年事已高，那个集团的消失看来是近在眼前的事。

这种期望建立在这样一种假定的基础上：一种谴责和警告中国的政策实行起来可以毫无风险。如果那个政权行将在一两年之内垮台，那么，与该政权对抗——不论对抗起来是多么伤和气——是不会使美中关系恶化的。实际上，它对于等待上台的中国改革势力还将起鼓舞作用，他们以后还会感谢美国对那个老的政权所抱的不友好态度。这是个合乎逻辑的假定；而且，倘若中国玩把戏不是比克林顿玩得更有手腕、目的性比他明确得多，这个假定本来甚至会证明是正确的。事实上，克林顿政府这一方针带来了某种差不多与初衷截然相反的结果——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立场更强硬了，使美国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克林顿在1993年5月的一道正式的行政命令中对他的对华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它通知中国领导人，他们有正好一年的时间来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改善人权，从允许不同政见人士的家庭成员移居国外到减少对西藏人的虐待到较详尽他说明政治犯的情况。克林顿扬言，如果这些方面没有“全面的明显进展”，将把中国从最惠国名单中去掉。

事实上，“最惠国”这个称谓并不恰当，因为世界所有主要贸易国都在

美国的“最惠国”名单上，也就是说，对它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征收标准关税。没何列入这个名单的国家则必须为它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支付如此沉重的关税，以至大部分贸易事实上都无法进行。中国出口的产品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输往美国的，因此，就单个国家而言，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而且是比所有其他国家都大得多的市场。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如果把它从最惠国名单中除掉，这一顺差固然将不复存在，但是，中国采取的报复行动也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换言之，如果克林顿当真取消了中国的最惠国地位，那会产生两个重大后果：第一，美国将切断自己同世界历史上增长幅度最大、速度最快的经济之间的联系；第二，中国以出口为动力、以私营企业和急剧扩大的中国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经济起飞将会因为被排斥在美国市场之外而受到严重的损害。换句话说，克林顿要是真的按照他所威胁的去做，那就肯定会使中国受到过重的惩罚，也肯定会使美国得不偿失。这样一来，美国总统就是使自己处于一种必须在两个几乎同样不利的办法中作出选择的境地：要么把最后通牒付诸实施，要么找个借口把它收回。

看来，中国人看透了这一点。他们的讲话、行动以及我们所了解的有关那个时期在北京举行的一些秘密会议（前面我们已经述及）的情况，使入毫不怀疑，到1993年底，中国领导人已经决定接受可以说是一个门外汉的挑战了。然而，克林顿并不了解当时在中国开始占上风观点，在发出最后通牒后的头几个月内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时却派国务院的官员到北京去，设法让中国人依从。先是克林顿政府负责人权问题的最高官员约翰·沙特克于1994年2月底到那里去了。沙特克同中国官员举行了会谈；为了让大家都了解美国对人权是多么关心，他还邀请魏京生与他会面。他的这次邀请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有名的举动了。

接到美国的邀请后，魏京生避开对他的严密监视，秘密会晤了沙特克。中国官员后来得知了这件事，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方面旨在使中国难堪的鬼蜮伎俩恼怒至极。

3月中旬，一位级别更高的美国官员到北京来强调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方针。这位官员就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他来中国的目的是重申美国的最后通牒，当时距最后限期只剩10周时间了。为了强调他的认真态度，一向讲究原则的克里斯托弗采取了比平时更为坚定的态度。让贵宾乘坐中国的轿车，这是主人的一种通常的礼遇，但他拒绝接受这番好意，而是乘了使馆的车。他对中国人说，他不想出席通常的那种宴会，而且他拒绝在中国专为像他这样的贵宾准备的宾馆下榻，而是选择了中国大饭店中的一个套房。或许最为重要的要算克里斯托弗的强硬讲话了。这位美国国务卿很快就不得不承认他的用词有欠妥当。“我将重申，只有在人权问题上取得全面重大的进展之后，我才会建议给中国以最惠国贸易地位。”他在飞往北京的前一刻在东京对一批日本商人这样说。“我们在中国所寻求的不过是承认最基本的、普遍公认的人权。”（注7）

到中国后，克里斯托弗立即开始谈正事。一名记者在报道国务卿同他的东道主之间的首次会谈时说，开始的几句对话是“严厉而尖刻的交锋”。（注8）克里斯托弗不客气地对中国人说，除非他们在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否则美国政府将对他们实行严厉的贸易惩罚；中国人也同样不客气地告诉他，他们认为这样的威胁是极端无礼的。北京的回应使克里斯托弗感到忍无可

忍。只是在美国大使芮效俭的劝说之下，他才忍住气，没有在那个国家仅呆了一天便结束访问。克里斯托弗曾有一整天把自己关在酒店房间不肯出来。

同克里斯托弗会谈之后，中国当局故意以蔑视的态度采取了一些恰恰是美国政府警告他们不要采取的行动，而且不仅仅是在人权方面。中国无视美国关于武器扩散问题的警告，向伊朗出口了一批化学武器，向巴基斯坦出口了导弹零部件。（注 9）至于人权，中国的公安局逮捕了魏京生并把他送入监狱。几周之后，中国当局修改了公共秩序法，把警方对民主和工会活动者、宗教和少数民族领袖实行拘捕或限制他们活动的本来已经很广泛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在此之前仅几个月，中国领导人就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全球对手达成了共识。但是，仅这一点还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为什么不仅对美国的外交压力、而且对它的人权政策所引起的全球舆论采取如此蔑视的态度。真实情况是：中国一直不忘遭受帝国主义压迫时期外国对它的蹂躏，对于它认为是干涉其内政的事情总是极其敏感。不仅如此，中国有许多人，而且不仅是领导层中的人，确实认为西方式的人权会在中国造成混乱。从他们的角度看，他们的以市场为动力的政策已经允许有足够大的自由，也已经造成了够多的混乱了。给这种爆炸性的混乱局面再增添一种民主的因素，那会使形势一触即发，就像 1989 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那样。

但是，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无视美国的压力和威胁，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这样做不会受到惩罚。而他们之所以持如此见解，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把他们的正在增长的经济力量变阶一件政治和外交武器的办法。简言之，中国人用巨额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来诱惑美国公司，并威胁要用转而去求其他国家的办法——他们也真的这样做过——来惩罚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干预。许多协定在决定最惠国地位的最后限期（6 月初）之前很久就达成了；还有一些仍在谈判，但是快要达成协议了；然而也有一些处于讨论的初期阶段。但是，中国人明白表示，无论是哪种情况，如果美国把它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的威胁付诸实施，这些交易都将作废。美国实业界自然渴望能在中国市场上占据更大的份额，所以他们对于扬言以经济手段来报复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感到不悦。仅几个月的功夫，中国就把《财富》杂志评定的 500 家最大企业中的一些公司变成了势力强大的新的院外援华集团。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来谈这个问题，这里先介绍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前兆。美国一些最富有的大亨参与了这种游说。这些人所过的豪富生活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人所无法想象的。他们与专政者并肩站在一起，警告他们的政府：代表少数因为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而被囚于土牢的人说话是极其不明智的。当时是世界第二大富翁的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于 1994 年 4 月会见了江泽民，并宣称，第一，他的目标是每年把在中国的销售额增加 50%；第二，“试图把自由贸易（同人权问题）联系起来，这有点奇怪”。他说：“从根本上说，这是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注 10）

或许盖茨是正确的。可以提出、而且也确实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论点：从长远来说，微软公司的软件将使中国发生的变化，要比全球有关人权的所有说教加在一起还大。我们的确相信，有朝一日，中国可能接受已成为全球准则的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原则；倘若它真的这样做了，这种结果将是由中国同西方的贸易所促成的经济变革带来的。一个控制严密的专制政权是不可能在本质上是自由市场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永远存在下去的。

但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下能指望出现这种令人愉快的结果的，即

便它最终会出现也罢。近来的经验向我们证明的是：中国领导层会利用经济改革带来的财富与力量压制政治变革要求，抵制外国的压力。同西方的贸易，包括同微软公司的贸易，有利也何弊。它带进来一些应当能导致政治变革的做法与思想。但是，它也能增强这个政权抵制和压制政治改革、迫使其他国家放弃要它实行这种改革的要求的力量。1996年，中国如愿以偿地使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根本没有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问题。中国是通过大规模的全球游说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其中包括争取一些公司的支持来把人权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像盖茨这样一位人物同中国主席兼共产党领袖并肩站在一起，使他们可以共同来指责西方干涉中国的内政，它所反映的不是中国趋向于长期变革，而是一种抵制那种变革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具有一种实际上的重要性。在国际事务中，稳定的民主国家较之独裁国家更有可能以负责的态度与和平的方式行事。但它还有道义上的重要性，即这样一种观念：当某人的精神破暴政摧垮的时候，每个人都应当至少是站出来讲话，或许还要拒绝同摧垮这种精神的人进行正常交往。美国在前南斯拉夫和前苏联的政策正是受到这种思想的驱使。当年德国对犹太人实行灭绝的时候，西方的政策本来也应当受到这种思想的驱使，可惜它没有。享受着特权的富有的美国公司经理们认为人权问题是对别国内政的无理干涉，不应当过问。他们至少应当考虑考虑那些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坐牢的人，考虑考虑抵制争取他们获释的努力会产生什么后果。那些受压迫的西藏人是中国践踏人权行为的最严重的受害者。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中国今天还有多达3000名因为表达了不恰当的意见或属于不恰当的组织而坐牢。最了解他们的莫过于那个瘦瘦小小、戴着眼镜、但却非常勇敢的人，他的名字叫刘青。

刘青在纽约的一间很小的办公室里做着揭露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工作。对于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为，他本人就有过亲身体验。他在中国的劳改营中度过了11年时光，其中有3年处于中国委婉地称为“严格监督”的状态。但是，刘青默诵着中国的一句俗语，忍受住了对他的惩罚。这句俗语是：“身正不怕影子歪。”

刘青被行政拘留3年，又坐了8年监狱。当他于1990年终于获释后，他和妻子来到了美国。刘青最后找到了一份工作，当上了世界人权观察组织的一个叫做“中国人权”的小部门的负责人。这个部门的任务是收集有关政治犯问题的信息，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情况通报，并设法把这些信息在中国国内和世界各地散发。刘青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参加各种人权会议，例如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年会等等。就是在这次年会上，有效的全球游说活动使得这个威严的组织没有正式讨论中国的人权记录。

刘青还在继续斗争。这场力量十分悬殊的竞赛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它想出了许多非常有效的办法来战胜美国对它的人权政策以及其他政策的反对态度。它的这场宣传运动进行得如此有效，以至于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连美国总统在中国问题上都被迫改变了立场。

第四章新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

对于美国公司的主管们来说，要想在同中国做生意时取得传说的利润，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渴望同他们做生意的中国官员会对他们说：“让我们达成协议吧！”但是所达成的协议往往要推迟几年才能得到执行，公司要为数不清的问题提供答案，提交技术说明，所许诺的减税和进口关税的减免

会突然被取消。确实达成了一些有利可图的协议，而在 1994 年的头几个月，美国企业界以从未见过、后来也未再有过的速度同中国签订协议。正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1994 年的头几个月正是克林顿政府扬言要取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的时候，中国人想出一种办法加以阻止，这个办法就是发动一场经济攻势，纠集美国公司支持中国。因此：

1994 年 1 月，中国在美国证券市场发行了 10 亿美元的债券，正如路透社报道的那样，中国“在它的主要承销商美林证券公司的安排下，完成了在美国的巡回演出的最后一站”。（注 1）

2 月份，福特汽车公司就该公司在中国设立汽车部件生产以及可能进行整车组装的合资企业举行的谈判已到了最后阶段。福特汽车公司一位主管人员说：“中国对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机构（当时宣布在中国设立福特汽车公司中国经营处）的设立表明我们真正想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注 2）

4 月份，中国人在纽约和洛杉矶举行的“贸易和投资洽谈会”展示出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交易的前景，吸引了美国 300 家公司的 700 位企业界人士前去参观。中国人后来声称，他们同美国公司签署了价值 111 亿美元的合同。

也是在 4 月份，中国官员在上海接待了时代—华纳公司的高级主管，商谈在中国共同开设一家游乐园的事宜。4 月 28 日，邹家华副总理来到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设在新泽西州的总部，签署了几项预计将会给该公司带来 500 多亿美元收入的合同。

几天之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透露它同中国签署了包括建立合资企业在内的几项协议。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董事长小路易斯·格斯特纳于 3 月份访问了中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了谈判。

（注 3）

5 月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波音公司将在“数星期之内”达成向中国出售价值 50 亿美元的商用喷气客机的协议。在历时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波音公司的主管人员公开敦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注 4）

并非偶然的是，在此前不久的 5 月初，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公开向他在白宫的民主党同伴们说，克林顿不应当把贸易与人权问题挂钩。他说：“那是一种很公开的做法，具有挑战性和对抗性。”福利代表着波音公司所在的华盛顿州斯波坎地区。的确，在华盛顿州的国会代表团中没有人批评中国。

就在克林顿宣布继续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的第二天，肯德基家乡鸡公司总经理约翰·克拉诺在上海宣布，这家快餐连锁店公司今后 4 年将在中国投资两亿美元。他直言不讳地把该公司的投资决定与克林顿宣布的决定相联系：“通过永远把人权与经济投资问题脱钩，克林顿总统消除了我们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存在的不确定因素。”（注 5）

就在许多国会议员反映出他们家乡各州的公司亲中国立场的同时，其他身居关键职位的政界领导人会见了来自中国的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具有潜在的经济上的好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于 1994 年 4 月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该协议为纽约州的公司向中国的技术出口提供了便利。该州一位负责推动出口事务的高级官员当时

说：“中国人主动同我们接触，他们采取了好几个主动行动。”科莫宣布的决定表明，他希望克林顿不仅把贸易最惠国地位与人权问题脱钩，而且无条件地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注6）

中国人在准确地觉察出克林顿政府主张人权的国务院与主张商业第一的政府其他部门之间存在着分歧以后，甚至向美国联邦政府派出了游说代表团。4月中旬，商务部长罗恩·布朗同来访的中国外经贸部长吴仪签署了一项就双边贸易和投资问题成立常设工作小组的协议。出面接待吴仪女士的东道主是美中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公司组成，这些公司当时正在尽力要求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在一次有50位中国官员出席的午餐会上，吴仪女士以引人入胜的语气向在场的200位企业家谈到美国投资者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前景。（注7）

企业界只有一家公司唱反调。利瓦伊-斯特劳斯公司1993年春宣布，由于中国“普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该公司不再在中国开展业务经营。该公司停止了每年从中国的合同商那里购买大约5000万美元的裤子和衬衣。然而该公司巧妙地避免了牺牲它的主要利润来源：该公司承认它将继续允许它的销售商贾丁经销服务公司在销售该公司生产的名牌牛仔服装。（注8）

由中国精心而又巧妙地组织的把人权问题与贸易脱钩的运动于1994年4月底形成一股巨大力量的时候，温斯顿·洛德放弃了他直至那时一直主张对中国实行的方针。他在致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一封信中被立即透露给新闻界的信中说，他所主张的政策——让中国做生意的好处随中国的人权记录而定——实际上已经失败。情况的确如此：5月26日，改变了原先态度的比尔·克林顿宣布，他将延长给予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而不考虑中国的人权记录如何，从而完成了美国当今外交史上最彻底的转变之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努力，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取得了对美国的全面胜利，这个胜利于两年以后的1996年达到了顶点：美国邀请曾经受到它冷落的北京最高领导人于1997年同克林顿进行互访。

当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竭力想对美国的舆论和决策施加影响。但是，中国人在美国开展的游说和公关活动有四个特点，总的来说，这些特点有别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开展的活动。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美国的对手，是独裁国家，是新兴的超级大国，它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悖。第二个特点是，中国为了影响美国的行动所作的努力的猛烈程度；它对不同意见采取的刻毒的愤然态度；它在美国开展活动的广泛程度，其中不仅仅包括宣传、威胁、恐吓以及紧张的私下游说，还有努力购买或把技术窃取到中国去。（后面还将进一步谈到这个问题）第三个特点是，一批极有影响力的前美国高级官员左右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公众辩论，因为这些人能从自己鼓吹的政策中得到好处。最后一个特点是，中国非常有效地利用经济战的威胁，纠集美国历史上少见的企业界最广泛的支持，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

大多数这方面的努力的背景是，以利润相诱惑，以及与之相伴的以取消利润相威胁，如果中国的意图不能实现的话。李鹏总理在1996年以购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价值15亿美元的飞机对波音公司进行惩罚时，其意图是再清楚不过了。他赞扬了欧洲领导人，因为“他们对于同中国的合作没有附加政治条件，不像美国人随心所欲地诉诸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注9）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中国自己有效地使用了制裁，即公开许诺给予经济方面的好处或威胁给予经济方面的惩罚，以此作为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就在它向美国发出不要对中国实施制裁的严厉警告的同时，美国企业界一些人士也吵吵嚷嚷发出这种警告，因为中国人进行制裁将会危及他们的利益。势力强大的新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们从来不承认，中国正是通过把经济问题与政治相联系，给予或取消利润，才使得中国对美同的政策相当有效。

除了国会坚决支持台湾防御中国的军事威胁是个重要的例外——尽管中国强烈抗议，向台湾的武器销售一直在继续——中国开展的多方面的游说活动都非常成功。尤其是，每当美国扬言要对中国违反国际准则采取行动时，中国部设法迫使华盛顿自食其言。

有人可能会提到美国准备就中国在音乐光盘、电影录像带和计算机软件方面的盗版活动实施制裁是另一个例外。事实上，尽管中国一再许诺要对上述盗版活动予以打击，但是，直至1996年年中，在各省和军队中势力强大的人士的保护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盗版行业仍然在蓬勃发展。

无论怎样说，在有关中国的人权问题（克林顿政府1994年说中国的人权问题有7类，包括对待西藏的做法）、中国向伊朗运送毒气、向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出售导弹、向伊朗和巴基斯坦提供核技术帮助、贸易行为（下面一章我们将要谈到，中国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和贸易顺差）所有这些问题上，美国都发出威胁和恐吓，但最后很少真正采取行动。出现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可以你之为新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的那些人开展了有效活动。这个院外活动集团是一个由多方面人士组成的松散的网络，中国主要通过许诺让他们赚到钱或不让他们赚钱的办法，对它的活动予以鼓励和操纵。

对这种现象感到沮丧的温斯顿·洛德说：“我们在中国碰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在我们同中国人较量的时候，我们的欧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观，而且他们抓住机会同中国人签订了合同。”洛德承认，美国在迫使中国停止向美国的敌人出售武器，履行它的贸易承诺等方面所作的努力遭到了失败。（注10）另一位高级官员对报道武器扩散问题的《风险报告》杂志的记者说：“我们并没有真正对中国人采取强硬态度。中国人口头上说要遵守规则，但他们仍然违反规则——有时是公然违反规则。我们没有对中国人采取强硬态度的原因是市场潜力。”（注11）

虽然新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金钱为基础，但它并不是完全以金钱为基础。它还同交情有关，在一定的圈子里，有交情就可以达成转换为金钱的交易。

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使用关系这个词。如果某人有关系，就意味着这个人具有某种优越条件。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这种优越条件可能是某人的朋友或者亲戚身居要职——本地一所最好的学校的党委书记，或者有权分配住房的居民委员会主任，或者掌握着建立中外合资、有权把外汇寄往国外的企业的许可证发政权的省政官员。如果你是外国人，你的关系可能是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董事长荣毅仁或者同江泽民本人建立友谊。

自从共产党政府接管中国（但它仍然带有封建中国的根源）以来，人们常用的一个相关的词是走后门。这个词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观点，其意思是说，在中国，资格、技能和低价格比不上通过后门钻官方规定

的空子和进入权力之塔的本事。

长期以来，能够在中国开展特殊活动的外国人从他们拥有的关系中受益。例如，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与中国有交情的外国人几乎只有一小批被视为“中国的朋友”的外国作家和新闻记者。“中国的朋友”的意思是：为共产主义革命进行宣传的人。瑞士公民、欧亚混血的小说家韩素音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员。埃德加·斯诺是其中的另一位。在许多年里，斯诺是可以前往中国的为数非常少的美国公民之一，他在中国的时候，可以进入最神圣的地方：毛主席会见外国客人的会客室。还有另一些人：美国新闻记者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澳大利亚共产党人威尔弗雷德·伯切特；法国小说家、后来担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除了少数例外（例如马尔罗），这些人几乎都由于他们享有的“朋友”地位而在中国有交情，如果他们有“不友好”的行为——诸如揭露正在进行的权力争斗的真相、在毛周围发生的个人崇拜，或者揭露由毛实行的经济政策带来的苦难——这种地位可以随时被取消。

“中国的朋友”按照中国官员们希望的方式发表文章和讲话。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实际上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或者说，如果对这种行为所作的比较犬儒主义的解释是正确的话，那是因为这些人需要保护他们的关系，需要保护他们与北京的官僚机构最高层的交情。不论是属于何种情况，中国自身精心创建了由支持音组成的专门俱乐部，向这些支持者发放签证，允许他们到各处旅行，在属于旧时紫禁城的一部分、毛和其他革命前辈们生活和工作的所在地、由高墙围着的中南海里受到接见。如果某个受到特别邀请的客人背叛了领导层的热情款待，那个人就会被谴责为恶棍和流氓，以做效尤。

意大利共产党人、电影制作人米凯兰杰洛·安东尼奥尼就属于这种情况。1972 年，安东尼奥尼获准去中国拍摄一部纪录片。当他制作的影片《中国》以实际情况介绍中国人而不是以一种革命的场面介绍英雄人物时，对他展开了一场历时几个月的批判运动。相比之下，埃德加·斯诺制作的一部关于南京长江大桥建设情况的影片就没有危及他下次得到前往中国的签证。

中国拒绝向曾经公开批评中国领导层侵犯人权的美国学者和作家发给前往中国访问的签证，或者在向他们发出签证之前迫使他们实际上是通过公开作宣传的方式征集到美国著名人士的支持。撰写过几本介绍中国的书的作家、会讲汉语的奥维尔·谢尔自 90 年代初以来在这方面就遇到了麻烦——毫无疑问是由于他与人权监视组织的关系。1996 年 8 月，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中国文学学者佩里·林克在一家饭店的房间里被拘留了一夜，次日早晨被送上飞机离开中国。公安局的四位官员轮流在林克居住的房间里的另一张床上睡觉。他说：“他们切断了饭店房间里的电话，因此我无法与在北京等我的朋友取得联系。”（注 12）另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里尔近年来对中国的人权政策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并且与持不同政见者交上了朋友，他向中国提出的入境签证申请同样也遭到了拒绝。澳大利亚出生的特里尔与谢尔和林克一样，能讲流利的汉语，但他的情况比较有意思。在 70 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对西方开放的时候，他写文章赞扬毛的中国，因而得到了通常给予“中国的朋友”的特殊待遇。但他在 1995 年受《全国地理杂志》委派采写一篇关于长江三峡的文章时，中国拒绝了他的入境签证申请。1996 年，《全国地理杂志》再次委派他采写一篇关于香港及其与广州的关系的文

章，中国再次拒绝了他提出的签证申请。再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他出席一次关于毛的诗词的研讨会。他把研讨会的邀请信和他的入境签证申请寄给了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过了几天，他收到一封用没有信笺抬头的白纸手写的通知，说他需要由中国的东道主发出的另一封信，但是，等到他把一切都办妥的时候，研讨会已经开始了。

谢尔写到：“他们显然不在乎把拒发签证作为对没有在某些关键问题上遵循意识形态方针的人进行惩罚的手段。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的确有一种威胁因素使得许多人由于担心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三缄其口。被排斥的威胁感觉是强大的，对于依靠同中国的交情为生的外国新闻记者和作家们来说。这种感觉同样也很强大。”（注13）

大约有五六位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学者事业兴盛，部分原因是他们具有作为分析家的才能，但部分原因也是他们能够同中国的高级阶层接触。这些人非正式地为白宫出谋划策，陪同美国公司界或政界要人去中国访问，撰写有关中国政治问题的学术分析。这些学术界专家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韩素音或埃德加·斯诺有相同之处。但是，鉴于中国政府的性质，如今的学术界专家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冒犯了中国人，他们与中国人的交情就会被切断。如果说北京为了让美国学者们换取交情而要求他们奉承，那是不公平的。中国领导人并非这么简单。与中国官方保持密切接触的政治学家们还知道中国领导人如何考虑问题，这是珍贵的知识。他们就中国的政治问题撰写了有用的文章。但是在某些问题上——诸如毛主席的声誉或人权问题，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中国人对西藏的控制——最好的办法是，要么奉承，要么保持沉默。北京对这些问题予以密切注视。那些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的人能继续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受到副总理的接见。那些不按照中国的规则行事的人，就不会受到接见。

严格他说来，上面提到的普遍规则更适用于企业界，在商业领域，中国人在利用交情对美国的政策施加影响方面堪你好手。中国人取得这项成功的最出色的方面是，由那些最有可能从通融政策中获得好处的人敦促公众和政府实行通融政治的方式。

这种方式的作用过程是这样的：前政府官员——其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有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和阿尔·黑格，也包括前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伦特·斯夸克罗夫特等人——担任与中国做生意的公司的顾问。顾问的任务是提出建议。但是在中国，企业和开展经营所需的许可证是由自私的、能自身长久保持存在的政界上层人士控制着，外部顾问们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同这些上层人士接触。

美国前任驻北京大使李洁明说：“如果某位顾问想为他的主顾——比如说美国某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获得一项颇有竞争力的合同，达成交易的部分内容是这位顾问要为中国说话，或者他将把国会或新闻界的代表团弄到中国访问。”那位顾问认识中国领导人，能请他们会见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公司付给这位顾问报酬。这位顾问为了加强他与中国权力掮客的极力重要的交情，他将会公开表示支持中国实行的政策。李洁明说：“这一点从来不明确地写进合同里，但是人人都知道所达成的交易。”（注14）。

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不几天，基辛格发表了一系列谈话和专栏署名文章，使他完全归入传统的“中国的朋友”一类。在国会要求对中国实行制裁，布什政府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种要求的时候，（注15）基辛格对美

国广播公司记者彼得·詹宁斯说：“我不主张对中国实行任何制裁。”就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天，基辛格撰写的专栏文章称邓小平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比较有人情味的、不那么混乱的道路”。（注 16）基辛格所说的实际上并没有错，虽然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不久说这番话，似乎有点阿谀奉承的味道。更切题的是基辛格建议布什总统不要对中国采取将有损于“美国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的任何措施。基辛格在另一篇专栏文章中批评国会通过的制裁中国的决策超出了布什总统所建议的范围。他在那篇专栏文章中还发表了以下这句惊人的言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容忍其首都的主要广场被数万名示威者占据 8 个星期之久”，那种动乱和混乱使得镇压“不可避免”。基辛格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中国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能因一时的情绪冲动而危及两国的关系”。（注 17）

基辛格对镇压行动的“残暴性”的确表示震惊，但他在通篇文章中只是敷衍了事他说了这么非常简短的一句。基辛格发表的言论的总体趋势是为中国当局寻找借口。7 月底，基辛格发表专栏文章反对制裁中国。11 月份，基辛格访问中国，会晤了中国外长钱其琛。钱其琛赞扬这位前国务卿具有“政治家的胆略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邓小平是基辛格和他带领的一批人（他陪同的是一个企业代表团）在那次访问期间会见的人士之一。他与邓小平彼此热情地打趣说，他们都已不再当政，成了普通公民。（注 18）回到美国以后，基辛格在白宫受到晚宴招待，把他同中国最高层的谈话情况作了汇报。

基辛格在一年之内可以数次去中国访问，中国永远对他敞开大门。1990 年 9 月，他会见了李鹏。李鹏设宴款待基辛格夫妇，宾主在宴会上彼此热情祝酒。（注 19）第二天，基辛格前去拜会江泽民。江泽民指出，那次是基辛格第 18 次访问中国。因此，他对中国的访问在继续不断地进行。1996 年 4 月，就在中国为了试图恫吓迄今在一个华人国家首次举行的总统自由选举而向台湾附近发射导弹的几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再次访问中国，并会见了荣毅仁、江泽民和李鹏。（注 20）在此前不久的 3 月 31 日，基辛格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行动”一笔带过，然后又不惜耗费笔墨为中国辩解。他写到，鉴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前去访问感到不满，北京必须“划定一条界线”；他告诫说，如果中国觉得自己的主权受到威胁，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战斗”。（注 21）

基辛格 1995 年 7 月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他在中国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作了概括。他认为，中国曾经作为抗衡苏联的力量而有益于美国。如今的中国凭着自身的实力而对美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亚洲的稳定起到关键作用。中国的周围是一些力量在日益增强但并不一定对中国友好的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印度和俄罗斯——它需要美国帮助防止任何国家在亚洲称霸。基辛格写到：“美国和中国出于自身的原因，都反对某个霸权国家主宰亚洲。”因此，“中国需要美国帮助平衡它与强大邻国的关系……至少在它强大到能够自己做到这一点为止。”（注 22）

在我们看来，基辛格恰恰忽略了中国的所作所为的许许多多因素，包括它加强军事力量的程度，其目的确实是为了防止某个强国单独主宰亚洲，除非那个强国就是中国。基辛格认为，人权“必须永远是美国关切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他没有提出如何使这个问题成为中心关切的任何具体建议，所以这番议论不过是空谈。无论怎么说，我们证明在美国撤消贸易压力以后，

中国的人权形势出现恶化的人，而基辛格并未对此作出解答。顺便说一句，基辛格对中国的看法几乎与中国领导人自己发表的公开言论相一致。我们认为中国领导人在说谎，而基辛格所说的也是错误的。

基辛格在表达他对美国应奉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的看法的同时，并没有说明他敦促美国政府奉行的政策究竟使他本人获得了什么样的好处。基辛格创办的基辛格同仁公司代表着谋求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许多公司，这些公司向基辛格支付大笔资金，至少部分是由于他与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士具有别人无可比拟的交情。基辛格历来以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语言发表议论，他毫无疑问相信自己所说的一切。举个例子来说，1988年，他呼吁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转让，称中国是友好的不结盟国家，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荣毅仁的响应。（注23）但基辛格是从可能希望向中国出售技术的公司收取报酬的主要咨询者。他在头上戴着一顶地缘战略家的帽子时，可能认为，为了与中国建立战略联盟，向中国转让技术是合乎情理的。但是他在戴上业务咨询者的帽子的时候，可能从这种转让中获得好处。当然，对于基辛格来说，1989年若对天安门广场事件表示震惊和反感而不强调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会危及他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特殊关系，可以保险地假定，这种特殊关系正是基辛格同仁公司在中国咨询活动的关键。

基辛格在1989年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他创建的取名为中国投资公司的同仁公司刚刚成立不久。成立该公司是为了同经常在北京接待他的东道主荣毅仁领导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合资企业。1988年，他成立了中美协会，好几位美国前总统是中美协会的理事会成员。该协会为来美国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举行宴会，并派遣代表团去中国访问。在他的公司主顾中，有同中国做生意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可口可乐公司、美国运通公司、美亚国际保险公司、大陆谷物公司、N·J·海因茨公司、大西洋富田公司、米德兰银行、S·G·沃伯格公司等等。（注24）据民主党全国政策委员会的斯科特·汤普森透露，上述公司中至少有6家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如果执行了美国国会建议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实施的制裁，这些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很可能会受到损害”。（注25）

《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翰·菲亚尔卡在报道这些公司的经营利益时，使基辛格有机会对所传的假公济私作出反应。他援引基辛格的话报道说，“说我为了我的主顾的利益而公开讨好中国政府，令人感到气愤”。（注26）几个月之后，基辛格对于把他在中国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他的经营利益相联系称之为“麦卡锡主义”的一种形式。（注27）我们并不怀疑基辛格的诚实。中国采取的方针并不是强迫人们表达他们不相信的观点，而是让那些发表文章或讲话赞扬中国而又保留任何否定的观点的人享有特权式的交情。不过，在公私利益冲突明显存在的时候，把谈论这种利益冲突的人扣上“麦卡锡主义”的帽子也是过分的。正如斯科特·汤普森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基辛格的确从在中国有大笔投资的公司得到了大量的报酬，那些公司通过采纳他的主张而获得了好处。”（注28）事实还表明，由于中国在做生意方面采取特殊方式，美国前高级官员又愿意帮助中国做生意，结果形成了某种新的和强大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也许只是巧合，这个院外活动集团不愿批评北京的人权记录，告诫不要同中国“对抗”或对中国实施制裁，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当然，基辛格是一位独特的人士，像他这样的人不论公开立场如何，只

要他不是接连不断地发表反共言论，几乎都可以在中国受到特殊待遇。中国人正确地把冻结了二十多年的中美关系的解冻和两国官方接触的开始这一突破归功于基辛格和尼克松。但基辛格是中国人结交的一批美国前高级官员中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人士。这一批人同中国领导人建立的特殊关系使他们获得了好处，他们一直不断地鼓吹要避免两国发生冲突，避免制裁中国，避免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他们所持的关于美国利益的观点汲受尊敬，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关于中国的讨论。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基辛格确实提出了一次小小的抗议。他推迟了原定于1989年10月份对中国的访问，因而他未能在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10周年的庆祝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但是基辛格成立的美中协会的成员之一阿尔·黑格却前去参加了庆祝活动。诚然，值得注意的是，基辛格的助手或以前的助手们在多大程度上利用旋转门同中国做生意，实施美国的外交政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在主要报纸上发表专栏署名文章。天安门镇压行动过后不久，布什总统派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前往北京进行修补关系的秘密访问。斯考克罗夫特在进入布什政府任职以前，曾经担任基辛格同仁公司的副理事长；伊格尔伯格在出任布什政府的副国务卿之前，曾经担任基辛格同仁公司的总经理。《纽约时报》报道说，伊格尔伯格1988年从基辛格同仁公司获得了67.4万美元的报酬；斯考克罗夫特作为该公司的顾问，获得了29.3万美元的报酬。（注29）早在1991年，即天安门事件之后仅仅两年，伊格尔伯格就告诫不要对中国进行制裁。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写到：“我们坚信，无条件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将最有利于推动积极变革和增进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他争辩说，同中国全面“接触”是使中国回到“自由道路”上来的最佳办法。（注30）

基辛格的美中协会理事会成员有赛勒斯·万斯、黑格、前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罗伯特·麦克法兰和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除了基辛格之外，黑格也许是显然拥有多种公共职务的人士，这些职务正是北京同他所代表的公司主顾做生意时所需要的。黑格在担任国务卿期间，是里根政府负责与中国谈判1982年中美联合公报的首要官员，那个联合公报是指导两国关系的三个关键声明之一。‘美国在那个联合公报中同意永远不奉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同意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上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以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黑格在那个联合声明签署以后不久离开了政府。北京对他在削弱台湾的地位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激。黑格不久就从这种感激的态度中得到了好处。

例如，《华尔街日报》报道说，80年代中期，国际信号与控制公司付给黑格60万美元的费用和聘用定金，部分是由于他帮助该公司向中国出售了武器引信。（注31）黑格多年来一直担任总部设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联合技术公司的高级顾问。该公司从事喷气发动机和升降机制造，在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公司中排名第16位，在美国出口额最多的公司中排名第10位，1996年在中国有17家合资企业。黑格频繁地陪同该公司的高级主管人员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晤。例如，1996年，他陪同联合技术公司总经理乔治·戴维会见了李鹏，黑格当时并不是美国政府官员，但他在那次会见中重申“美国保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注32）

1981年以后，黑格只有4年时间没有去中国访问。在黑格对中国进行的大多数访问中，他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李鹏、江泽民以及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荣毅仁的接见。黑格是出席1989年纪念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的唯一美国人。

另外两个联合公报是1972年发表的上海公报和1978年发表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原书脚注（注33）黑格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一道出现在观礼台上。几天之后，黑格受到李鹏总理的接见，李鹏充满深情他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尼克松、基辛格、黑格等老朋友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注34）

与此同时，黑格还发表了一些署名文章或谈话，反对试图因中回的人权问题与中国对抗，敦促美国寻找比以前更大的合作机会。1996年春，一批试图给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的众议员当中，有一位是正在上升的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人克里斯托弗·考克斯。那一年的早些时候，考克斯在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决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那项决议宣称，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美国有义务援助台湾。那项由80名民主党与共和党议员联名提出并于3月7日获得通过的决议，对于克林顿总统决定派遣第二支航空母舰的特混舰队前往台湾海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就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进行表决的前一天，黑格打电话给考克斯，对他严加痛斥，指责他企图破坏美中关系。考克斯的助手马克·莱贡说：“考克斯怒不可遏。考克斯绝对没有约黑格给他打电话，黑格打那个电话是不合适的。我们猜测有人买通他打那个电话，但是我们无法查出那个人是谁。”

对基辛格、黑格以及诸如伊格尔伯格和斯考克罗夫特等人为一方，与美国前任驻中国大使李洁明（他没有出席中国1989年的国庆节庆典）为另一方进行比较，颇有启发意义。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李洁明一直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他认为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冲突，美国有义务保护台湾，防止北京用武力接管台湾。不用说，只有像黑格这样的人士才能够获得同李鹏、江泽民和荣毅仁建立有利可图的交情。不知人们是否想过，如果李洁明决定投身于咨询活动，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同样的成功？

我们并不是说黑格给予联合技术公司的帮助是错的，也不是说联合技术公司与中国做生意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可以这样认为，联合技术公司同中国做生意有益于美国经济，它同其他公司一样，也应当利用一切竞争优势打入中国市场。值得怀疑的是像基辛格和黑格这样的人士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力去推动一些政策，从中获得很大的好处。最露要的也许是，新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使人产生这样的幻觉：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个善良的、温和的、防御型的国家，它的长远利益与美国的长远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参议院一位助手对我们说：“我们无法就时华政策展开有意义的辩论，因为，归根结底，几乎整个权势集团都想继续保持现状。”

对于了解当代历史的人来说，“中国院外活动集团”这个词使他们回想起亨利·卢斯和参议员威廉·诺兰等一批人。那些人的目的是推动把在台湾的国民党作为全中国合法政府的事业。今天的中国院外活动集团推动的是北京的事业，自从这个院外活动集团在1994年就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展开的辩论取得胜利以后，其活动变得越来越积极。这个集团由好几个联系松散的部分组成，通过中国让它们建立联系、交情或获得好处而全都受到鼓励。

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在把人权与贸易最惠国地位脱钩方面取得的成功，标志着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从那时以来，企业界对美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肯定超过它对美国对外政策其他方面的影响。

有些时候这表现在家庭中。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小贝内特·约翰斯顿在一次对中国进行贸易访问时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那次访问的部分旅费是用该州资金和联邦资金支付的。约翰斯顿的两个儿子都参与推动同中国的商业交易。后来，约翰斯顿然后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亲爱的同事”写信，要求该委员会撤销对被中国人占领的西藏的支持，并提出帮助安排该委员会成员与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举行会晤。（注 35）国会一位内部人士告诉我们，国会一些工作人员称约翰斯顿参议员是帮助中国大使“安排约会的秘书”。

中国针对美国国会开展工作的中央领导工作小组是由江泽民亲自挂帅的一个保密的高级别小组。这个小组于 1995 年底成立，其目标是提高中国对美国政界的影响。它只对由七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它的成立反映出中国进一步认识到对美国立法机构的成员直接开展游说活动的重要性。（注 36）中国过去由于极不重视美国的政治运作程序，因而想对美国政界施加影响所作的努力收效甚微，但近来在这方面作出了更大的更巧妙的努力。仅 1996 年 4 月份，江泽民就分别会见了由美国参议员率领的三个国会代表团。1995 年初，中国大使馆把负责同国会联系的联络官员的数目从两人增加到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奉命对美国的决策过程进行研究，以便中国领导人更好地了解如何对美国的行政和立法机构施加影响。（注 37）

中国人的行动有时可能遭到令人感到滑稽可笑的失败。1996 年 1 月，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据说现在是中国负责处理对美关系的高级官员）向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国参议员暗示，希望国会在大选之年不要就两国关系提出任何不利的法案。俄亥俄州参议员约翰·格伦答复说，刘华秋显然不了解美国政府的工作程序，否则他会知道，谁也无权下令国会议员不要就中国问题提出某项议案。（注 38）但是在其他一些场合，中国院外活动集团发挥了人所共知的显著而又精明的影响力。1994 年，在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结束了对中国进行的不成功的访问（他在那次访问期间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却遭到了拒绝）之后，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对克里斯托弗说：“甚至在你的飞机还未（在北京）降落之前，K 大街的那帮律师、顾问和特别代表们就告诉中国人说：‘别为他犯愁。’”（注 39）

中国人采取的另一一些行动是它为了对美国的舆论施加影响所作的长期努力的一部分。中国向在美国出版的好几家中文报纸和开播的华语有线电视台投入资金，这些媒体几乎是以与中国本国的媒体相同的方式运作的。（台湾也控制着它自己的媒体，但他们采取亲台立场的同时，还在风格和内容上反映出台湾自身较大的民主自由。）中国还听取了国际公关公司就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中就有一个是由希尔—诺尔顿国际公共事务公司提出的：“在努力确保无条件延长贸易最惠国待遇时，应当开展活动改善中国在美国的全面形象，表明中国是美国有价值的贸易伙伴，中国与我们具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注 40）

然而，最重要的是“K 大街的那帮人”——指的是在华盛顿的一条大街上设有办事处、由在中国拥有最大的经济利益的公司领导和提供经费的许多

游说分子。其中从事为中国开展游说活动的最有影响(虽然不是实力最强大)的机构有美中商务委员会、美国贸易问题紧急委员会、美国商会、全国零售商联合会和全国制造商联合会。但是在对华政策上最有发言权的是各公司的主管们。一位与这些亲华机构关系密切的人士对我们说：“这些人只需打个电话就能把事情办成。”1996年初，一些公司的主管们又成立了一个亲华团体——“中国正常化计划”，并且很快成为亲华游说活动的先锋。这是一个临时联盟，其主要成员包括波音公司、摩托罗拉公司、联信公司、卡特彼勒公司和美亚国际保险公司。“中国正常化计划”就在波音公司设在首都华盛顿的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个团体似乎很有钱。它开展的活动包括向全国各地的教育机构和教师个人散发宣传册子。例如，有一本印刷精美的厚两英寸的宣传册子中印有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向中国出口的数字，它的文字部分所说的意思是这些出口为这两个州创造了就业机会。然而它只字未提从中国的进口，以及美国制造业在国外的经营可能使多少人失业。

“中国正常化计划”是企业界日益加强游说活动的许多迹象之一。例如，1996年9月，包括摩托罗拉公司、联合航空公司、阿瑟·安德森公司、卡特彼勒公司、迪尔公司在内的一批公司(这些公司的总部全部设在芝加哥)在芝加哥宣布，成立支持美中商业关系的伊利诺伊联盟。摩托罗拉公司的亚洲最高主管里克·扬茨说：“伊利诺伊州的就业机会依赖贸易，同中国的贸易是一系列产业未来发展机会首先依赖的因素。”(注41)这个团体在它散发的新闻材料中宣布，其目标是“鼓励联邦、州和地方各级的公共政策，支持美中两国贸易关系的正常化”。

“贸易关系正常化”是什么意思呢？据伊利诺伊州这个团体发表的声明，首先是“永久性地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第二，它的意思是“让中国以商业方面可以接受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第二点上，该团体并没有具体说明是以谁可以接受的条件。但是，美国之所以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原因在于中国实行的贸易和关税政策，正是这些政策造成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出现了338亿美元的逆差。但是，伊利诺伊州的这个团体并没有完全掩盖它对中国的同情。这个团体在成立的时候宣布，它于9月20日在芝加哥里茨一卡尔顿饭店招待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9月20日，钱其琛向这个团体的成员发表了讲话，值得注意的是，钱的观点与这些企业界人士的观点不谋而合。他呼吁“无限期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钱在讲话中还含蓄地发出了一个警告，这个警告最早是由邓小平几年前发出的。钱其琛强调地告诫说，如果美国不给予中国更优惠的贸易条件以便使中国经济继续改善，美国将承受后果。他说：“如果中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人民遭受贫穷，甚至发生造成难民大规模外流的社会动荡，将会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真正的威胁。”(此话系据原书英文译出——译者注)(注42)

在芝加哥招待会的同一个星期，全国制造商联合会的成员在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也提出了这个论点，这决非偶然。波音公司资深副总经理劳伦斯·克拉克森在听证会上说，就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展开的反复辩论造成美国的对华政策“缺乏预见性”，给美国的企业界造成损害。他说：“欧洲像对待它的大多数贸易伙伴一样，在永久性的基础上给了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或者标准的关税待遇。北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政策上的差别，并且显然因此而在今年4月向欧洲购买了价值15亿美元的空中客车飞机。”(注43)

这里得出的教训是，中国力图把它的国际政治议程强加给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使这些公司感到不安。但是这种不安并没有达到促使它们撤离中国的程度，而是促使它们比以前更积极地为中国的卖力气。

没有任何公司能像波音公司那样成为最富戏剧性的例子。在 1993—1995 年间，波音公司每生产的 10 架飞机中就有一架出售给了中国航空公司，约占中国整个航空市场的 70%。为了保住这个市场份额，波音公司似乎愿意为中国政府做任何事情。斯坦利·霍尔姆斯 1996 年在《西雅图时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描写道，波音公司的主管们时常提醒中国领导人，该公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为中国做了事，中国领导人要求做更多的事。

霍尔姆斯报道说，波音公司与中国之间的交换条件是完全而又明确的：“波音公司不仅为延长中国今年的贸易最惠国地位展开游说活动，而且还同其他大公司一道争取为中国提供‘永久的最惠国地位’。波音公司国际问题首席战略家劳伦斯·克拉克森承认，如果波音公司不为中国供货，‘那么我们就糟了。’”（注 41）参议院一位工作人员在谈到波音公司的游说人员时这样说：“每当谈到中国的时候……他们就无处不在，笑容可掬。他们通过掩护性组织这么做，他们发表关于出口情况的研究结果，他们知道他们的供应商在何处，他们向这些供应商施加压力。”（注 45）

参议院一位资深工作人员在谈到 K 大街的那帮人时对我们说，决策机构中想对中国的人权给予某些重视的那些人，往往被在国会山为中国效力的势力越来越强大的企业界游说集团打垮。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中国投资，企业界每年都花费千百万美元来对付我们。”

第五章 贸易逆差、技术转让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限公司

人们可以在美国的许多玩具商店里买到逗人喜爱的 Spunky 狗和猫咪公主。这两种玩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分支机构——确切他说，是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供应大部分武器的军械公司北方工业公司下属的一个子公司——生产和出口到美国的。据估计，北方工业公司目前在美国各地设立了 10 家子公司。

许多美国人将会吃惊地了解到，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中心的中国军界工业集团在美国设立了多家有限公司，出售产品和获取技术。劳联—产联研究人员已经查明，在美国有 10 个他们称之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办的企业集团，每个集团通常都有好几家分公司。其中许多公司经营各种业务：各类进出口产品的运输、经销，产品从冻鱼和调味品到武器和检修的发动机。中国武装部队拥有的许多公司中，有两家公司的活动 1996 年被曝光：联邦调查局破获了旧金山一个走私集团企图把 2000 支 AK—47 冲锋枪运进美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联系的两家公司——其中一家是北方工业公司，另一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的保利技术公司*关于中美贸易的真相，请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7 年 3 月 21 日发表的报告《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编者注（PolyTchnologies）——参与了这起武器走私活动。

中国军方向美国出口玩具和冻鱼是为了赚取它实施军事现代化计划所需的外汇。自 80 年代末以来，向美国出口产品已成为中国赚取外汇的最可靠的办法。的确，1996 年 3 月，美国商业部宣布的贸易数字标志着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里程碑。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在前几年迅速增加的基础上，首次超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1996 年 6 月，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 33 亿美元，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为 32 亿美元。）（注 1）但是，同年 8 月份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进一步增加到 47 亿美元，比日本的对美贸易顺差多出近 10 亿美元。（注 2）这些数字表明，1996 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很可能将超过 400 亿美元，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限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活动只是世界上发展最迅速的中美贸易关系的一个部分。鉴于美国与盟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造成了持续多年的问题，美国与不结盟的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更是即将出现问题的不祥之兆。

多年内，中国曾是个裹足不前的巨人，是个落后的国家，经济上的竞争力远远不如比官小得多的台湾或韩国。自从邓小平 1979 年实行的经济改革把这个国家推向前进，为美国公司提供了几十年来首次同中国真正做生意的大量机会，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但是两国间 1996 年 6 月的贸易数字揭示出中国遵循的对外贸易模式令人忧虑。经过多年的自行其是，中国如今奉行有意识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战略，这种战略强调出口、技术转让、资本输入和对国际竞争设置高高的壁垒。贸易数字所显示出来的不祥之兆是，它表明中国在仿效率先实施“有指导的资本主义”战略的日本，并在此过程中使美国在两国的贸易中出现了巨额逆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日本的 10 倍。

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对日贸易逆差并不是新鲜事，30 年来一直存在，直至 90 年代中期，对日贸易逆差终于开始逐步下降。相比之下，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直至 80 年代中期，美中两国的贸易额大致平衡。例如，1988 年，即邓小平设计的经济腾飞的第九年，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为 35 亿美元，这个数字在美国的全球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微不足道。7 年以后，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增加了近 10 倍，大约为 338 亿美元。在这期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上升到 455 亿美元，出口额为 117 亿美元。这种比率极不平衡，中国的对美出口额是它从美国进口额的 4 倍。这种比率自 1990 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直至 1996 年年中，美国商业部能够提供的两国双向贸易最新统计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后贸易竞争的整个历史中从来没有使美国处于如此不利的地位。1996 年上半年，日本的对美“出口优势比率”为 1.6 : 1。日本的对美出口额为 567 亿美元；进口额为 345 亿美元。

美国一些专家争论说，美国的对华贸易形势并没有这些数字表明的那样严峻。一种论点是以所谓的香港变量为基础。这种论点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香港的企业家们为了利用中国的低工资劳动力而把他们的工厂迁到中国以后出现的。这就是说，在中国迅速增加的对美贸易顺差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转移到中国的香港现有企业的贸易额。诚然，如果人们看一看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中国和香港的贸易数字，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增加的同时，香港的对美贸易顺差出现了下降。但是从贸易统计表中可以看出，这种暂时现象到 1991 年已结束。自那以后，香港控制的工厂由于能够获得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劳动力和土地供应而继续增加产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至少已有 5 年时间并没有被香港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所抵消。

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企业界的亲华游说机构——尤其是美中商务委员会——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缩小美中贸易不平衡的严重性。这种论点认为，商业部公布的对华贸易逆差被夸大了，因为商业部没有把香港作为中国对美出口和美国对华出口中转站即转口贸易的因素考虑在内。美中商务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中美两国在贸易统计数字上的巨大差异是由于香港在中国贸易中发挥的越来越大的转口作用所致。”（注 3）事实上，香港的这

一个变量并没有使情况发生多大的变化。如果把香港包括在中国的贸易数字之内，其总数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 1995 年为例，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为 39 亿美元（从香港的进口额为 103 亿美元，对香港的出口额为 142 亿美元）。这个顺差数字只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大约十分之一。

经常用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重要意义的一种比较有说服力、但仍然不能令人信服的论点是，围绕中国实际上无限的廉价劳动力做文章。这个论点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的成本将越来越昂贵（情况历来如此），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优势将会消失。中国目前在为美国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拥有巨大的相对优势当然是事实。的确，这些产品——尤其是成衣、玩具和鞋类——在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各类产品中几乎位居最高位置。作为自由贸易和相对优势概念的信奉者，我们对于那些反对这类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人提出的论点并不感到信服。事实上，我们认为这些产品的“大量涌入”对于大多数收支状况紧张的美国家庭来说是一种好处。诚然，中国生产的成衣、玩具和鞋类给美国从事这些产品生产的行业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美国许多公司在把它们自己的生产和力量转移到中国以后仍然能够盈利。这就是说，美国这些行业中有数目众多的低收入工人失去了就业机会。例如，费城《问询报》在受到大肆宣扬的题为《美国：谁偷走了梦想》的系列文章中认为，在 1986 至 1996 年的 10 年中，中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造成了 68 万美国人失业。该报的文章说：“这些人每年 110 多亿美元的工资和所得税都永远丧失了。”（注 4）

但这种说法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问询报》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即在制衣、玩具或鞋类生产行业失了业的人员都未能在其他行业找到就业机会。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已经在其他行业找到了职业。新的职业同过去一样，也是低工资，但是并不比过去低。此外，由于购买中国生产的价格较低的产品花费较少，同多数美国人一样，如今在快餐馆就业的人比他们以前在服装厂工作时经济上稍好一些。

不论怎么说，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谈到，劳动密集型行业在中国的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例自 80 年代开始一直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高技术增值行业在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例却在稳步增加。这种顺差越来越多地不再主要是中国人低工资的一个函数，而是中国这样一种战略的一个函数，那就是把某些产业的目标对准美国，并通过补贴和高额关税的体制使美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这就是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对美国有害、并且很可能在今后的双边关系中成为冲突越来越大的一个方面的原因之所在。

降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重要意义的最后一种做法是给它投上一层柔和的光线：中国是个贫穷的正在迅速发展的经济，它的经济增长率今后将不可避免地放慢。在这期间，鉴于它所处的发展阶段，中国在同它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贸易中自然会出现暂时的高额顺差。

但是这种论点也是错误的。教科书上的经济理论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目前就是如此——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它通常通过外国投资者获得所需的资金，把这种资金归类为一种进口，因而会增加正处在发展阶段的国家的逆差。亚洲的日本、台湾和韩国的经济在开始腾飞的时候，起初吸引到的外国资本很少。即使是后来，它们所需的大部分投资资本也是通过向盟国美国出口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获得的，从而积累了可以用于新的投资的大量贸易顺差。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它不仅从西方而且更多地从大中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获得了数目极大的投资资本。从历史上看，属于这种情况的国家会出现巨额贸易逆差。但是，中国一直从美国获得投资资本，同时还获得了贸易顺差。因此，中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对于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实际上，中国的外汇储备到 1996 年 7 月已达到 910 亿美元，这个数字使它与外汇储备最多的日本和台湾处于相同的水平。（注 5）除非目前的趋势自行改变，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快将超过台湾和日本。香港的外汇储备估计为 600 亿美元。（注 6）

这些外汇储备数字标志着急剧增长。截至 1993 年末，中国的外汇储备为 212 亿美元，已相当可观。（注 7）在其后的 30 个月时间里，中国的外汇储备数字增加了近 700 亿美元。在这同一个时期，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为 830 亿美元。

中国是如何取得这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业绩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运用了日本开创的方法，包括对出口行业给予补贴，在同外国公司的交往中强调技术转让，设立错综复杂的非关税壁垒，人为地使本国货币保持低汇率，为一些特定的产业制定产业政策，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方式使这些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美国报界只注意到中国总体战略中的一小部分，即中国在光盘、电影和计算机软件方面的盗版活动——这个问题在美国 1996 年扬言要对中国实行贸易制裁之后至少已暂时得到了解决。实际上，美国与中国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的冲突远远要比任何单一的问题所代表的程度复杂得多。更大的问题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产生了使竞争对它有利的多种方式。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于 1979 年抛弃了毛主义经济学，中国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开始腾飞。邓对农业实行了私有化，农村的生产率急剧上升。中国欢迎香港的工厂迁到相邻的广东省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然而，由于习惯于五年计划以及中央对经济的控制，中国领导人开头几年在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制定现实蓝图方面并没有多少主意。

当中国从 80 年代后期开始有意识地仿效东亚其他国家利用出口收入扶持高技术产业并取得相当高的经济增长水平的做法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最早注意到这种仿效过程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日本政策研究所所长查默斯·约翰逊，他特别指出，中国具体地是在仿效日本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有指导的资本主义的模式。

（注 8）

中国开始实施一种原始的和局部的由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形式。通过推行一项主要是由国家给予间接补贴和其他类型的优待本国产业的政策，中国的出口实现了巨大和快速的增长。1989 年，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5 年以后，中国的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3%。（注 9）在这同一个时期，中国开始获得全面的贸易顺差，只有一次出现了逆差，而且数目很小。

（注 10）也就是在这几年中，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长了 10 倍。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一项年度报告并没有引起报界和公众的很多注意，该报告跟踪和记录了中国当局通过补贴和其他办法人为地增加出口：“中国政府声称，已经从 1991 年 1 月 1 日开始……停止对各类出口给予的直接财政补贴。然而，北京仍然利用各种补贴办法推动出口。”（注 11）补贴涉及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投入”的一系列范围——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获准

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能源和原料；免交法律规定的诸如雇员退休金计划的款项；优先获得银行贷款，这在中国不仅意味着低息，而且根本不需要偿还。（注 12）

中国的多数出口补贴很难看得出来，因为这种补贴并不是中央的国家管理机构给予的，而是地方给予的。例如，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了河南省郑州市一家陶瓷厂非常能干的经理。在这家国营工厂破产以后，这位经理“建起了一条供节日使用的盘子生产线，美国市场的货架上摆满了这种绘有圣诞树和冬青树枝、售价 10 美元的节日盘子”。（注 13）尽管这种盘子大批出口，但这家工厂仍然出现了亏损。然而郑州市政府担心，要是负担新增加的 1700 名失业工人，开支太大，对这家工厂给予补贴所花的费用要比工厂关门以后发给工人的失业补助少得多。这远远不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中国的农村地区有数百万个乡镇企业属于出口经济类型，它们往往依赖地方当局给予各种补贴。

不论中国实行的出口补贴达到何种程度，这种补贴都扭曲了中国与它最大的主顾美国的贸易关系。但是，就在中国对包括一些亏损企业在内的某些行业给予补贴的时候，它在重点补贴增值更高的出口产品方面变得越来越精明。这些产品破人为地在美国市场上定为低价，不公平地削弱了美国产品本来具有的竞争力。这是中国从日本早先实施的产业战略中学到的比较直接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使中国出口产品的性质迅速发生变化。从低工资、劳动密集型活动转变为更多的高技术增值活动。因此，与人们广泛认为的相反，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产品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所占的比例自 1990 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我们对美国几年来的贸易数字进行分析以后看出来的。我们对美国自 1990 年至 1996 年上半年从中国进口的数量最多的 20 种产品进行了分析。我们把这 20 种进口产品分成劳动密集型产品（诸如成衣和玩具）和由于技术的采用而增加了价值的产品（诸如电信设备、机电和计算机）。*

这些分析得出的数字所表明的发展趋势是强有力和明确无误的。1990 年，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数量最多的 20 种产品的 79%；增值产品占 12%。到 1996 年上半年，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占

*我们把占 9% 到 15%、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的产品没有包括在进口数量最多的 20 种产品之内——其确切数量每年不同。——原书脚注 56%；增值产品所占的比例增长了一倍多，占 29%。这种趋势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持续，而且目前正在加快。

中国官员在谈到中国对增值产品的出口采取的补贴方式时总是讳莫如深，但是他们有时不留心也会透露出关于他们采取的补贴方法的一些信息。张吉（译音）是中国机电进出口总公司的一名负责干部，1995 年来，他在吹嘘中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比上一年增加 60% 的时候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一家专业银行向机电行业提供了优惠贷款。（注 14）换句话说，机电行业得到了财政补贴。

正如查默斯·约翰斯顿指出的那样，这些方法赤裸裸地仿效了日本几十年来采取的战略，即为某些有希望的行业制定增长目标，然后给予补贴和保护。美国贸易代表 1996 年发表的贸易情况报告尽管没有把中国与日本采取的

战略相提并论，但仍表明两国采取的方法显然是相似的：

中国越来越多地把重点放在某些“支柱产业”——包括机械、电子和汽车等行业——这一做法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1995年，中国的机电产品的出口额首次超过纺织品出口额……这表明中国的产品出口重点已不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1995年，中国的制成品的进口增长缓慢，而初级产品的进口……猛增。

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采用的一种手段是替代进口——尽管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手段通常不起作用。东亚国家的政府操纵市场，因而把大量进口的某种产品在国内生产，即使这样做的成本更高。中国在1992年同美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中宣称，中国已经消除了这方面的所有计划。（注15）但是，中国1994年宣布的一项汽车产业政策就有明显的替代进口的要求。在中国经营的外国汽车公司被迫使用中国生产的汽车部件，不论其价格或质量如何。正如劳联—产联贸易问题特别小组负责人马克·安德森解释的那样，这种规定直接损害了美国汽车部件生产厂家的利益。“就在中国制定的汽车产业政策生效之前不久，我们在两国的汽车贸易中获得了5.21亿美元的顺差。去年，我们同中国的汽车贸易出现了4.54亿美元的逆差。汽车贸易在仅仅两年时间里相差10亿美元。”（注16）

中国还是更加赤裸裸地实行旨在阻止进口或者使进口付出更高代价的各种保护主义的大师。美国贸易代表1996年4月发表的报告称中国是“高度保护主义”的国家，报告列举了中国为阻止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口所采取的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手段。平均达35%、最高达150%的“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关税”只是中国建立的贸易壁垒的一部分。中国还实行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进口限制以及要求提供产品标准和证明等措施。（注17）

有几次，中国的贸易管理机构对消除进口壁垒大肆宣扬，同时又悄悄地对同样的进口产品树立新的壁垒。例如，1995年11月份，中国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江泽民主席亲自宣布把4000种产品的关税至少降低30%。但是在降低关税的决定1996年初生效之前，中国又树立了许多新的非关税壁垒。即使没有树立新的非关税壁垒，有同中国做生意经验的外国商人也没有感到高兴。他们提醒新闻记者说，中国政府仍然只是向指定的公司授予产品进口权，这些公司大多是最终按政府的意思行事的国有垄断公司。（注18）1996年秋天，在中国为了避免美国扬言要采取的制裁措施而许诺打击盗版产品的非法生产之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仍然强调中国突出存在不公正的贸易做法的问题。她于同年9月份在国会作证时说：“中国必须停止树立新的贸易壁垒以取代以前取消的壁垒。”（注19）同样地，美国贸易代表的报告继续抱怨中国存在“限制产品进口的多种多样相互重叠的非关税壁垒”。

例如，1996年6月，广东省专断地宣布它将限制该省进口从汽车到“各种家用品”等各种外国产品。（注20）更近一些时间，北京宣布授予中央、省级和地方当局颁发不同种类的产品进口许可证的权力。（注21）被授予这种权力的各级政府当局在限制来自国外的产品竞争方面都有各自的既得利益，因为在外国产品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竞争中将会利益受损的部委和政府其他机构正是那些监督某种产品生产的部委和机构。（注22）

中国的总体经济战略不仅仅要通过对中国有利的贸易顺差实现重商主义的外汇积累，而且还要加紧获得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包括可供民用和军用的

“两用”技术。中国获得西方最先进技术的方法之一是要要求外国公司把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产品所使用的某些部件在中国生产。为了能够继续在中国做生意，美国公司不仅要向中国转让先进的制造技术，而巨还要帮助培训中国工人，从而虽保护了短期的利润，却又帮助造就了最终的竞争者。通常是打着“补偿”的名义这样做——为了保证在一个国家的产品销售，把产品的一部分生产转让给那个国家去做。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曾经多年采用这种做法。但是中国很快就成了从补偿中获得最大限度好处的大师。

一篇关于中国坚持不懈地寻求补偿的详细报道，重点介绍了麦道公司在上海建立一家工厂的经过。麦道公司是制造喷气客机以及美国空军使用的诸如F—15等主要战斗机的公司。80年代初，它渴望获得中国客机生产的一个份额，与中国国营的上海航空工业公司建立了一家合营企业。（注23）中国保证让麦道公司在窄体飞机的销售中占主要份额。作为回报，麦道公司同意让中国工人在上海的这家工厂用全套部件组装飞机。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对麦道公司为了在中国赚钱所作的艰苦努力进行调查时指出的那样，这种安排属于“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技术转让之一”。这家报纸报道说，麦道公司“提供了足够装满一个图书馆的技术资料”。此外，麦道公司的合资形式成了中国同其他高技术公司洽谈交易的样板。《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任何一家跨国公司，无论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还是通用汽车公司，如果不尽早地经常地向中国泄漏技术，就不要期望获得进入中国的通行证。”（注24）

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不一样，它在中国没有整机组装业务。但是，正如《西雅图时报》1996年报道说的那样：“波音公司为了消除它遭到的几次挫折和保护它在中国飞机市场所占的优势，前不久悄悄地加快了它在中国的生产。”（注25）在西安飞机制造公司，中国工人已经为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和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等航空公司订购的波音737飞机生产尾翼。麦道公司和波音公司都因向中国转让具有潜在的军事用途的技术而受到国会的审查。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担心波音公司向中国提供的广泛的技术转让不仅会损害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而且使中国获得了增强其军事能力所必需的技术。史密斯说：“这种技术转让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注26）

另一个例子是摩托罗拉公司，该公司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日益增长的业务，主要是移动电话、寻呼机及相关技术的生产和销售。最近，中国人不仅压摩托罗拉公司向中国转让它的一些最好的技术，而且还压美国一些与摩托罗拉公司供货关系并且非常愿意继续向摩托罗拉公司供货的独立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一位能够接近一家向摩托罗拉公司供货的公司的美国商人对我们说，中国人向这家公司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使用其最好的技术在中国开始生产，否则中国将另找其他供货商。这位商人举了一家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为如下的交换条件而苦恼：要保住它与摩托罗拉公司有关的在中国的生意，就得失去它的一些最好的专有技术。

实际上。“技术转让”是包含广泛活动的一个词。有些技术转让是公开的，合法的，总的来说对美国经济有好处。例如，中国公司有时买下美国一些被淘汰下来的不再产生效益并且往往造成严重污染的钢厂和造纸厂，拆卸以后运往中国。从另一个极端来说，有些活动是违反美国法律的。对中国的大多数技术转让属于介于这两极之间的灰色区域。《商业周刊》说：“在许多情况下，有关公司是在考验美国政策……的限度。”（注27）

一位监视中国人在这个方面开展的合法和非法活动的专家对我们说：“他们在技术转让方面比以前精明多了。10年前，他们甚至提不出恰当的问题。现在他们获得了更多的知识，因为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尤其是他们在美国有大批的交流学者。他们如今有了更多的资金，在美国，有钱就能办成一切。”据美国政府的另一位专家说，中国大约有15个省在美国建立了各自的公司，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搜寻技术。这些省级公司搜寻的重点是可以帮助它们各自所在的省发展经济的技术。但是国家级公司更多的是搜寻具有军民两用前途的先进高技术。

中国人在美国向国内转移高技术的活动，有相当大一部分毫无疑问是非怯的。中央情报局前不久把中国列为“广泛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三个主要国家之一。（注28）美国工业安全国际学会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加明确和令人不安。该学会1996年3月发表的题为《知识产权损失的趋势》的研究报告把中国列为最有可能窃取“敏感的经济信息”的国家。（注29）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限公司在美国的经营活动标志着中国调整它同美国的经济关系的最终方式，既是为了获取技术，也是为了赚取外汇。实际上，军队并不是中国在美国设有分支经营公司的唯一机构。事实上，现在还无法确定美国究竟有多少家由中国拥有的公司，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其数目已经达到数千个。据《商业周刊》估计，有一百家由中国拥有的公司“通过复杂的手段获得北美洲上市公司的情况，偷偷摸摸地进入金融市场”。（注30）购买已经投入运营的美国公司，是中国国营企业为增加它们的收入或策划技术转让而使用的另一种方法。《华尔街日报》具体报道过中国航空贸易机构——中国国家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在美国设立的分公司为购买能够为喷气飞机和导弹进行金属铸塑的非常先进的美国机床公司所作的努力。（注31）

另一个例子涉及西南产品公司，该公司为美国各大飞机制造厂生产专用的轴承。它生产的轴承不仅可供民用，而且还能供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天飞机和国防部的C—17军用运输机使用。西南产品公司被Sunbase亚洲有限公司买下，该公司是由一家中国香港集团控制的在美国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协会上市的公司，与中国东北哈尔滨一家轴承公司有直接的相互拥有所有权的联系。Sunbase公司的主管人员毫不隐瞒意在从加利福尼亚向哈尔滨那家轴承公司转移技术的事实。（注32）这种活动根据美国法律是完全合法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公司在美国开展的广泛活动似乎既是为了获取技术也是为了获取利润。由劳联—产联开展的一项研究——主要是对拥有直接出口权的公司的运货记录进行分析——发现：“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总部和大军区参与了贸易经营，而且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省军区（总共有28个军区）和许多集团军（总共有24个集团军）也有各自的进出口实体。”（注33）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公司似乎是总后勤部下属的一个实体新兴公司（译音）。该公司不仅作为它设在中国的各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的出口代理，而且还作为军队系统其他企业的进口代理。该公司1994年的贸易额将近160亿美元。北方工业公司在美国设立了好几家分公司——贝塔化学公司、贝塔玩具公司、拉林公司、福特照明公司（均系译音）等等——在美国各地销售产品。北方工业公司1994年的利润总额大约为310亿美元。劳联—产联职员杰弗里·菲尔德1996年6月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不会有任何人说我们应当支持给予中国人民解放军贸易

最惠国待遇……允许中国军队的公司在美国做生意……无异于为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提供补贴。”

从中国人所作的各种努力中可以得出好几个结论。一个结论是，若是像中国希望的那样看待中国，将是错误的。中国希望被看成是在艰苦奋斗的第三世界国家，它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唯一区别就是它的面积大许多倍。当然，中国直至前不久还的确是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它的技术和经济成就只限于很少的几个领域。中国能够制造原子弹，但它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是猪鬃。中国广大地区的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仍然与若干世纪以前没有多大区别，这也是事实。

正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的那样，中国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仍然处在远方时代的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一个是由数目众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的政府部门；一个是中国东部沿海的商业地区，即以前的通商口岸，这是冒险企业家、大学、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银行家、工业家和全球贸易家聚集的地区。现在应当加上第四个部分：位于其他三个部分之上的军界工业界联合体。这个部分的目标是提高国家的地位，使它变得富有和强大，使它完成重现昔日辉煌的历史使命。正是中国的这第四个部分使得当今的中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仅仅 20 年以前，那时的外国游客从中国的主要入境点香港进入中国，这一段路要分为好几个阶段。在九龙乘火车先到香港—中国边境的罗湖镇。旅客下了火车以后步行通过一座铁路桥，从一个叫深圳的过境点进入中国。从穿着宽大制服的检查游客护照和入境签证的人员所在的地方，可以听到附近农舍的鸡叫声。

深圳在 80 年代初被宣布为经济特区以后，如今已是个高层办公楼和饭店林立、交通拥挤和遭受工业污染的城市。成十上百亿美元的投资从香港流入这个城市。那里有购物中心、高档餐馆、夜总会和卡拉 OK 酒吧；有妓女、毒品交易者和古董走私者。工业建筑和厂房沿着珠江两岸向远处延伸，几乎与古城广州连成一片。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曾在广州打败中国人，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治外法权居住点。

在中国沿海，在厦门、上海、天津、大连和其他许多城市出现的同样变化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感到兴奋。这是 20 世纪最后几年世界上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千百万人的物质生活比以前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发展为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展现了新的贸易与交流前景。的确，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如果中国消除民族主义狂热并且最终成为更加民主的国家，美中两国之间存在的许多摩擦和冲突的领域很可能将会消失。然而，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中国同样有可能利用它的经济实力实现它主宰亚洲的战略目标，这些目标可能使它走上与美国冲突的道路。

即使那种情况不会发生，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仍既是一种机会又令人担忧。中国的人口数目毕竟是日本的 10 倍。40 年来，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曾经多次出现冲突和紧张。最起码说，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今后 40 年将会出现同样的冲突和紧张。但是中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还在战略上和军事上构成挑战。有一块重要的领土，中国仍然要得到它，美国有朝一日可能被要求予以保卫。我们在下一章谈这个问题。

第六章爆点：台湾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整个关系建立在一种假话的基础之上，但是中国准备

用战争来保卫这一假话。

——美国前外交官

台湾是美国人应该会喜欢的地方，近年来，这个地方逐渐从右翼独裁统治转变到全面的民主。这并不是说台湾是自由的楷模。台湾的政治是亚洲式的政党核心政治，使人想起昔日的坦慕尼协会*，台湾的反对派人士和其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指出这一点。然而，台湾是个活跃的地方，画廊和剧场，夜总会和出版社，时装店和电台电视台访谈节目，交通堵塞和健身俱乐部，应有尽有。台湾没有极为贫穷的现象，几乎没有暴力犯罪，污染相当严重，有丰富的艺术和反俗世陈规的东亚文化，民众见过世面，富有企业精神，经常旅行——这一切都伴随着一种靠不住的、含糊不清的、没有得到永久解决的国际地位，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假话之所在，中国准备为保卫这个假话投入*坦慕尼协会是 1789 年成立于纽约市的一民主党组织，初为慈善团体，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以腐败和滥用权力而著你，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编者注战争。

这个假话是在理查德·尼克松 1972 年 2 月对中国进行的突破性访问即将结束时于深夜在上海举行的一次谈判中形成的。谈判桌的一方是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另一方是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而刚刚在国宴上相互敬酒的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正在旁边的国宾馆里等候。基辛格和乔冠华面临着仍然存在于中美两国历史性和解道路上的一个最敏感和困难的障碍：台湾及其当时的近两千万人民。他们达成的解决办法堪称是外交辞令的一件杰作，这件杰作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关系得以发展，但是随着时间的消逝，它有可能失去价值。

按照中国的正式观点，台湾是个叛逆的省份，因而是中国的内部问题，或多或少如同美国的联邦政府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发生的争端。但是在 1971 年春开始的为最后实现尼克松访华而举行的谈判中，中国显然曾准备就它对台湾的正式立场作出重大的让步。在长达 23 年的时间里，美国不仅与这个“叛逆的省份”有着正式外交关系，而且还根据 1954 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假如中国向台湾发动进攻，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尼克松由于担心遭到国内保守派的批评，不准备废除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必须找到某种解决办法，使两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求同存异。这就是基辛格和乔冠华制造出的一个杰出而又必要的假话。他们两人为上海公报推敲出了下述内容的一段话，为美国恢复与中国的关系奠定了范围：

美国认识到，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原文如此。——编者注**这项条约只是到了卡特政府 1978 年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承认大陆政府是代表整个中国的唯一政府、终止同台湾的一切官方关系的时候才被废除。自那时以来，美国在台湾保留一个“联络处”，其人员是暂时从外交界“退休”的外交官。——原书脚注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基辛格后来写道：“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的这个段落把台湾问题暂时搁起来，每一方都保持了各自的基本原则。”（注 1）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对有关台湾的这几句话表示异议，理由是并没有对客观情况作准确的表述。罗杰斯认为，并不是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基辛格对这个反对意见置之不理，认为无

关紧要，是罗杰斯因为被排斥在谈判之外感到恼火而进行的蓄意阻挠。只对联合公报的内容作了一些最后的润色，但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未作改动。

然而，罗杰斯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提出的意见实际上是正确的，虽然他在那个历史时刻坚持他的意见正确，也许是错误的。当时和现在的一个事实是，在海峡台湾那边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当时和现在都没有接受联合公报中包含的内容。这是中国、台湾和美国仍然面临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消逝，台湾人民——现在有 2100 万人越来越多地行使着某种事实上的主权。台湾的民选总统、曾在日本和美国受教育的李登辉说过，“台湾人民是主权人民”。因此，美国在理论上承认这样的假话，即处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环境中的人全都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尽管美国实际上在致力于保持真正的事实，即那些人并不全部认为自己属于同一个国家。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美国—台湾的外交调整的结果作出的常规预测是这样的：只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要求不受到台湾方面为实现法律上的独立而采取的任何行动的嘲弄，北京将满足于保持现状。换句话说，北京在玩一种面子游戏，只要台湾不以某种形式羞辱北京，北京将允许台湾保持一种单独的制度和—个单独的行政当局。与这种理论相关的一种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台湾这两个实体之间的接触将促进经济和政治趋同，从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会出现一种正式的邦联，即某种形式的统一。这种看法认为，这两个国家已经发展了一种广泛的关系，使得它们双方都因利害关系而需要保持耐心和—有节制。台湾有三分之一的长途电话是打向大陆的。台湾富商在大陆的投资估计有 300 亿美元；诚然，中国对于台湾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增长地区，台湾拥有与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相融合的技术和资金。

最重要的也许是，时间的消逝削弱了双方曾经彼此感觉到的敌视。人们能察觉到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感到没把握和不信任，但没有仇恨，他们毕竟讲同一种民族语言，享有同一种文化的大多数成分。此外，实际上所有的专家一致认为，中国想通过武力——尤其是通过全面入侵夺取台湾的任何努力，不仅仅在军事上，而且会在好几个方面使中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台湾的武装力量做好了抗击入侵的准备。但是除了这一点以外，中国的经济和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还将会蒙受极大的损失，因此，诉诸军事入侵在今后十年时间里仍将是遥远和不大可能的。

但是，和平与国家利益是不能靠假定另一方友好和行为理智来获得，而是靠对事情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问题、利益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不一致作冷静的分析来获得。有一点是足够明显的，即随着台湾民主的成熟以及这个岛屿采取措施树立独立的形象，中国的行为并不一直是友好和理智的。这至少是可以从 1996 年 3 月份的事件中吸取的教训。

那场我们称之为台湾海峡危机的事件的公开方面已经众所周知，起因是中国对好几起广为宣扬的事情感到不悦。其中一件事情是美国向台湾出售了价值 60 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这项销售是布什政府批准的，其本身就是时中国从俄罗斯购买苏—27 战斗机作出的反应。中国还谴责台湾的李登辉总统为使台湾重返联合国而展开的活动。（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1 年被北京取代。）然后是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强大压力下撤消了早些时候作出的一项禁令，允许李登辉来美国并在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发表演讲李登辉利用这个机会树立台湾的独立形象。这尤其引起了中国的愤怒抗议。

1996 年年初的几个星期，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注意到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台湾对面调动部队。但是中国直至 3 月 5 日才正式透露，它计划三天以后开始在台湾海峡进行导弹试验和空军、海军实弹演习。选择这个时机是旨在扰乱定于 3 月 23 日举行的台湾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自由的总统民主选举。3 月 8 日，即在台湾选举开始前的 15 天，中国用机动发射架向距离台湾两个最大港口——北部的基隆港和南部的高雄港——非常近的目标区发射了 3 枚 M—11 中远程导弹，扰乱航运。

当中国官员重申拒绝放弃通过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局势就变得更加紧张。克林顿政府在中国开始导弹试验的同一天透露，独立号航空母舰及其率领的战斗群距台湾以东只有 200 海里。当中国的演习扩大范围的时候，克林顿政府于 3 月 11 日下令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及其率领的战斗群前往台湾地区。派遣两支由航空母舰率领的战斗群标志着美国多年来在国外以最坚定和最机敏的方式显示武力。

尽管中国激烈地抱怨说，美国的这一行动无异于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它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它的威胁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了，显露出是虚张声势。在那场危机刚开始的时候，中国一位官员对来访的一位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查斯·弗里曼说，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军事干预，中国准备对美国西海岸使用核导弹。李鹏总理告诫美国不要把它军舰开进台湾海峡。香港一家由北京控制的报纸声称：“通过导弹和大炮的集中火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使入侵的敌人葬身于火海之中。”（注 2）但是，当李登辉以高于原来料想的得票率在台湾赢得选举的时候，中国实质上已输掉了那场对抗。中国的军事演习结束了，美国的军舰也撤离了。

所有这一切，当时的报纸都作了报道，给人的印象是那场危机开始和结束都相当快，并没有留下长久的影响。然而，那场危机中有几个因素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这几个因素不仅有助于解释 3 月事件可能会有什么影响，而且有助于解释中国人为何首先要进行这种冒险。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严重失算，使台湾人民疏远了，却使日本和美国靠得更近了（我们后面将会谈到）。中国的确在这两个方面失算了，而且是相当大的失算。然而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那次演习可能是值得的。

从 1995 年末开始，美国和台湾的情报机构就收集列一些迹象，表明中国的计划并不止是实弹演习。这种情报是真是假还是中国故意散布的，都不能肯定。但是那些计划的内容是，中国打算占领台湾海峡中位于金门或马祖——福建省沿海由台湾控制的两个最大的岛屿——附近的某个小岛。得到的情报是，中国军队将占领某个小岛一天或两天，广播他们成功地夺取了那个小岛，然后撤离。其用意是为了表明台湾没有能力抵抗这样的袭击，同时也为了表明美国没有能力救援台湾。

台湾的国家安全局局长向当地一家报纸解释说，“中共做好了向我们的前线岛屿发动进攻、恫吓我们的总统选举的军事准备”。（注 3）无论怎么说，这种进攻没有发生。但是美国情报机构倾向于认为，为了制造一种使人对中国的意图捉摸不透的气氛，这种计划至少曾经考虑过。例如，1995 年 12 月份，那位中国官员对查斯·弗里曼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曾计划对台湾实施寻弹袭击，连续 30 天每天进行一次袭击——这是没有付诸实施的另一个威胁。（注 4）美国一位情报官员告诉我们说：“中国人采取的好几个行动是以前没有见过的，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我们无法确定中国人想于什么，他们知道这一点。”

有意制造这种使人捉摸不透的气氛，说明中国全套行动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恫吓台湾选民，而且是考验美国，看华盛顿作出什么反应。克林顿把两艘航空母舰派到西太平洋，这是美国的正确反应，清楚表明一旦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实际上，这一显示武力的举动使美国承担义务的程度之深，可能超出了克林顿的本意。派遣航空母舰，就树立了一个先例，即一旦中国在将来进攻台湾，美国就会干预。

然而，从其他方面来看，美国作出的反应使中国人有机动余地。那次军事演习中的一个很少引起人们注意的方面是，大陆对台湾实施了部分封锁——中国以告诫外国船只不要驶近为演习划定的禁区的方式实施封锁。导弹的射击目标在台湾的两个主要港口附近，这个事实进一步表明中国是在试验进行封锁的有效性。许多专家认为，实施封锁——即时台湾进行经济扼杀——是北京为迫使台湾接受统一而最有可能采取的办法。中国可以实施一系列封锁，每次的封锁时间比上一次更长，地理范围也比上一次更广。

比起中国对台湾发动直截了当的正面进攻，这种战略将会使美国更不知道该何时进行干预，事实上，克林顿政府未能针对中国 1996 年 3 月的封锁行动作出明确的回答，即使在航空母舰抵达以后也是如此。后来，当李鹏警告美国不要进入台湾海峡的时候，美国既没有对李鹏发出的警告提出正式抗议，也没有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立即派遣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借以表明美国不允许中国在今后的任何危机中确定规则。上一年的 12 月，克林顿政府派遣企业号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似乎向中国显示了某种威风。但是克林顿政府后来宣布说，企业号航空母舰是为了避开恶劣气候而经过台湾海峡的——这样说来，如果不是由于气候的缘故，美国海军派遣其舰只从这条特定的国际水道通过似乎就是不合适的。这一宣布使本来一个小小的成就变成了动摇和软弱。

因此，台湾海峡危机的结果是含糊不清的。从外交上来说，中国失利了。但它的确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台湾采取令它不悦的行动，它将会作出反应。中国还留下了在西太平洋同美国作进一步的意志较量的可能性，尤其是随着中国海军成为更强大更可靠的力量，更有此可能。台湾问题上的下一次对抗的参数可能已经确定下来了。

许多台湾人声称，他们的岛屿实现独立既有历史权利又有法律权利。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或强国愿意支持这种说法。然而，如果台湾人民不把自己模糊地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同时又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不合逻辑的。除了 1945 年至 1949 年的内战期间以外，台湾自 1895 年以来就一直未在大陆中国任何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五十年来，尽管台湾在理论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一条独立的道路，成为地区性经济一强，具有欧洲生活水平，享有中国人的一个大型实体从来没有享有过的最高程度的民主自由。即使是承认北京对台湾问题立场的国家也在它们的政策中保持某种模棱两可。它们不愿因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而得罪中国，但是在此同时，世界上的多数主要国家仍在台湾保持着半官方的贸易办事处，向台湾公民发放签证，不允许北京在任何问题上代表台湾的利益——不论是纺织品出口配额或者是武器销售，虽然后一个问题更难做到。因此，在实际做法上，世界各国在现实与上海公报的假话之间遵循一条微妙的方针，总的来说还把台湾作为一个特殊情况予以对待，就是说，它既不是中国真正的一部分。又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而是具有某种不同之处的地方。

此外，这种不同之处一直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中国的其他省份包括历来受中国控制的有争议地区——数千年来一直在中国的管辖之内，而台湾直至 17 世纪才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那以前，台湾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在它无法进入的山区和疟疾流行的沿海地区居住着不友好的土著居民，中国人与他们很少有接触或者根本没有接触。的确，最早从外地来到台湾定居的并不是大陆中国人。而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商人和探险家，他们于 17 世纪 20 年代在台湾建立了第一批城堡，荷兰大约在 17 世纪中叶完全拥有了整个台湾岛。荷兰人在台湾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今的印度尼西亚）之间保持着兴旺的贸易。第一批中国人是从海峡对面的福建省来到台湾的。他们把福建方言带到台湾（千百万台湾人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这种方言），并在欧洲人的飞地附近定居下来。

在一个朝代周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明王朝同来自北方的满洲入侵者进行殊死的战斗、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坚持抵抗。然而，随着明朝被满族建立的新王朝取代，历史上著名的忠于明朝的将领郑成功到台湾避难，与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给共产党以后于 1949 年逃到台湾非常相似。像国民党领导人一样，郑成功把台湾作为试图重新控制大陆的根据地（他是为了恢复明朝），两者的区别在于郑成功的确向中国发动了军事远征，直至 1659 年在进攻南京时被打败而撤退。郑成功向荷兰人在台湾修建的要塞发起进攻，并控制了 this 岛屿。对于满族来说，它在台湾的势力以及它觊觎之国对新王朝构成的威胁是不能容忍的，如同共产党人不能容忍李登辉的政府一样。取名清朝的新王朝派遣好几支远征军用武力攻占台湾——并不是收复中国的领土，因为台湾在那以前并不是中国的领土——而是消灭忠于明朝的势力。最终，清朝在福建纠集了由三百多艘战船组成的一支庞大的水军，由一位清军将领施琅指挥。施琅原先效忠于明朝，在他宣布效忠清朝以后，其父亲、兄弟和儿子全部被郑成功杀害。施琅成功地向台湾发起了进攻，台湾守军于 1683 年投降，台湾岛被康熙皇帝并入大清版图。（注 5）

在其后二百年时间里，台湾是中国领土，直至清朝在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扰、国内的造反、管理不善、贫穷等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日渐衰落。1895 年，中国在同日本交手的简短海战中被打败，因此把台湾永远割让给了日本。1943 年，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会见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会议决定，在打败日本以后把台湾归还中国。国民党政府于 1945 年接管了台湾，以腐败和专横的方式统治台湾——换句话说，就是以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民众支持并导致他们被共产党打败的同样方式统治台湾。1947 年，蒋介石的台湾省主席、军阀出身的陈仪残酷地镇压了台湾人的一次起义，逮捕和处决了数千名台湾知识分子。由于台湾有安全保障，蒋介石在节节胜利的共产党军队的追逐下于 1949 年逃到台湾，并且把 100 万国民党军队和大部分前国民党官僚机构带到了台湾。那些人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夺回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统治权力。

蒋介石是个心胸狭窄的独裁者，他统治下的军事管制政权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主张台湾独立的人，那些人大多是当地人。尽管如此，在朝鲜战争于 1950 年爆发以后，美国对蒋的政权给予了坚定和毫不含糊的支持，美国和台湾于 1955 年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那项条约直到尼克松的历史性中国之行的 7 年之后才废除。台湾作为被承认的整个中国的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持着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直至它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 1971 年被北京

取代。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台湾各地都可以见到“光复大陆”的宣传牌和标语，台湾政府自称是“自由中国”，是中国其他地区的民主选择。在台湾看来，中国其他地区生活在共产党的奴役之下。这种宣传并没有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的现实，在蒋介石 1975 年去世以前，国民党在台湾奉行的是压制政策，但是，即使是在压制政策最严厉的时候，台湾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和繁荣也比他们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大陆同胞们多得多。在蒋介石的统治下，台湾允许几乎是完全的经济自由，这个岛屿很快就取得了接近欧洲的生活水平。

在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总统的领导下，军事管制被逐渐取消，尽*原文如此。——编者注管还有几十位主张独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经过装模作样的法庭判决以后被监禁。但是，台湾在 80 年代走向了民主，人们有了实质性的言论自由，反对派政党——包括主要由主张独立的台湾人士组成的一个强大的政党——取得了合法地位。到了 80 年代中期，台湾已经没有政治犯。以前曾被拘押的一批政界人士组成了最大一个要求独立的政党民进党。民进党领导人、前政治犯施明德在 1995 年的国民大会开会期间仅以一票之差未能当选会议主席。在 1996 年的总统竞选中，李登辉竞选纲领的要点虽然没有写明，但其实质是要使台湾能够继续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致被迫与大陆统一。尽管李登辉在形式上反对台湾独立，但他的政府所发出的信号要比那种简单的宣言显得更加隐讳和复杂。

李登辉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代表着台湾人的影响力和权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曾经控制一切的大陆人的影响力和权力为代价的。由于中国大吵大嚷着试图影响台湾的总统选举结果，李登辉体现了对大陆的一种藐视，成为民众在北京的直接挑衅面前集合在其周围的人。更有甚者，李登辉最后获得了 54% 的选票，高于中国采取恫吓行动以前民意测验表明的支持率。的确，正如北京的宣传机器在选举结束后声称的那样，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在总统选举中仅获得了 21% 的选票，大大低于该党在 4 年前的地方选举中获得的 41% 的选票。但是，这个得票比例仍然相当有力地表明台湾有强大的反对统一的情绪。此外，李登辉和主张独立的政党的得票数加起来占选票总数的 75%，这被广泛而义正确地人为是对北京的一个有力的驳斥。主张独立的立委张俊宏在选举结果统计出来的当天说：“这是一次没有公民投票标签的公民投票，我希望中国接到了这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台湾不愿意与大陆统一。”（注 6）

北京很可能接到了这个信息，虽然它非常有可能对这个信息作出与张俊宏不同的解释。从北京的角度来看，1996 年发生的羞辱性事件最合乎逻辑地被认为是它在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时台湾奉行的温和、和平方针的失败。中国非但未能通过经济接触和交往以及就“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展开的宣传诱使台湾与它实现统一，反而使台湾更进一步走向主张独立的歧途。自相矛盾的问题在于，只要共产党人的死敌国民党掌握着独裁权力并坚持它是整个中国的合法政府，就不会对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公开的挑战。但是，随着民主目前在台湾的建立，民众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愿，台湾人不想通过支持直截了当的独立而惹怒北京，但也没有表现出愿意走向统一的迹象。这种局面使北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台湾选举结束之后不久，中国一位资深外交事务专家在北京接受我们采访时说：“我们无法想象独立的上海或福建，因此，我们如何能够想象独立

的台湾呢？我们知道，那些主张台湾独立的人都是接近李登辉的人。”这位分析家接着说：“我感到担心，因为这可能成为中国内部的政治问题。如果台湾沿着目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可能会就我们是否不得不诉诸武力的问题展开非常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一方会说，军事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时间的优势不在我们一方。”此外，他说：“从历史上看，中国领导人相信武力。武力在天安门起了作用。武力把知识分子吓住了，为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铺平了道路。这是实用政治。在中国人的价值准则体系中，主权、国家统一和保住政权历来比和平更为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大的危险来自台湾本身的发展。在中国 1996 年 3 月实施恫吓时，一些专家认为，真正的问题与其说是台湾独立，不如说是台湾的民主。台湾真正的民众主权会削弱北京独裁统治的权威。因此，大陆政府从来没有提到过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的可能性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将考虑台湾人民的愿望。

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临的两难境地实际上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因此，在台湾沿着分高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之前，要求用武力收复这个岛屿的压力也有可能增加。当然，对于中国来说，简单的解决办法将是不仅变得更加繁荣而且更加民主，使两个社会融为一体，两边的人民彼此都能接受对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目前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迹象。未来可能发生这种变化，但是，如果未来不发生这样的变化，台湾新的民主政府和人民不大可能接受按北京能够接受的任何条件实现统一。如果和平解决办法不能产生结果，北京将面临着两种对它非常没有吸引力的选择：允许台湾继续无限期地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存在，或者开始采取武力措施——从经济封锁到主要用作施加政治压力手段的小规模军事进攻，直到全面的军事进攻。

即使在台湾看来，后一种可能性也不大可能发生。我们采访过的大多数台湾分析家普遍持乐观看法。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不破坏这个岛以及不破坏它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情况下用武力夺取台湾。然而，一些观察家持不同的看法。例如，他们指出，中国电视台 1995 年和 1996 年曾数次播出表明中国发展军事装备的公开新闻节目。这些新闻节目中有介绍 M—9 和 M—11 导弹研制情况的连续镜头，这两种导弹是中国的主要中程导弹，1996 年军事演习期间瞄准台湾附近目标的就是这两种导弹。新闻节目展示了超音速飞机发射空对地导弹和投掷炸弹，重炮攻击和海军舰炮进行猛烈轰击的镜头。甚至还有核弹试验的镜头，有中国人所说的“高新技术战争”——精确轰炸、电子对抗和机动导弹发射架——的评论。新闻节目中历来有中国军人整齐地呼喊反对“分裂主义”和促进国家统一的口号。

中国领导人还表明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某种非正式的时间表，一种逐步实现统一的计划，而实现统一在中国的国家议事日程上处于最优先的位置。1999 年，中国将接管对葡萄牙殖民地澳门的控制权。李鹏总理曾经公开说过，在澳门问题解决之后，就该解决台湾问题了。到下个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将得到加强，它希望看到中国历史上有过的领土都统一在一个国家之下的愿望也将会更强烈。那将是对美国产生极大影响的一个巨大变化。的确，中国 25 年来遵循毛的权威意见，即不必急于解决台湾问题，重要的是解决更重大的战略问题。但是，如今已没有更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想成为全球大国。全球大国在涉及它们认为是本国领土的控制权和主权问题上往往是没有

耐心和通融余地的。这里也不能忽视中国人相信的历史轮回。中国正在重新崛起，恢复它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这种地位由于周期性出现的一次衰落而丧失了。首先要恢复对被帝国主义夺走的飞地行使主权。按这种观点来看，必须把台湾包括在国家复兴的重大任务之内。

美国在这里面临的问题可能是个巨大的问题。当然，可能有人会说，台湾问题根本不关美国人的事，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应该由中国以它认为合适的方式解决。无论如何，台湾的分离地位只不过是中國一场没有结束的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正如北京强烈主张的，它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为何要让美国军人为了台湾而去冒风险？此外，如果台湾重新被大陆合并又有什么可怕的？这不再是把整个人群投入一种正统的斯大林主义体制之中的问题。中国正日益变得更加繁荣和更多的资本主义。统一对于台湾来说甚至可能是一件幸事，台湾拥有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和资金。此外，一旦台湾与大陆合并，中美摩擦的主要因素将消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是美国的中国问题的解决。

但是，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美国除了进行干预并把美国军队投入风险之中，别无选择。不论美国人是否愿意，他们已经介入了这一斗争，致力于和平解决——就是说，致力于得到台湾人民赞同的解决办法。当美国在中国 1996 年恫吓台湾期间派遣两艘航空母舰前往西太平洋的时候，这一行动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致赞成。

尽管北京感到恼火，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价值成亿美元的先进的军事装备，尤其是为了提高台湾的空中防御而出售给该岛的 150 架 F—16 战斗机。台湾的力量越弱，中国就越有可能入侵台湾，不受到抵抗的中国入侵将会深深地打乱整个亚洲的均势——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这种均势使亚洲保持着和平的局势和前所未有的繁荣——出于这个简单的原因，美国必须继续向台湾出售军事装备。

此外，如果美国不承诺对台湾与中国的冲突进行干预，那末，在中国主宰整个东亚的道路上就将不会有任何障碍，从澳大利亚到日本都十分了解这一事实。美国进行干预的形式可以根据台湾的具体需要和中国发动进攻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不论美国采取何种干预形式，台湾海峡发生的任何战争都将是中美冲突新阶段的开始，这种从太平洋战略态势到战争的转变对任何人都绝对没有好处。

第七章 中国对日本的盘算

1996 年 2 月 23 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从东京飞往洛杉矶与比尔·克林顿会晤。这次会晤仅持续了 6 分钟，安排在美国总统以下两项活动中间：去洛杉矶希尔克雷斯特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去贝弗利希尔斯录音制作人戴维·格芬的宅邸吃饭看电影。官方解释（两国的记者对此解释未提出什么怀疑），说美日首脑这次在圣莫尼卡面对太平洋的希拉顿—米拉马尔饭店的会晤只是为了见面相识，另外迅速核对一遍准备在荒林顿 4 月份去东京进行预定的会谈时讨论的各种双边问题。

换句话说，这两位领导人的发言人希望他们本国的公众相信，日本首相愿意坐整整一个白天和大半夜（按他的生物钟计算）的飞机，同一位总统就日常的问题进行交谈，而他两个月后总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见到这位总统。日本首相通常不会为了见面相识而不辞辛苦作这么长的旅行，即使是同美国总统相识。那么桥本匆匆之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桥本此行的时机提供了一个线索。在 2 月 23 日以前，桥本面临被互相矛盾的力量撕开的危险。一股力量是中国的威胁。同日本政界许多上层人物一样，桥本认为对日本最大的战略威胁来自越来越咄咄逼人的中国。到最后确定圣莫尼卡短暂的首脑会晤的计划时，日本情报部门已看到中国—台湾对峙可能引发大规模军事危机。这只是中国使日本担心的最近一次行动。前一年，在 1995 年 11 月，桥本首相的前任、社会党的村山富市首相批准了日本国防计划大纲的修改方案，修改后的计划对美日安全联盟的重视甚至超过冷战高峰期。

与之矛盾的力量是国内的，政治的。到 1995 年底，日本公众对与美国结盟的不满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实际上，东京的决策者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准和平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限制，这种思潮现在仍然在日本人民的舆论中占支配地位。一般说来，日本人对美军持续驻扎日本国土的不安甚至远远超过对中国在东亚的势力迅速增长的不安。在 1994 年秋天，正当朝鲜核弹计划危机达到顶点的时候，东京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日本在黄海扫雷以支持美国海军的要求。次年，驻日本的三名美国兵强奸了冲绳一名女学生，日本公众强烈要求大大减少驻日的美军。在 1995 年 11 月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7% 的日本人他们说他们赞成“大大减少”美军。（注 1）当时在许多人看来，美日联盟正在慢慢地、但是无呵挽救地解体。美国驻东京大使沃尔特·蒙代尔后来在讲到 1995 年秋天这种占上风的情绪时说：“整个安全关系都成了问题。”（注 2）

然而，在 2 月桥本会见克林顿时，东京已经决定顶住舆论的潮流，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关系，公开宣布这种关系的重要。但是，要使这种做法在政治上能够接受，桥本需要从克林顿那里得到一些东西。这就是他去圣莫尼卡的原因。桥本要求克林顿减少驻冲绳（强奸案的发生地和多数美军的基地）的美军，克林顿同意了。美国原则上同意把冲绳美军基地占地的五分之一归还日本。克林顿同意，作为第一步，逐渐关闭普天间航空维修站——位于宜野湾市中心的一个美军基地。（注 3）圣莫尼卡得到的报偿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注 4）桥本知道，加强日美关系会引起北京的不满。尽管如此，日本还是根据中国是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危险这种设想行事，这是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回东京后几天，桥本声称北京“在亚洲可能正朝错误的方向发展。”（注 5）——这种话用日本的外交标准衡量是直截了当的。总之，日本开始在一场争斗中选择站在哪一边，它本来希望对这场争斗置之不理，然而再也不能这样做了。这并不是说未来日本对中国和美国的政策方针永远固定不变。日本暧昧，希望双方都不得罪，看到与中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好处，舆论存在着反美趋势，最重要的也许是中国的力量不断增强，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影响未来日本的决策者，使他们再次改变同美国比较牢固的安全关系。但是，到 1996 年底，日本已经决定，由于中国威胁性的态势，它必须朝美国靠拢。

圣莫尼卡会晤后，桥本同意克林顿在台湾海峡危机中作出的这样一项决定：先派一支然后派两支航空母舰特混舰队去台湾附近的水域，表明美国决心阻止中国攻击台湾或者甚至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构成威胁。虽然日本希望美国在台湾海峡危机中明确显示其决心并非克林顿作出强有力的姿态的唯一因素，但确实起了一部分作用。然后，在 4 月中旬举行的两天经过充分准备的正式首脑会谈中，通常是美日首脑会谈主要内容的激烈贸易争端几乎没提。克林顿此次访问的主要内容是正式宣布关于日美 21 世纪安全联盟的联

合宣言。日本在宣言中确认美国在亚洲驻军是“保持和平与稳定所必不可少的”。（注6）

日本同意，在将来朝鲜半岛和台湾出现危机的情况下，美军可以从日本采取行动，它答应让美军人数保持在与过去大致相等的水平。尽管一些人还在示威并把美国称为日本的“非法占领者”，双方仍然同意重新研究1978年达成的军事合作指导原则的条款。这隐含的意思是，日本将考虑修改对宪法的解释。日本宪法禁止日本在领土外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宣言在美国几乎没有受到注意，但是中国即刻看到它的真正含义：日本的立场改变，目的是对付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中国甚至试图阻止或者至少减弱美日安全条约，在克林顿1996年4月同预定抵达东京前两周，派外交部长钱其琛去东京。钱公开对即将签订的安全条约表示不安，这是试图以外交方式劝说日本人不要签订这项条约。（注7）然而，他没有成功。这是北京为它几周前在台湾海峡以及在南中国海的日本海上运输线上采取的咄咄逼人行动付出的一份代价。1995年中国在南中国海从菲律宾夺走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

日美宣言一宣布，中国立即进行攻击。就在宣布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任何使安全安排超越双边性质的试图都肯定会引起亚洲其他国家的警惕和不安。”（注8）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与中国安全部有关的一个思想库）副所长陆仲伟（译音）说：“这个条约是美国从战略上调整对亚太地区政策的结果。它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攻性的。”（注9）在其后的几个月，中国反日言论之多就像发起了一场运动。在我们1996年8月访问中国时，几乎每一个政策研究机构的学者和分析家都讲到反对4个月前签订的美日条约。“在1996年以前，美日联盟完全是防御性的”。这是我们在上海亚太研究所听到的一种评论。北京的中国战略问题研究中心的一位高级人士说：“美国保卫日本我们不介意。但是把条约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鼓励日本发挥军事作用，我们确实介意。这样做是非常消极的。”几个月以后，北京还指责美国和日本把它们的联盟变为针对中国的“进攻性”条约。

这种反应也代表了一种变化。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讲到中国领导人在70年代如何极力劝说美国领导人同日本保持密切的安全关系。“有一次毛甚至建议我确保访问亚洲时在东京呆的时间同在北京呆的时间一样长——应该尊重日本的自尊心，”基辛格在1979年写道。“的确，中国人开始强调美日关系比美中关系重要。”（注10）那个时候中国知道它实际上很弱，尽管口头上讲它强大；它在全球的外交旨在建立全世界的反苏阵营。

冷战结束以后，一般说来中国对日本更加强硬，比过去更加强烈地要求日本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罪行。正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激发反对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苏联解体后对日本的怨言可以看作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但是，在美日安全条约宣布以后，中国的宣传一下子变得敌对了。中国正确地看到美日安全条约是亚洲的一个新动向——太平洋其他国家对中国野心扩大作出的一种对它不利的反应。

既然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亚洲实力最强的国家，那么随之而来的一个目标就该是使日本处于一位学者所讲的“永久的战略从属地位”。当然，中国没有那样直截了当他说出来，然而它公开表示，它希望日本永远非军事化，从而不能对付中国自己扩充军事力量的计划。换句话说，中国的战略目标是防止日本成为像美国或者中国自己那样的“正常”国家，即一个有主权决定自

己安全需要并根据这些需要建立武装力量的国家。

让一个拥有 1.2 亿人口和世界上第二大经济的国家处于长期依赖其他国家提供基本安全的状态，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主张。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直接公开反对这一主张，连日本自己也没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 50 年中，日本放弃进攻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成为经济上的巨人，军事和外交上的侏儒——已成为国际关系中公认的事实。保持这种状态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内容。中国在国际论坛以及在它控制的新闻媒介强调这样一种主张：亚洲绝不能相信日本不再发动战争，日本是和平的真正威胁。

在宣传机器中和北京领导人的讲话中强调日本战时的残暴，是中国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日本的暴行，包括最令人发指的 1937 年“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无数残暴的行为，都是事实；如果中国从对受害者的道义义务和了解历史的角度考虑，希望人们记住它们，那是可以理解的。实际情况是，虽然许多中国人对日本的气愤出自心底，但是毫无疑问，中国领导人把日本犯有战争罪的观点作为使日本在国际上处于软弱和从属地位的战略的一部分。例如，中国领导人不说明日本作出什么样的悔过或者道歉姿态才能使他们满意，其用心令人怀疑。在 1978 年，标志中日敌对正式结束的和平友好条约没有提战争罪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任何遗留问题。然而，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不时要求日本正式道歉。这导致日本几任首相，包括最近的细川和村山，为日本过去的行为正式道歉。但是中国持续不断地强调战争罪的主题，公布了许多罪行，有的是模糊不清、没有事实根据的，如日本军队在战时对中国老百姓发动化学和生物战，或者在占领的乡村引发霍乱。到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在东道主的要求下参观“暴行”展览，里面陈列的东西据说记载了日本的战争罪行。

1996 年秋，政府突然禁止计划在日本 1931 年入侵满洲 65 周年之际在中国几个城市举行的示威游行，官方对反日情绪的控制和操纵明显可见。政府为此调动了成千上万的警察；示威游行的组织者被调到城外的宾馆，另一些人实际上受到软禁；通知大学防止学生“破坏稳定”。在中国，人们猜测政府不是担心示威游行成为反日活动（它们确实是反日的），而是担心它们可能成为像天安门事件那样的反政府活动。（注 11）不管是什么原因，此事表明北京当局把反日情绪视为可用来首先为自己的国际目标——在日本人中加强对战争的内疚，在各国反对日本重新武装——服务的东西。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未表示对它给自己人民施加的暴行负有道义责任。

就这些暴行道歉有损中国统治者的权威。但是，对日本人采用高的道义标准会加强他们的权威，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上海复旦大学的中国政协代表谢希德说：“日本的强大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在日本侵略时受到深重的苦难。”北京一个半官方的对外政策研究机构的学者对我们说：“如果有哪个国家将来要主宰亚洲，那就是日本。在亚大地区，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中国阻止日本强大的持续运动包括在亚洲其他地方进行外交活动以结成某种反日联合阵线。泰国和新加坡的外交官 1995 年和 1996 年告诉我们，中国使者长期以来一直把“日本威胁”作为双边秘密讨论的重要议程。中国外交官的主要信息是，防止日本在亚洲横行，特别是防止日本成为该地区的军事强国，在这一点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在日美安全宣言公布后仅几天，外交部发言人讲到这个主题，说：“如果日本自卫队进一步

加强军备，那肯定会引起其他亚洲国家的关注和警惕。”（注12）《人民日报》在一篇关于尖阁群岛（中国、台湾和日本都声称拥有主权）的评论中说：“我们看到日本某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亚洲各国的人民应当设法让他们的头脑冷静些，别干蠢事……对日本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注13）

1996年同一些中国人的谈话使我们明显地看到，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劝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加入一项正式的条约，这项条约表面上是为了永久保证日本安全，实际上是为了长期阻止日本重返“正常”国家的行列。签字国将是中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自己，前三个国家担保日本的安全；日本则保证永远奉行和平主义的中立对外政策，同意只保持一支小小的防御力量。

从中国的角度看，有充分理由感到惊慌。日本密切同美国的关系正是中国要避免的——它表明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战争恫吓的愚蠢，这种政策促使美日加强关系。中国知道，如果一对一，即在任何战略或军事对抗中只有中国和日本两家，中国最终会占上风。中国的庞大——从面积、人口、经济和武装力量衡量——使它能主宰日本，日本只有中国十分之一的人口和没有经过考验的小规模自卫队。同样，美国本身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长期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美国必须有日本做它的伙伴——提供军事基地需要的土地，帮助支付美同在亚洲部署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的开支，最终以加强的武装部队的形式提供人员。

为什么1996年美日加强关系引起中国战略家那么大的震动？确实，至少在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正确地看到最初的美日条约的核心是美国单方面保证保卫日本不受外来攻击。这个保证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日本后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的自然产物，因为日本在这个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只保留小规模自卫队，而自卫队只是徒有其名，它力量太小，不能保卫日本不受任何军事强国的侵略，更不用说核攻击了。自卫队也不能保卫对日本这个贸易国的生存至关重要的海上运输线。那时和现在人们的理解都是由美国满足日本的安全需要，其做法的一部分是保留在日本南起冲绳、北至北海道的军事基地。

在冷战高峰期，中国和日本都感受到苏联的威胁，中国对日本坚决同以美国为首的反苏力量结盟感到高兴。在苏联威胁减退和冷战结束后，中国起初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可能仍然对中国有利，至少暂时是有利的。中国似乎确信，只要美国保卫日本，日本绝不会寻求建立一支足以保卫自己国土及海上运输线的军事力量。从中国的观点看，美国在帮助压制日本发展。

中国没有料到的是，美日防务安排会开始朝着真正联盟的方向发展，而这个联盟主要是为了对付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北京希望现状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但也希望美日安全安排慢慢地自我解体。日本的反美情绪会起到作用。中国还认为美国人会对白花钱保卫日本而日本在美日贸易中占有巨额顺差的情况感到厌恶。目光敏锐的中国战略思想家知道，美国议员或者美国公众最终会反对这种单方面的安排。

中国战略家认为，在日美关系削弱的同时会出现其他重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北朝鲜最终垮台，朝鲜半岛统一。*鉴于中国同北朝鲜极端正统的共产党政权的长期关系，中国人很难公开承认这一点，但是北京必定意识到，那个共产党政权注定要灭亡，它已经实际上把它统治的国家搞得破产了；很可能在今后一二十年出现由韩国治理的统一局面。中国外交书务专家对我们说，他们不相信在统一后很久美军还会留在韩国。这种估计看来是实际的，

因为驻军的理由——北朝鲜威胁——不存在了。我们采访的一位中国人士指出，这会使美国在亚洲驻军的整个问题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到那时美国只在一个国家——日本——有永久性基地。他说，这会使美国和日本处于一种不自在的地位，引起国际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作用以及日本的国际地位的辩论。此时中国将要求最终解决日本问题——很可能通过中国研究机构已经开始讨论的多边条约。

这种条约可能非常有利于中国主宰亚洲。驻日美军在那里只是防止日本重新武装，不能把日本作为采取进攻行动的基地。俄罗斯在军事上仍然很弱，不能对中国的主宰提出挑战。甚至许多日本人也为中国的方案所诱惑，因为官带来低国防开支的前景。美国也有不少人支持，特别是在美国失去菲律宾的基地后又要从韩国撤出的情况下。在美国人看来，这是一条减少军费和结束美国的世界警察作用的途径，许多美国人对世界警察的作用总感到不自在。中国很可能出现类似 70 年代和 80 年代苏联“和平运动”的“和平攻势”。但是事实是，如果有朝一日北京提出同华盛顿作出这种安排，那它实际上就是要求美国默认中国主宰亚洲和把中国的霸权作为既成事实强加给日本。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把日本作为战略对手，而日本直到不久前*请读者注意此书作者怎样挑拨中朝关系。——编者注对中国还比较放心。近在 1993 年，一部关于日本安全问题的重要著作几乎没有提到中国。（注 14）在此前几年，通常悲观的日本人开始相信他们自己的报界对《日本第一》（美国学者写的一本书，在日本成为畅销书）的评论。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美国对日本的重要性越来越小，日本应该努力成为亚洲的领导。

在 90 年代初。尽管出现了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暴跌这类警告的信号，日本的势力似乎仍笼罩着亚洲。据认为日元集团——在日本经济的坚定领导之下的一个经济联盟——很快就会出现，在东京听到的有关亚洲经济的比喻是“一群鹅”。虽然亚洲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和技术发展阶段，但都跟着日本，按照日本的飞行计划飞行。日本在“V”型的顶头。紧跟其后的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它们工厂生产的产品仅仅是日本 10 年前生产的。接着是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缅甸和越南这类国家排在最后。

起初，日本把中国看作一只很大但飞得很慢的鹅。然而，日本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在天安门危机后的那段时间认识到中国正在成为值得重视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这是他们的功劳。当时几乎只有日本人这样看，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中国通部猜测中国政权要垮台。日本在 90 年代初开始作比重大努力改善对华关系。虽然日本私营部门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动作仍然缓慢，但是日本政府加强了对中国的外援和经援计划。到 90 年代中，日本对中国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一年有近 55 亿美元的赠款和软贷款。日本政府派天皇和皇后以皇室的身份去中国访问，这是表示日本尊重的一个重大象征。东京还在国际论坛呼吁对北京采取和解的态度，以便使中国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最后，日本领导人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行为向中国和其他国家道歉。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没有成功。中国接受日本的援助和投资，但是在它自己的人民中和国外激发反日情绪。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对市场力量的操纵以及对国内市场的过分管制使日本经济陷于严重而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到 1996 年，日本和国外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日本的经济问题是慢性的、长期的。用国际标准衡量，日本仍是健康、繁荣的，但是，使日本从 1945 年破碎的经济奇迹般地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的竞争

者的那一高速增长已经成为历史。确实，几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总产值肯定将超过日本，使日本降到世界第三位。

《朝日新闻》1994年8月进行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恰如其分地反映了90年代中期日本信心不足的情绪。在被问及21世纪哪个国家对亚洲的影响最大时，54%的日本人说是中国，30%的人说是美国，只有16%的人说是日本。（注15）

这种悲观和担忧的情绪无疑是决心寻求与美国密切战略关系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持续不断地进行大量反日宣传。但是最终使日本认识到有必要倒向美国的，是中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威胁到日本的根本安全利益。

中国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动尤其使日本惊慌，因为它们威胁到日本的经济命脉。日本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要通过南中国海。中国从70年代开始在南中国海夺取属于力量弱得多的越南的岛屿。中国越来越武断地声称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也使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这类东南亚国家感到惊慌，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声称对一些岛屿拥有主权或者占着一些岛屿。另一些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在南中国海与中国没有公开争端，但是防止冲突与它们有切身的利害关系。

1994年11月，江泽民访问了东南亚几个国家，宣布中国的和平意向。他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到斯普拉特利群岛（即南沙群岛——译者注）（这些岛屿离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比离中国近多了）时说：“中国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主张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有关争端。种种‘中国威胁论’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注16）

然而，实际情况是，几乎就在江宣布中国致力于和平解决海上礁岛争端的同时，中国海军正准备夺取其中的一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菲律宾是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在菲律宾巴拉望岛西边约135英里）的“主人”，但是菲律宾武装部队人数少，装备差，从来没有对菲律宾领土进行过充分的巡逻（美国关闭在菲律宾的基地后放弃了这一工作）。1995年1月，菲律宾渔民偶然发现中国人在这个礁上，此时中国人已经在上面搞了一个建筑。中国政府声称占领此礁的是渔民，但是谁也不相信。北京称之为的“渔民的简易建筑”包括地堡、卫星无线和雷达设备。大家都明白中国占领米斯奇夫礁是海军的行动。

中国口是心非（江的讲话只是中国最高权威最近一次表示中国的和平意图），看来决心要控制南中国海，不管该地区的舆论如何，这些不仅使东南亚国家感到惊慌，也使日本感到惊慌。虽然中国的野心集中在岛和礁上，但他们也声称有权——他们说现在不行使——“管理”这些水域的航行。当然，对日本来说，中国行使这种“权利”就涉及到对它最重要的贸易航线的管制。南中国海成为中国内湖的前景对日本的投资也有严重影响。日本向东南亚国家投入了大量资财，而与这些国家相连的航道可能很快被中国海军控制。相比之下，日本甚至没有派军舰去南中国海保护那些投资的宪法权利。它必须依赖美国派兵为索尼公司和日本电气公司而死的意愿。正如一位观察家指出的，过去从未有哪个重要而强大的国家允许大量资产流入海外而又没有能力予以保护。

在1995年，中国领导人还加强了在韩国的活动，在那里采取了明确的反日立场。虽然反日情绪在东南亚逐渐消失，但是在韩国人中仍然十分强烈，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久出生的人对日本曾长期野蛮地占领他们国家

(从 1895 年持续到 1945 年)也是情绪激烈。江泽民在 1995 年 11 月对韩同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同事访问时,用一切机会激发韩国人对日本的敌对情绪。江唤起人们对日本殖民统治时的回忆,同韩国总统金泳三一起谴责日本的“侵略”史,江还进一步暗示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仍然是对中韩两国利益的威胁。(注 17)

在西方看来,江在韩国的主动行动似乎是表明中国愿意扩大友好关系范围的一个良好的迹象。然而,中国在韩国的主动行动实际上基于平壤政权最终会垮台的设想,激励韩国做令日本恐惧的事:建立一个统一的、有核武器的、倾向中国而反对日本的国家。日本战略分析家冈崎久彦说过:“数百年来日本的地缘政治没有改变。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同过去一样,始终没有变。”(注 18)如果中国对核武装的统一的朝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它就能实际迫使日本寻求中国保护它不受朝鲜的袭击,从而对日本有很大的左右能力。

美国对此的反应是建议由南北朝鲜、美国和中国举行四方会谈。这个建议迄今为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与此同时,一直有消息说中国在秘密地为南北接触提供方便,推进使自己在朝鲜半岛起决定作用的日程。尽管美国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但它似乎没有政策,这使日本更加惊慌。

与此同时,不断加强的中俄携手,虽然并非明确针对日本,但是,在任何战略家看来都是对日本不利的。它使东北亚的力量对比进一步有利于中国,不利于日本和美国。尽管中俄携手与日美携手部分是巧合,而无因果关系,但它们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确实,1996 年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与江泽民宣布中俄战略协议的月份——4 月——正是克林顿和桥本在东京宣布联合宣言的那个月。

对日本来说,必须从这种背景看台湾海峡危机。桥本也是在这种背景下飞往洛杉矶的。台湾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它实际上在帮助保卫日本的南翼。从朝鲜战争以来,台湾与美国的亲密关系以及它亲西方和支持发展贸易的政策使它的存在令人欣慰。人们几乎始终没有意识到,台湾也保卫着南中国海东边的出入口——台湾海峡和吕宋海峡中的巴士海峡,前者与中国共有,后者与菲律宾共有。人们之所以没有注意这个重要的战略事实,是因为台湾致力于贸易和自由航行,从来没有出现过它控制这些航道的前景。1996 年台湾海峡中的对峙肯定使人们考虑到中国最终控制台湾的前景,迫使日本的战略家重新评价台湾对日本极其重要的战略作用。

不管怎样,冷战后出现的这些事件和言论促使美日采取了一些行动。这些行动加在一起,表明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大大加强:

1996 年 2 月,美国和日本签订了分享对导弹防御详细情报的谅解备忘录。1995 年 4 月,日本防卫厅成立了对弹道导弹防御研究处,其任务是决定是否部署 THADD(战区高空区域防御)反导弹系统。

1996 年 4 月发表安全联合宣言。

1996 年 5 月,据报道日本政府“在研究确定‘与华盛顿协同行动处理……发生在周围地区的所有紧急事件’”的新指导原则。这是 4 月宣言的产物。一家报纸报道,日本在寻找恰当的语言说明一旦发生战争日本站在美国一边发挥较积极的军事作用的理由。(注 19)

1996 年 6 月五角大楼同意向日本防卫厅提供间谍卫星搜集的预警资料,即导弹袭击的早期警报。

1996年7月日本发表年度防务白皮书，估计对日本战略威胁。尽管在外人看来它措词委婉，但它讲到中国时语气最严厉：“（中国）持续推进核力量、海上和空中力量的现代化，扩大……海上活动，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引起紧张局势；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密切注视……北京的行为。”（注20）

1996年8月，日本和美国的国防工业协会同意成立一个协调机构，推动两国联合研制高技术军事装备。（注21）

由这些事件引出的最重要的趋势是赞成日本建立对导弹防御系统的势头增强。计划到2005年建成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将在日本和韩国周围竖起反弹道导弹屏障。它仍在美国研制之中，日本承担多少研制经费这个主要问题远未解决。然而，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一旦采用，那将是美日朝着主要针对中国的战略联盟方面迈出的又一大步。北京再次看出这是对它的挑战，它的新闻媒介一直猛烈抨击美国和日本考虑对导弹防御系统。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中国关注是因为美日战区高空区域防御会使中国自己的寻弹和核武器系统现代化失去作用。”（注22）

中国对这种趋势至少是不快的。估计它会加强对日本的压力。例如，1996年6月中国一位官员宣布政治考虑将影响到中国巨大的三峡工程的承包商的最后选择。北京的《中国日报》（英文）引用中国三峡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秦中一（译音）的话说，一个日本财团（由三菱重工业公司、三菱电机公司、东芝公司、日立公司组成）能否赢得40亿美元合同“看来值得怀疑，因为人们不会轻易忘却日本同令人不快的美国政策的密切关系”。他负责三峡工程所有国际招标。他说一个由德国和加拿大公司组成的财团排在最前面，因为“他们的国家与中国建立了有益的关系”。（注23）

未来亚洲的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美合作。正如日本一位评论员对《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日本独自不能对付中国，日本独自不能对付统一的朝鲜，日本独自不能保护自己的海上运输线——所以，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我们需要与美国结盟。”（注24）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与美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日本占支配地位的官僚机构和公司利益集团的许多人很可能反对恢复明确抗衡中国的联盟，因为这样做威胁到日本可能在中国获取的利润。普通老百姓也会抵制，他们对放纵的军国主义一度带给日本的灾难感到恐惧。半个世纪的和平主义以后，日本人的自我看法可能根本不允许这个国家接受真正强权的角色，即使是在自己的后院。正如弗里德曼所说，问题是“日本政府不想谈论中国或韩国”。（注25）

在本世纪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的软弱和日本的强大使亚洲不可能有稳定的均势。结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重新武装日本会威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成为明明白白的道理。但是，如果说过去确实是这样的话，那现在不再了。在冷战后的世界，威胁到和平与稳定的是日本的软弱，因为它造成了美国不能填补而中国能填补的空白。一个真正与美国结成伙伴的强大的日本对亚洲新的力量平衡至关重要。一个软弱的日本只能对中国有利，因为有证据证明，中国的目标不是新的均势，而是中国的霸权。在这种霸权之下，日本如果听天由命，那就会成为中国最富、最有用的附庸国。

第八章 中国对美国：战争游戏*

我们并不认为中美可能爆发战争。但是，如果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威胁到海上航线，美国在菲律宾或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南的要求下感到

不得不干涉，那就有可能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但是中美之间未必可能的战争如果爆发，那最可能是台湾问题引起的。比如说 2004 年。香港和澳门已经平安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国内存在的某些情况促使中国试图以武力迫使台湾纳入中国的范围，危机由此产生。

中国国内局势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工人闹事；大批失业者四处漂泊，寻找工作。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一直不能容忍批评和不同政见的共产党政权感到厌烦。整个制度腐败成风，高级官员的亲朋作为与政府有关系的各种企业的负责人，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曾经是共产主义的中国成了实行有控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控制权最大的资本家是前共产党人的亲属。公众的冷嘲热讽越来越强烈，换句话说，党的领导知道，如果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激发爱国主义情绪的问题——要求团结、自我牺牲、停

*读者在这一章中将看到，此书作者进一步发挥他们危言耸听的本领和想像力，虚构了 2004 年的一场“战争游戏”。——编者注止个人牢骚和献身伟大事业的问题，那就可以消除冷嘲热讽。

当然，以武力完成统一大业的目标在政治局引起激烈争论。领导层中的温和派警告，在台湾问题上发动战争会使中国在国际舆论以及同日本和东南亚的关系方面付出沉重代价。一些国家甚至可能乘中国集中于台湾海峡战争的机会，夺回中国 2001 年夺取的南中国海的岛屿（中国夺取那些岛屿时采取了协同两栖突击，并由苏制—27 战斗轰炸机提供空中掩护）。虽然那些危险很明显，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主张开战，不惜以任何代价统一，他们知道，一旦发生敌对行动，任何批评领导的人都将把他们操纵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所淹没。接着是军事准备的因素，一年半以前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成功已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们的战备水平。多年来人们都知道正面攻击台湾是极其危险的，双方都要付出很大代价。确实，它可能给台湾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以致夺回它都没有什么价值，还会在台湾人和大陆人中间重新造成一代人的仇恨。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把它发出的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威胁付诸于行动，秘密制造了潜艇、登陆艇和军舰，其数量是人们想象的三倍，使它拥有足够的装备在三天内——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夺取台湾。

中国在 1999 年要征服台湾还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的军队领导人说，军事上的一些优势使得在 2004 年征服台湾成为可行。中国现在拥有一批类似战斧式的巡航导弹。另一个重要情况是，它从俄罗斯购买了整整一个团——24 架——的超音速图—22 远程逆火式轰炸机，加入已拥有的 200 架苏—27 战斗机和现在装备了预警与控制系统的伊尔——76 运输机的机群。4 艘新的“旅沪”级和 8 艘“旅大”级驱逐舰投入现役，基地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昂船洲新建的现代海军基地。具体地说“旅沪”是一种令人生畏的舰只，由通用电气公司的 LM2500 汽油涡轮发动机驱动，装备了使用固体燃料的地对地导弹发射器、法国造的“响尾蛇”地对空导弹防空系统和 324 毫米“白头”鱼雷发射器，另外还配有改进的雷达、发射控制系统、各种深度的声纳设备和两架“哈尔滨”Z9A 直升机。（注 1）

从军事现代化真正得到势头以来的几年，中国在改进的核动力“汉”、“明”和 R 级潜艇以外又增加了 10 艘“基洛”级潜艇。中国舰队的这些新潜艇比前一代的噪音低多了，即使美国反潜战技术也难以发现。具体他说，“基洛”级潜艇装备了苏制 533 毫米被动式尾迹引导鱼雷，其最大有效射程为 26

公里。（注 2）扩大的潜艇力量可以用来在台湾的海上运输线上布雷；更广的用途是包围台湾，进行商业封锁或者阻止船只运送军需品。中国买了或者自己造了 1000 辆 T—72 坦克（这是前苏联最令人生畏的作战坦克），另外还有 90 艘大型高速气垫船，每艘都能为两栖登陆运载 500 名全副武装的步兵和 10 辆坦克。中国对雷达干扰设备、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电子干扰设备的研制成果使它的军事计划者相信，他们可以严重干扰战场的敌军与台北的主要指挥中心的联络。中国的卫星侦察属世界一流，几乎可以即刻通报台湾的军事行动。中国有几十枚 DF—15 和 DF—11 导弹（也称作 M—9 和 M—11 导弹），与 1996 年那次早已过去的有名的军事演习中发射的导弹是同一类。这种导弹的机动发射器从装弹、发射到拆卸用不了 30 分钟，在 300 公里外发射，弹着点与目标相差不到 20 米。

在中国军事力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时候，它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因为台湾不断发展的独立趋势而受挫。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现在众所周知的中国几年前接管香港时采取的高压手段。当时香港主张民主的主要政党的成员被关进监狱，接着支持他们的报社被关闭，支持他们的示威游行被公安局镇压。这给台湾很坏的印象。台湾习惯于自由和无拘束的政治生活。

接着中国进行了对北京政权具有同样反作用的军事演习。中国根据 1996 年首次尝试的那种方案，对台湾进行封锁，但不称为封锁——因为国际法把封锁定为战争行为——而是宣布一系列潜艇战演习，警告商船远离台湾。几家航运公司暂停为台湾服务，股市短期急剧下跌。但是美国在国会和五角大楼的积极支持下，对中国采取行动而扭转了局势。美国海军利用中国潜艇战演习提供的机会，迅速开始举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潜战演习。在 3 周内，美国潜艇和反潜战飞机显示了技术上的巨大优势，一直以大量电子探测信号把中国每一艘潜艇团团围住，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信息是：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们就把你们的所有潜艇击沉。美国人对自己感到满意——以后的事实证明过分满意了。他们宣布这标志中国的希望实际上已经破灭，不能以事实上的封锁升级来使台湾屈服。

后来，为了保住面子，中国领导人放风说他们要向台湾人迹稀少的山区发射导弹。如果这也是为了恫吓台湾，那它失败了。它促使人们傲然地在台北总统府前举行要求独立的示威。

一年后，中国再次打着军事演习的幌子，派 50 架米格—21 战斗机沿台湾北端接近这个国家领空的区域飞行。台湾急忙派出两个中队的 F—16 战斗机和幻影 2000 战斗轰炸机，这些飞机是它几年前从美国和法国买进的。不到 12 分钟，当台湾飞机还在空中时，中国向台湾南部沿海派出了第二批 50 架飞机。当另一个中队的台湾飞机飞上天空时，中国把第三批 50 架飞机送上天空，这批飞机从南向北沿台湾西部海岸迅速飞行。最后，随着中国一批批飞机飞上天空，台湾再也派不出飞机了。然而中国人不断飞过，几乎在挑逗台湾人制造事端而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飞机。

中国总共有近 800 架飞机参加了“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只是给台湾上了一堂生动的课，让它看到中国空军占有数字优势，尽管不是技术优势。中国约有 5000 架飞机，其中包括装有法国制造的先进测距电子系统的歼—5 强击机、根据苏联老式米格—29 飞机制造的超—7 战斗机和苏—27 超音速战斗轰炸机。台湾的飞机大约是中国十分之一。

尽管如此，中国显示空中实力未能使顽固的台北接受谈判，成千上万的

台湾人再次举行示威活动，要求独立。中国的行动至今未能说服台湾相信它需要正视北京控制该岛的必然现实，相反，似乎引起了一场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和历史的强劲运动。台湾一些支持独立的报纸和广播电台非常活跃。接着是 2004 年 3 月的总统选举，如果民意测验的结果准确的话，主张统一的党的候选人得票率很可能不到 18%。国民党的在职总统已完全成为实际上主张独立的候选人，他看来可能大获全胜。他在上一任期确实又成功地使一些小国同这个仍然称为台湾中华民国的岛屿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这使北京特别愤怒。与此同时，美国人仍然愿意向台湾出售阻止中国攻击所需要的高技术军事装备。

换句话说，北京感到时间不多了。台湾的选举将使总统府内主张独立的势力在今后 4 年得到加强。现在该采取行动了，这种行动可能导致美国干涉，这是中国希望避免的，但是这种行动能有效地迫使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首先台北发生了混乱，竞选期间在台北总统府前的一次示威活动中，一群打着要求独立旗号的人大打出手。始终没有弄清此事是自发的，还是北京制造的，大家都知道，北京多年来一直派人“潜伏”在台湾，长期隐蔽，等待时机。

不管怎样，总统府前的情况恶化。突然，一群示威者打着亲北京、主张统一的旗帜，分成小队穿过人群。其中一队冲过广场对面国防部的大门，当调来反暴警察平息动乱时，几名亲北京的示威者受伤。接着，就在动乱似乎要平息的时候，自动武器开火。三名亲北京的示威者被打死，另有几人受伤。

几分钟后，中国共产党主席江泽民在北京戒备森严的中南海召集各军种的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以及政治局常委开会。江庄严宣布了中国恢复台湾秩序和满足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长期深切的统一愿望的历史义务。江宣布中国再也不能容忍分裂者和其他不放弃一中一台政策的人的破坏颠覆了。罪责在于作为最大分裂者的台湾总统本人，他从下掩饰建立独立的台湾的计划。江宣布：“我们决不允许中国分裂。否则十亿中国人决不原谅我们。”

两个星期后，中国在恢复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的幌子下进行了首次封锁。这次中国警告所有船只不仅不要进入海峡，而且不要进入离台湾北海岸和南海岸 100 多海里的范围，中国的潜艇和水面舰只要在这个区域进行演习。外交部召见美国大使，告诉他演习大概要持续一个星期，要他耐心和谅解，并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无侵略意图的保证。

演习成了全世界新闻媒介的头条新闻。台湾进行谴责。美国人向西太平洋离台湾东海岸约 150 海里的地方派出“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一队支援舰，包括两艘驱逐舰、四艘巡洋舰、一艘鱼雷艇和几艘潜艇。美国抗议北京关闭国际水路，日本人也表示抗议。美国人警告，如果美国舰船因为“演习”而被击中或者受到破坏，中国要承担后果。

中国在台湾周围部署了“汉”级和“基洛”级潜艇，几乎每小时都派飞机在离海岸 300 英里的范围内侦察。它还在基隆和高雄附近部署了几十艘快速巡逻艇。它的两艘“旅沪”级驱逐舰和支援舰艇随时准备出击，其中一艘在香港附近，另一艘在福建沿海的主要港口厦门（正对着台湾）。这周结束时、中国宣布演习圆满结束，军队撤回港口。

接着，一个月以后，由于到目前为止美国只发出小小的抗议，中国宣布进行类似的演习，这次是无限期的。在台北和华盛顿，此时人们明显地看到，中国的行动是打着演习的幌子对台湾港口进行封锁，这些港口显然是台湾经

济命脉的主要部分。北京向福建派出几个营的快速部署部队，全部处于充分战斗准备状态。随着危机的发展，北京作出外交姿态。它邀请台湾总统会谈祖国最终统一的问题，并通过一些非正式渠道说明“军事演习”将继续下去，直到台湾坐到谈判桌边。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台湾的反应是愤怒拒绝在枪口逼迫下谈判，中国新闻媒介则把台湾的拒绝说成是台湾希望同中国摊牌的“分裂主义战争党”的得势。

与此同时，聚集在演习区外水域的船只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把第二个航空母舰特混舰队派到台湾的南边，呆在南中国海北部高雄和香港之间，从那里派侦察机和潜艇跟踪中国舰只。此时美国在该海域共有 16 艘军舰，在航空母舰上有 120 架 F—14 战斗机，另外还有巡航导弹和 S—3A/B 反潜战飞机。中国报纸发表文章，说美国人会被中国的空中力量、导弹和舰炮“彻底消灭”，如果美国试图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即对台湾的封锁的话。

第 9 天台湾开始反击，为打破封锁进行了协调一致的攻击。它的沿海炮兵向在台湾海峡的 4 艘中国巡逻艇开炮，幻影 2000 战斗轰炸机在 F—16 战斗机的护航下，用一枚飞鱼式导弹直接命中一艘“旅大”级驱逐舰，将它击沉。在短暂的激烈空战中，两架中国米格—21 飞机被击落，台湾丧失一架 F—16 战斗机，显然是被从军舰上发射的导弹击中的。全世界的报纸以通栏标题报道中国仍未结束的内战出现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冲突。

中国的报复迅速而猛烈。在台湾攻击后的次日清晨 5 点，从福建省和广东省的机动发射场向台湾的目标发射了 DF—15 和 DF—11 导弹。接着，几批中国飞机在晨曦下袭击了台湾的另一些目标，企图使台湾的主要防御设施瘫痪。台湾对轰炸机的袭击进行顽强的抵抗，出动了 F—16 战斗机和幻影 2000 战斗轰炸机以及地对空导弹连，击落 17 架来袭的飞机，但是袭击者保留了最好的飞机，在第二次袭击时派了一个中队的逆火式轰炸机。这次袭击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

受到打击的有台湾 8 个军用机场，5 个海军港口，5 个雷达中心，两个设在该岛南北山脊的情报通信中心。在头两次攻击后 1 小时，中国进行第 3 次轰炸，针对的是第二位的目标：台湾研制导弹和中子武器的桃园中山科学技术研究院、台北郊外的三峡寻弹生产中心、台中飞机制造中心，以及台北、台南和高雄的几个军事联合后勤服务设施。

全面战争突如其来，但是战争涉及到的是心理压力和物质破坏两个方面，还不是试图占领土地。中国仍然没有动用福建的拳头部队，因为它知道，只要这些部队呆在那里，台湾的统治者就会坐卧不宁，不知道中国是不是真的入侵。如果中国真的派兵，台湾的目标不是击败他们。从长远的观点看，它不能打败他们。它的目标是拖延时间，等待国际对中国施加压力和美国援军的到来。其中心思想就是在拖延时间当中尽可能使中国付出高昂代价。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台湾没有对首次导弹袭击和空袭进行报复。它先进的飞机藏在加固的地下掩体内，没有受到损坏。它的军舰预料到这场袭击，早已离开港口，为保护自己驶向该岛的东边。台湾继续攻击海上封锁部队，但是把主力部队保存起来，以待中国试图登陆入侵时使用。

与此同时，台湾向美国紧急求援。它需要 F—16 战斗机来加强空防。它需要潜艇以及反潜战舰艇和飞机来打破封锁。它需要爱国者式导弹对付未来的导弹袭击。它要求提供卫星情报帮助确定中国部队的位置。另外，如果可能的话，它要求美国派舰只打破封锁。在台北，他们明白多年来一直明白的

道理：面对中国坚决的军事行动，只有美国积极干预战争，才能保住台湾的自由，免受大陆控制。

美国总统在白宫情况室召集各军种的参谋长、国家安全顾问、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开会，想知道美国有哪些选择。

回答：第七舰队在一天的时间内即可开到，可以压倒中国的封锁部队，但是美国可能受一些损失。我们利用巡航导弹和飞鱼式导弹以及标准的反潜武器，能摧毁中国海军的水面舰只和潜艇，打破封锁。一旦第七舰队到位，我们可以迅速掌握台湾海峡的制空权，使台湾自己的防御力量能击退从海上来的入侵者。另外，如果我们掌握了制空权，中国人就不能把部队或装备运到他们在机场的立足点，这样台湾军队也应该能够对付他们。

“我们对中国人的优势足以使我们做到这些而又不使自己受到重大损失吗？”

中国人有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和非常好的米格—29 和苏—27 飞机，这可能意味着美国要损失一些飞机。中国可能试图从空中攻击我们的一些舰只，虽然我们相信攻击会被击退，但始终存在舰只被潜射导弹或者飞机发射的鱼雷击沉的危险。我们不能指望出现海湾战争那种敌人几乎根本无力打击我军的局面。

“我们还面临什么别的危险？”

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可能对我们使用核武器。从运载工具的数量衡量，从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就是第三大核国家，这一点并非大家都知道。至少从 80 年代初以来，他们实际上能够用他们称之为长征 2 号的火箭（有时称为东风或者 DF—5）打击我们。这种火箭的射程约 9000 英里，因此肯定能打击西海岸的目标。大约从 1988 年以来，中国能在每个火箭上安装 3 个独立瞄准的弹头。

中国还有一些核潜艇——他们称为“夏”级潜艇，上面装备了带有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我们在离加利福尼亚海岸几百英里的地方发现过一艘这样的潜艇。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艘，但是估计现在有 12 艘。导弹的命中精度在一英里以内。所以中国肯定有能经受打击的核威慑力量。问题是，他们会使用吗？

“从比较有限的介入讲，我们能做些什么？”

最好的做法可能是逐步升级。我们打掉一艘舰只，比如说一艘巡洋舰或者驱逐舰，警告北京，如果攻击和封锁继续下去，我们准备一艘一艘地击沉他们其他的舰只。我们还可以在台湾海峡一条空中走廊巡逻；如果他们跨越我们确定的界线——就像我们曾经在伊拉克建的禁飞区，就把他们击落。

“我们能不能帮助台湾而自己又不直接同中国交战？”

我们通过提供情报可以给他们很大帮助。我们卫星侦察的情报可以使他们知道中国的部署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可提供预警飞机，给他们机载控制和指挥系统。一段时间以来，他们要求增加两艘“诺克斯”级护卫舰、几架 S—70C 反潜战直升机、帮助他们发现潜艇的声响处理器和先进的空中搜索雷达，我们没有卖给他们。担心在亚洲引起新的军备竞赛，但是台湾需要这一切来对付进行封锁的军队。我们可以加强他们的空军，给他们送去更多的 F—16 战斗机，直接从我们自己的库存中提取。我们呵以拿出几个爱国者式导弹往来加强他们的空防。

“会有作用吗？”

现在的关键是让台湾能打破封锁，如果我们给他们送去潜艇和反潜战飞机及技术，他们就可能让中国付出沉重代价。但是中国始终可以把台湾的反击作为入侵的借口。如果中国决心赢得这场战争并且不惜重大伤亡——他们历来不惜重大伤亡，那么，从长远的观点看，除非我们自己直接介入，否则他们会打赢。

“如果台湾被打败，我们会受到什么损失？”

那么，中国附近的其他所有国家，从日本到印度尼西亚，甚至澳大利亚，都会感到美国没有能维护亚洲的和平。特别是日本，它很可能把与我们的联盟看作包袱，它使中国人愤怒而又不能给日本人任何可靠的安全保证。在亚洲其他地方，美国的声誉会一落千丈，那里的国家不管是不是实际那么说，都害怕中国，希望我们保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阻止中国夺取台湾，中国立刻会成为亚洲的超级大国，该地区将不再有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是越南，能坚持执行不首先考虑中国喜好的对外政策。

“讲到日本，村上首相两小时前给我打了电话。他无条件地同意我们利用在冲绳的空军和海军基地进行台湾战区的军事行动。但他告诉我这一点时，声音发颤。他显然希望我们不必接受他的这种表示。日本方面还有什么情况？”

东京一周前宣布的军事戒备状态现在已经全面实行。日本自卫队差不多已经进入战时编制。日本的军舰现在几乎都在它南边的公海。日本飞机正尽最大力量进行巡逻。但是我们知道，日本人不会直接介入任何敌对行动，除非他们受到袭击。如果他们受到袭击，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军队是否挺身而出。

不管怎样，村上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今天东京十万人游行，要求日本保持“和平主义纯洁”，而不管它的含义是什么。现在日本是深夜，但是三千示威者仍在皇宫门前静坐，要求天皇干预。大农叶子刚到——她带领他们合唱《给和平一个机会》。他们用日语唱，但是只要有有线新闻广播公司和福克斯公司把镜头对着他们，他们就用英语唱。

如果我们态度坚决，取得胜利，这些人就会消失。

“如果我们不呢？”

首先，村上首相政治上就完了。其次，如果我们对台湾见死不救，我们同日本的联盟也就完了。外务省的鸽派就会乘下趟飞机去北京，保证日本永远是中国的好朋友和附属国。

“俄罗斯人会干什么，特别是如果我们干预的话？”

俄国人现在依靠中国购买他们生产的一半武器，所以，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支持北京的。但是，如果你担心他们向台湾派出太平洋舰队，那么问题是，什么太平洋舰队？中国拥有的俄罗斯武器比俄罗斯人留给自己的武器好得多。我们的卫星看到这个所谓的舰队正企图驶出符拉迪沃斯托克。两艘带核武器的潜艇离开停泊地，但是它们介入这种危机有什么好处？我们看到四艘破旧的军舰离开港口，但是其中一艘已经沉入水中，另外三艘在日本海漫无目的地开着。

“那么我们的东南亚朋友怎么样呢？”

情况有些复杂，但并不很好。在新加坡，李光耀年事已高，但仍有影响，他呼吁各方结束危机，但他只提到北京的名字，这很能说明问题。不过这并没有多大帮助。泰国呼吁和平，但没有说任何对我们或者台湾有利的話。印度尼西亚新上任的领导人受到华人企业家的牵制，他们要求他保持中立；这

种情况可能改变，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极力劝他勇敢站出来发挥作用。但是，不要激动。在菲律宾我们从新政府得到各种截然不同的信息。我们海军的一些人说，我们应该驶进苏比克湾，接管我们在那里的老基地。他们引用菲律宾最近发出的信息说，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菲律宾人害怕中国，他们不愿采取公开明确的立场并坚持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只能责怪自己。在1995年发生米斯奇夫礁（即美济礁——译者注）争端时，我们没有去那里支持他们。在上次台湾危机时，我们态度暧昧。但是，如果这次我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坚决而有力的行动，不仅菲律宾人，而且印度尼西亚人也将在今后几十年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最终能建立我们在上次竞选时提出的亚太和平与稳定联盟。我们将会持续几代人的均势。

“但是要对付中国，一个有核武器的中国。中国在它自己所在的地区拥有最大的影响不是正常的吗？”

你可以说，整个台湾问题只不过是历史遗留下的一个细节问题，一旦中国占据台湾，中美之间的许多问题就会消失。当然，如果我们不干涉，中国会对我们感到满意。但是，这个问题还有另一面。台湾与其他国家不同，这可能是事实，但它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它有强大的经济。它实行的是民主制度，真正的民主制度。它有2100万人，他们可能不希望在北京的控制下生活。台湾也是老朋友。在朋友被邻居征服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真的能坐视不管吗？

“如果中国占领台湾，它会威胁美国吗？”

不会直接威胁。中国攻击夏威夷或者阿拉斯加的可能性极小。中国无意这样做。但是，如果它在亚洲的势力大大扩张，那就会限制我们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利益的能力，包括保护海上运输线畅通，参与自由贸易和经济发展，防止战争。所以，你可以说让中国夺取台湾，这不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以武力夺取台湾而我们坐视不管，美国的信誉和美国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你们明确建议干涉？”

我们必须干涉。问题不是要不要干涉，而是如何干涉。另外，不管我们如何干涉，都有很大可能与中国直接交火。不是他们打击美国商船，使我们不得不进行报复；就是他们对我们的飞机发射导弹，到那时我们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得介入。

在我们进入下个世纪之初时，在白宫进行这种对话是不大可能的，但并非不可想象。中国越是继续肆意妄为而美国对中国长远的意向和目标越是继续抱天真的想法，这种对话某一天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因台湾海峡问题而爆发战争，纯粹的军事结果当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长远的结果。不管结果怎样，不管美国是不是保住了事实上独立的台湾，中国和美国付出的代价都是惊人的。中国经济发展计划会倒退许多年。北京会失去全世界对它最终的和平意图的微弱信任。至于美国，一个长期有利的时代结束，一个在美国统治下的亚洲和平的时代会被超级大国公开冲突的新时代所取代。

当然，关键是避免这种对抗。确实，关键是避免将来中美关系中出现其他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困难。努力做到这一点至少是今后十年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任务。做下到这一点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确保成功呢？下面要讲的是处理美中关系的一些具体建议，目的是把中国必须正视

的问题隔离开来，希望有一种坚定、连贯和明智的政策，以保持均势作为明确不变的目标，那就可以避免在白宫出现刚才设想的那种紧急对话。

结论：对付中国

中国苏醒时，将震撼世界。

——拿破仑·波拿巴

在过去两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一个强国，现在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在它如人们早就预料的那样苏醒时，对它必定要成为全球强国这一点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是，在中国恢复作为世界强国的历史地位时，能干些什么鼓励这一强国的崛起成为有利而不是有害的事呢？换句话说，怎样才能把我们与中国的冲突处理得当？

不管中国出现什么情况，美国对它的政策都应该以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明确而坚定的意识为指导。今天的情况不是这样。实际上，主要由于中国的宣传机器和克林顿政府混乱言论的影响，有关美国政策的讨论认为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接触”（“engagement”）或“遏制”（“containment”）。这两个词模糊不清，用以说明政策几乎毫无意义。“接触”的意思充其量只不过是以美国那种认为加强交流能自然而然导致关系改善的高尚然而天真的想法为基础，在各方面加强同中国的交往。但是“接触”也含有比这糟糕的意思：对中国让步并且不管它的行为多坏都不加制裁，就可以鼓励中国在国际社会表现出较大的克制和责任心。

另一方面，“遏制”的药方则是以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政策为模式的长期情疑和敌视。苏联是一个在领土和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扩张主义、对经济实行严格控制并想以救世主自居征服世界的国家。中国与苏联不同，它的情况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态度更像19世纪崛起的沙俄，而不是20世纪的苏联。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超级大国，按人均产值计算弱小而贫穷。但是，从绝对值看，中国非常强大，因而能把资源和能力汇集成为主宰该地区所需要的实力。另外，尽管它并不觊觎邻国领土——台湾这个特殊情况除外——但它是一个很不满足的国家。在中国有一种共同的拼向精神，要弥补失去的时间，不惜利用从欺骗到恐吓、从合法竞争到公开盗窃的一切必要手段，达到恢复大国地位的目标。

美国的目际不是使中国成为一个软弱贫穷的国家，而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稳定和民主、保持亚洲的均势、在贸易和武器扩散等方面守规矩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使中国跟随全球的民主趋势，这样中美最尖锐的冲突几乎一下子就可以消失。只要北京需要顺应它自己人民的需要和愿望，只要它奉行的政策要经过真正的审查和辩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利益的威胁就会减少。这并不是说所有敌对情绪都会消失，而是说民主国家，即使在互相都很气愤的情况下，通常也会尊重他们自己人民不愿打仗的情绪。例如，解决台湾问题只需要北京正式承认台湾2100万居民通过民主形式表达的意愿。台湾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一个民主的大陆几乎必然会带来统一，开始很可能是某种联邦安排。在这种情况下，迫切希望完成民族大业的中国在夫挫后派兵征服台湾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存在了。

那么，怎样同中国打交道呢？通常的标准解决办法是把平衡作为第一原则。我们必须平衡往往不一致的目标，鼓励尊重人权和经济交往是最明显的。按照这种做法，美国的政策往往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显得前后不一，脱离基本目标。当中国压制人权时，美国政策中的人权部分就提到显著的地

位，而忘记了过分热情地执行这样的政策会牺牲其他利益。几个月后，当一两个重要合同丧失给日本或欧洲竞争者时，经济利益上升到突出地位，人权则被作为天真的理想主义而抛弃。

明确的目标和旨在达到这些目标的明确而连贯的方针是任何政策的基础。现在有三个目标：第一，通过保持亚洲稳定的均势确保亚洲和平；第二，鼓励该地区最大、实力可能成为最强的国家，即中国，成为致力于防止武器扩散、和平解决争端和真正自由贸易的国家；第三，促使中国加强民主和尊重自己公民的人权，部分理由在于民主与和平解决争端是携手并进的。

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是美国能够比过去较有效地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一个领域。美国通常对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反应是谈判，在谈判失败后发出制裁的威胁，接着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而协议的执行必须加以监督并往往有待于新一轮的谈判—威胁—达成协议的循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广为报道的中国非法复制计算机软件和光盘的问题。在激烈的谈判、威胁和反威胁中，美国设法迫使中国先后签订了两项限制盗版的协议。中国执行 1995 年就这个问题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只是敷衍了事。同情北京的人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关闭由人民解放军或者地方掌权者拥有的生产盗版光盘的工厂。然而，在贸易战眼看就要爆发时，由于北京当局公开作出追捕盗版光盘生产者的姿态，双方达成协议。第二个协议签订后，没过几个星期，贩卖盗版光盘的人又在北京的街头起劲地向西方游客推销。1996 年夏天，在协议达成后仅几个星期，一个贩卖光盘的人高兴地对美国游客说：“一切照旧。”（注 1）

在国际产权方面，尽管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至少比较稳定，而同中国人达成的其他协议后来证明更加令人沮丧。我们已经提到 1996 年的美国贸易报告，报告讲到中美 1992 年达成的取消保护主义关税的协议是怎样因为中国当局采取使原来的部分协议失效的新的保护主义措施而受到破坏的。新实行的非关税壁垒也使 1996 年初通过的许多减税措施失效，而在通过那些减税措施时，中国曾大加宣扬。

这已经成为一种格局。每次中国人实行新的贸易壁垒或者扭曲市场的伎俩，美国人数不多的贸易机构就不得不去发现它们并加以登记，然后同中国人重开谈判以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总之，中国采取的战略酷似毛为保卫中国不受外国军队入侵而采取的人民战争战略。让侵略者深入中国，然后雨游击战术把他消灭。今天美国使自己被类似的游击战略所击败：我们同中国打了一仗又一仗，仗仗都打赢了，但是我们自己被拖得筋疲力尽，最后在战争中失败。我们即使派出由一万贸易斗士组成的政府大军去中国保护主义的丛林作战，也可能仍然赢不了。

研究美日贸易战的专家早就指出，日本搞的贸易壁垒和扭曲市场的机制在日本制度中并非反常，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能通过谈判解决。日本的做法代表了日本的发展现状。这个结论也适用于中国。中国有意识地以日本为模式采取的一套做法，是旨在加速经济增长的战略的一部分。对日本，在冷战期间美国常常愿意为加强日本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而付出贸易逆差的代价，甚至愿意丧失整个行业。然而中国与日本不同，它比日本大几倍，它不是我们对付更重要的敌人的斗争中的战略伙伴。让中国在经济上搞欺骗不会使我们在战略上或地缘政治上得到好处。

确实如此。让我们看一看中国用它在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积累的巨额

贸易顺差干什么：

它建立了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这是未来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源泉。

它用数十亿美元从俄罗斯和西欧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

它补贴与那些不像美国那样对中国商品开放的国家的贸易逆差。

简单他说，我们目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要扭转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必须采取步骤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有必要在这里指出，我们不必减少从中国的进口。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从中国的许多进口对美国人有利，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利。目的不应该是减少中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而应该是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一旦中国取消对进口货物的各种壁垒，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就可能增加。怎样做到呢？

美国应该允许中国出口它能在美国销售的所有产品，但是有一个条件：通过取消中国单方面的贸易壁垒使美国出口增加来逐渐降低贸易逆差率。目前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是它对美国出口的 25%。华盛顿应该直截了当地宣布，明年这个数字必须增加到 30%，后年增加到 35%，以此类推。只要中国达不到这些标准，就自动对中国出口征收惩罚性关税并实行其他措施——理想的是针对中国的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这类高增值进口品，而不是针对中国真正占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我们不应该坚持要求把贸易逆差减少到零。当美国的出口相当于中国出口的 65% 时，美国可能不再需要坚持每年改善 5 个百分点。

这种做法的不利之处显而易见。管制的平衡贸易的主张似乎同本书作者长期以来赞成的真正由市场推动贸易的主张背道而驰。但是有利之处大大超过不利之处。首先，这种政策有利于日益发展的美中经济关系，而不是被迫削弱这种关系。它可以避免像今无所做的那样对一个个问题进行痛苦的、叫人受不了的谈判。它还可以阻止中国对美国发动经济战，为了处罚美国在政治上的攻击而转向欧洲和日本的供应者。换句话说，如果中国购买空中客车工业公司的飞机而不购买波音公司的飞机，以此压美国放弃对中国人权的关注，那它要付出经济代价。另外，这种安排包含着对中国的这样一个保证：只要中国公平行事，美国的市场——中国最好的出口市场——将向中国的商品敞开。以这种方式处理贸易逆差要比求助于单方面的保护主义好得多。

的确，虽然我们的建议似乎有几分管制贸易的意味，但实际上它带来的结果会比目前的制度能得到的结果更接近真正的自由贸易。今天我们的自由贸易仅仅是单方面的：我们允许中国出口几乎它想向美国出口的所有东西。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却采取各种办法扭曲市场力量，限制进口美国货物。这不仅使美国的出口与进口不平衡，而且绝对值也很低。美国 1995 年全年对中国的出口值只相当于同年美国对加拿大平均 5 个星期的出口，差不多只相当于对加拿大出口值比上一年度的增长额。（注 2）实际上，如果中国取消它从 80 年代末以来采取的扭曲贸易的措施，美中贸易很可能大致平衡，就像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那样。

可以肯定，中国官员会大声抗议这种解决贸易失衡的办法，但是也可以肯定，中国除了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美国是唯一愿意并且能够购买那么多中国货的国家。中国既想向美国自由出口，又想设法得到巨额贸易顺差。如果让它在出口与顺差之间作出选择，它将不得不选择出口。

总之，美国在贸易方面有很大的施加压力的潜力，如果它愿意利用的话。但是新的中国院外游说团正在压华盛顿不要用。它的第一个要求是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长期化，而不是每年考虑延长。我们同意最惠国待遇不应因政治原因而取消，但是我们不同意自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不管中国的贸易行为怎么样。原因并不复杂：一旦最惠国待遇成为长期的，那美国几乎不可能通过我们建议的办法压中国放弃不公平的做法。

实际上，我们认为在下次辩论时，国会应该中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让政府有充分的权力在美国的总出口没有像要求的那样逐渐增加时就提高对中国货物的关税。在授予这种权力的同时应该明确指示，政府必须利用新授予它的施加压力的手段，设法平衡与中国的贸易。

中国院外游说团的第二十要求是美国放弃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从 1994 年世贸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一直想成为它的一员，但是美国阻止它加入，要求它减少或者取消本书中记载的许多扭曲贸易的做法。中国方面则要求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这样可以免去世贸组织对公平和开放贸易的许多要求。

查默斯·约翰逊解释过让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危险：“中国将不必在公平的基础上向外国竞争者开放市场，它可以不受世贸组织有关补贴、在中国投资以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协议条款的限制”。（注 3）在 1996 年底有迹象表明，美中两国的官员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已接近于达成一项折中方案，作为包括江泽民访问华盛顿和比尔·克林顿访问北京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将加入世贸组织。但是这种交易将使中国得到它希望的一切，而美国得不到任何补偿。它会使中国经济得到第三世界的优惠，然而，正如我们所讲的，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了一些用当于第一世界的大的地区，随时准备与美国进行直接而又不公平的竞争。

另外，如果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美国几乎无法在美中贸易争端中采取什么有意义的行动，因为中国有权坚持通过世贸组织有约束力的仲裁系统解决任何争端。世贸组织同它的前身关贸总协定一样，谨小慎微，行动迟缓，很少采取果断或者大胆的行动，争端要数年才能解决。即使美国每次都获胜，那也要回到一个一个问题加以解决的老路，中国始终可以通过人民战争的战略取得胜利。

目前美国对中国人权的政策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虚伪的。政府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大喊大叫，扬言报复，然后义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其原因与舆论对这个问题的压力时大时小有一部分关系，但是美国不能使中国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其后果之一是它能无视国外的要求和威胁。最终，不管我们如何大喊大叫，美国实际上没有力量迫使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尊重我们视为不可剥夺的权利。另外，对中国实行制裁没有意义，因为制裁很可能使美国人受到损失，而又达不到制裁的目的。这是克林顿政府当初试图把最惠国待遇同人权的具体改善联系起来时所犯的错误，当政府不得不让步时，这种毫无作用的道义主义只能使人羞辱。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权并没有改善。

在人权问题上，有两点既重要而又互相矛盾。一点是，美国不能让被关押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西藏人来制约自己对一个新兴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的政策。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为保证其他国家的公民得到公平待遇的无效努力中放弃自己的物质利益，不管是经济利益还是军事利益。然而美国也不

能接受“与中国接触”派屈从的建议，完全放弃人权。怎样才能满足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呢？

对于中国国内的人权，美国应该执行它在使贸易关系和人权脱钩时宣布的措施。它应该继续大力支持自由亚洲广播电台。这个广播电台于1994年秋天开播，其宗旨不是宣传，而是以客观、内行的西方新闻报道的传统向中国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新闻。在西方有一些中国人组织经常公布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并努力形成中国民主运动的核心，美国应该继续给他们提供资金——即使那些组织常常起不了什么作用，也应该这样做。华盛顿应该积极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半心半意没有成效地——要求各种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不过也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等其他组织，正式审查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即使知道在许多情况下这些组织并不想讨论不少国家视为纯属西方文化偏爱的的问题，也应该这样做，美国应该坚持让中国非政府组织有权在这些论坛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不是默许中国政府极力压制这些组织的声音或者让中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取代这些组织。中国这方面的努力往往是成功的。

这些计划要求的资金不多，必须承认，得到的成果可能也不多。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一个专制国家，这种状况很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在人权问题上采取鲜明的立场并以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自己的主张，是美国信守民主理想和致力于开放社会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只为自己的物质利益而斗争，我们就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自豪的超级大国。

这一问题涉及到怎样正确处理我们与北京领导人的必要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冷淡和恰如其分的。美国官员不应该为了显示处理对外事务的才能而听不到中国对我们的恶语，看不到价值观和实际做法的不同，看不到互相冲突的利益。我们倒是希望克林顿政府下邀请中国主席江泽民来白宫并给予21响礼炮的待遇。与中国领导人接触还有其他方式。但是，一旦江来到美国，应该以谈正事来安排，而不要把他的访问变为庆祝友好的节日。重要的一点是避免从道义主义极端变为不加批判的过分热情。首脑会谈尤其不应成为使中国领导人荣耀的场合，而应成为现实他说明分歧和努力使对方采纳符合美国道义和物质利益的政策场合。

在另外两个方面，人权问题不是有利就是有害于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其中之一是香港，如果中国接管后处理不当，人权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就会上升。如果北京开始限制人权，逮捕持不同政见者，关闭报社，把宗教活动限于所谓的“爱国教会”，干涉香港学校的学术自由，人们是不会感到意外的。如果中国真的这样做，在香港有很大经济利益的美国将面临它常常遇到的一种困境：想采取行动，而又无能为力。

然而，在香港，中国原则上同意承认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独立的生活方式。它在1984年同英国签订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中作出了这种承诺。美国声称香港的法治关系到它的经济利益是有理由的。美国应该坚持要求中国履行它的诺言；如果中国不履行，那就应该大声地强烈抗议。

在西藏，对中国其他地方的一般性人权政策也应当是适用的。

美国人有必要承认，不管怎样，即使在理想的情况下西藏像过去多次出现过的那样成为独立国家，我们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取代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在几乎毫无希望实现独立的情况下把独立作为目标，是没有意义的。

尽管如此，美国仍然可以同那些代表西藏人民愿望的人保持良好的关

系。西藏人民希望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承认达赖喇嘛为他们的宗教领袖。在这方面美国的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坚定的。达赖在美国时，美国高级官员会见了，总统本人也以谨慎的方式临时接见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总理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下顾中国的警告，同达赖进行了正式而充分的会谈，表明中国力图恐吓其他国家在西藏问题上服从它，是不会如愿的。

普通公民和民间组织以及议员都能让中国处于尴尬的境地和给西藏人道义上的支持，从而为西藏自由事业作出有力的贡献。

1996年，德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在西藏的人权记录。

中国以夸张而尖刻的语言作出了反应，称这个决议是“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对中国内政的严重干涉”。（注4）接着中国取消了德国外长克劳斯·金克尔对北京的访问。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尽管非常希望保持同中国的贸易，但他在一两天后说，把这项决议称为违反国际法或者干涉中国内政是荒谬的。

中国不会轻易放弃对西藏的压制和不人道的控制；的确，这样做甚至可能是不必要的。从长远看，随着中国自己成为比较民主的国家，西藏的情况会不断得到改善，直至两个实体有可能自愿组成邦联，如果西藏人和中国人都作出这样的选择的话。在此之前，美国对西藏应该采取它对中国其他地方采取的人权政策，包括在国际会议上批评北京。中国以激烈的言辞回敬人们对它在西藏的所作所为的批评，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对国际舆论的注意，而这种注意有一天可能使它放松对西藏人民和西藏文化的压制。

1996年夏天，由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24名战略思想家和政治领导人组成的一个著名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称为《美国国家利益》的报告。委员会的结论是，在许多被认为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利益之中，只有五项是切身利益。切身利益的定义是看委员会成员是否肯定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维护这种利益、价值观或者状况对于美国保卫和加强美国人在一个自由和安全的国家的幸福，是绝对必要的吗？”

该委员会认为人们通常以为的“切身利益”多数经不起这个检验。在经得起检验的切身利益中，第一项是防止他国以核、生物和化学武器对美国进行摧毁性攻击。第二项是“有必要”防止欧洲或亚洲出现敌对的霸权国家”。（注5）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切身利益显而易见，没有必要加以解释，从这个意义上给切身利益下的定义一直指导着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的政策。在欧洲目前不存在这种霸权的危险，而在亚洲确实存在。然而，没有多少美国人能说明，如果中国实现主宰亚洲的目标，为什么我们的切身利益会受到威胁，特别是中国与半个世纪前的日本不同，无意派兵征服亚洲其他国家的领土。

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历史学家、战略思想家沃尔特·麦克杜格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这是地缘政治常识，尽管美国人民对它不感兴趣。”顾名思义，一个真正能主宰欧洲或亚洲的霸权国家应该非常强大，当地没有人能防止它随心所欲地在整个地区投放力量。例如，在亚洲，如果中国能自由地发展远洋海军和包括飞机和导弹在内的空中力量，那么在美国觉得有必要向亚洲派兵以保护自己在那里的利益时，中国就能妨碍或者甚至阻上美国这样做。我们的贸易运输线，特别是能源运输线，就很容易受到袭击。筑垒自守的美国可能甚至不得不为了与东亚其他国家做生意而给中国进贡。

如果美国在东亚没有任何军事资本，就会失去打一场类似海湾战争那种有限区域性战争的能力。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决定阻止其他国家为美国提供必要的土地和合作，它将能够这样做。美国将不得不在不战——即在对抗中默认中国得胜——或者世界大战之间作一选择。

正如我们看到的，中国的一项长期目标是防止美国武装力量在亚洲拥有任何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发起进攻的永久性基地。目前中国太弱，不能坚持要求美国放弃在那里的基地。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怎样期望未来某一天美国军队将别无选择，只有离开韩国，而呆在日本的部队也仅仅是为了防止日本重新武装。我们还看到，中国成功地压泰国拒绝了我们的把军事装备储存在停泊于泰国领海的货船上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此后，曼谷又出人意外地拒绝了自由亚洲广播电台利用在泰国的发射台对中国广播的要求，中国即刻对这项决定加以赞场。（注6）

如果美国需要在泰国实际部署军队，比如说，在中国和菲律宾。因开采南中国海资源发生冲突时进行干预，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中国肯定会压泰国不让美军利用它的领土；中国一旦拥有它谋求的霸权，它就会成功地施加这种压力。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列出了中国的地区霸权可能迫使其他国家服从北京意志的11个方面，包括默许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在中国可能因人权、武器扩散或者经济问题与西方发生冲突时支持中国。

所以，美国在亚洲的首要目标非常明确：防止中国成为一个能干扰美国在亚洲追求其利益的敌对霸权国家。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做的是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使它在力量和效率方面大大超过中国军队。美国有必要密切注视中国军力的加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的技术优势很大，只要采取必要行动保持这种优势，中国也许永远赶不上。

第二，应该明确地把防止中国加强核武器力量作为美国目标。正如我们在前一章里设想的，最坏的情况是，在中国感到有损它的主权或者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上，中国只要哪怕是含糊地发出核攻击的威胁，就可以预先阻止美国采取决定性行动，如在中国入侵台湾的情况下出面支援台湾。中美关系最坏的结果可能是再次出现冷战时期那种核村峙的局面，双方都依靠互相确有把握摧毁对方的理论来防止对方攻击。

实际上，中国有许多理由避免核武器竞赛。核武器竞赛要花费很多钱；从中国的观点看，也许更重要的是会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日本和印度，大力发展核武器以赶上中国，美国应该悄悄而有效地增加国际压力，说服中国把目前的暂停核武器试验变为永久性的。它还应该非常积极地反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核扩散。同人权不同，亚洲核武器的任何增加确实会影响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为防止亚洲核武器增加而采取的任何考虑周密的政策，包括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都是有理的。

均势的第三个因素涉及到台湾。如果美国陷入中国与台湾的冲突，那就会出现亚洲均势处理不当的最坏结果。避免这种结果的最重要的措施是确保台湾有可靠的防御性威慑力量，这样，一旦统一，那就该是自愿的统一。不管中国人怎样威胁、警告和抗议，美国必须继续向台湾提供它需要的武器；空防和反潜战系统对防备中国可能的封锁特别重要。

除此以外，保持亚洲的均势实际上就是一件事：加强日本的力量。中国力量的增强使美国近些年来对日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我们再也无法按照软弱的日本就是好日本这种设想行事了。可以鼓励日本无视中国开

展的要它认罪和恐吓它的运动，不是拒绝承认战争罪（日本肯定应该承认战争罪，不仅向中国承认，而且向美国承认），而是在中国眼皮下建立一支可靠的军事力量。一位专家警告，日本的战备没有经过考验，令人怀疑。尽管自卫队有昂贵的装备，一旦发生战争，很容易被击溃。甚至在紧急军事状态下各级指挥系统能否保住都很难说。（注7）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理论一直认为日本重新武装会威胁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如果说这种看法过去是正确的，那只是因为中国贫穷软弱。现在的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实际上，在冷战后的世界，使和平与稳定受到威胁的恰是日本的软弱，因为它造成美国光靠自己无法填补的力量真空。一个真正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的强大的日本对亚洲新的力量对比关系重大。日本软弱只会有利于中国，而中国希望的不是亚洲起稳定作用的均势，而是中国的霸权，日本在这种霸权下不过是中国最有用的附属国。

这意味着美国不能再把日本视为长期处于军力弱小和外交地位卑贱状态的反常国家。这是很矛盾的。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在亚洲称霸，除非日本在此过程中成为平等而心甘情愿的伙伴。但是，如果美国催促日本，结果很可能使那里作出反美反应。解决这个难题是近期美国外交最重要的任务。在等待日本认识对它威胁越来越大的安全环境的过程中，美国必须显示自己是一个可靠而又可信的盟友，就像今年春天在台湾附近水域所做的那样。在这方面，中国决心在亚洲取得霸主地位可能有利于美国。但是，毫无疑问，美国和日本必须意识到它们都需要对方。

美国的相对力量在下降，如果它认为自己能继续保证整个亚洲的和平与秩序而不用日本更加积极的支持，那它就是欺骗自己。两国的海军，比方说，应该计划在太平洋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演习的范围逐渐扩大，从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扩大到密克罗尼西亚，最终到东南亚。这种合作可以稳住东亚新的均势。

必须指出的最后一点是，与中国为敌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设想同重新崛起而又越来越民主的中国建立亲密的关系并非不可能。因为这样的中国重视与美国建立密切的关系，愿意为此目的放弃冒险的对外政策和军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危险的时期是我们眼前的这段时期：中国仍然由老一辈共产党人统治，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是在毛主义时代形成的。他们不忘中国在外界控制下的屈辱。新一代正在等着接替他们，这代人观念比较新，其中一部分人在美同和欧洲大学受过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和比较容忍，较少条件反射式的自卫心态和大国沙文主义，许多人同情天安门事件。

我们不知道年轻的中国人脑子里想的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人容易接受现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美说教，他们中多少人有一天会实际带头推进这套说教。我们注意到一个小小的迹象：《中国可以说不》这本刻薄反美的书的作者都是那种人们本来可能希望能与老一辈分道扬镳的年轻知识分子。但是我们也看到许多二十来岁、三十来岁、四十来岁的中国人对与人敌对的民族主义不感兴趣。美国外交的另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与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中世界主义观念比较强的开明派保持良好的关系。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最可靠的办法，是让中国生活中的这一思潮得势并指引整个中国进入21世纪。

附录笨拙的谎言——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糜振玉

最近，我看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和多伦多《环球邮报》前驻北京记者

伯恩斯和芒罗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令我惊讶的是，该书序言的题记，引用了我从未讲过的话。引文是：“（至于就美国而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绝对有必要不动声色地满怀仇恨……伐们必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删节号是引文中原有的）该书作者没有明确指出引文摘自何处，只说是“在一本 1996 年广为发行的、由若干名中国官员撰文的文集”。1996 年我国出版的书籍中，只有华龄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大趋势》中曾转载了我一篇题为《中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文章。在我这篇文章中，恰恰是阐明了依据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性质、社会制度、内外基本政策和武装力量的任务，决定了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只能是“积极防御”；我国的军事战略服从并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宪法，这就规定了我国军事战略方针自卫的、防御的基本属性。并且指出，我日主张力求避免和制止战争，力争用和平的方式而不是用战争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遏制战争的发生是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通篇没有提到美国，更没有该书引文中的内容。如果两位作者认为我在别的场合或另外的文章中有你们所引用的话或文字，那么请拿出证据来。否则，你们就是子虚乌有的捏造。

令人费解的是，两位作者对江泽民主席一再表明的中国愿与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充耳不闻。他们热衷于假借别人名义，制造谎言，加剧中美敌对的气氛，以欺骗和误导世人。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作者，为了证明所谓“中国威胁”，随心所欲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编造论据，丑化、妖魔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人权等各个方面，中国的国防和军事更是其攻击的重要方面。作者煞有介事地在中国国防开支上大做文章。按照他们的所谓“10 倍算法”，“中国的实际国防开支达到每年 870 亿美元”。众所周知，中国的人均军费是世界上最低的，以 1996 年为例，人均只有 7 美元，而美国人均达 996 美元，日本人均 360 美元。如果按每个军人的人均军费计算，美国每个军人为 17.83 万美元，日本每个军人为 18.8 万美元，而中国每个军人尚不足 3000 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 1.6%，日本的 1.7%。就是中国军费的绝对值，不但比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少很多，而且少于韩国和台湾地区。仍以 1996 年为例，美国是 2639 亿美元，英国是 325 亿美元，法国是 383 亿美元，德国是 319 亿美元，日本是 451 亿美元，韩国是 156 亿美元，台湾地区是 136 亿美元，而中国是 715 亿人民币，约合 87 亿美元。1996 年中国全国财政收入是 7366 亿元，全国财政支出是 7914 亿元。如按该书作者所说，中国国防开支达 870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7134 亿元，那么，岂不是中国的全国财政支出的 90% 都用到国防上去了吗？请问作者。如果是这样，中国哪还有什么资金去搞基本建设，去发展文教科卫事业和改善城乡人民生活呢？哪里还有什么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可见，作者的论点是何等的不值一驳。难怪该书一出版，就受到美国一些学者的批驳，指出该书提出的“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是“危言耸听”，作者分析中国问题所依据的材料不当，判断中国在国际上的意图时“很草率”。

在美国，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愿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国家，也不愿看到中美关系的改善。每当中国有所发展，每当中美关系有所改善的时候，他们就浑身不舒服，就制造“中国威胁论”，就在中美关系上挖空心思地大造减少信任、增加麻烦、阻碍合作、加剧对抗的舆论。邓小平指出，

中美两国终归要好起来才行。奉劝伯恩斯坦和芒罗之辈，还是别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吧！

（新华社北京 1997 年 4 月 17 日电）

危言耸听的拙劣之作——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古平

今年2月，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的书（以下简称《冲突》）。书名十分扎眼，其实并无新意，无非是些道听途说，重弹“中国威胁论”的老调。该书的一个中心论点是，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亚洲霸主”，“企图取代美国在亚洲占统治地位”，中国“肯定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朋友，而是长期的对手”。作者断言，中美肯定要发生冲突，而且冲突即将到来。因此，这是一本危言耸听的拙劣之作。

作者诡称，中美冲突盖源于中回要称霸亚洲，而导致中国“在亚洲谋取称霸地位”，有以下几个因素：

其一，“中国的幅员本呼和它固有的力量”。《冲突》作者把中国的国土大、人口多等客观因素说成是导致“称霸”的原因，这真叫人哑然失笑。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只有自行解体，四分五裂，才能解决这个“幅员和固有力量”的问题。才能免除“谋取霸权”之嫌。纵观世界近代与现代史，荷兰曾是海上霸主，英国曾是“日不落帝国”，日本和德国曾发动过世界大战，而这些国家都算不上幅员和人口大国。说到底，是否谋求霸权是一个国家目标和国家政策问题。“不称霸”是中国的基本国策，这是举世皆知的。驻北京多年、自视为“中国通”的两个作者，难道连这一点也不知道？

其二，中国“自认为是全球文明中心”。如果说，处于封闭状态的旧中国，或可说具有某些类似的思想特征，把此话用于今天，用于开放的、努力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当代中国身上，其现实感几乎等于零。《冲突》的作者曾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生活多年，居然说出这种话，除了别有用心，很难作别的解释。

其三，中国“一心要摆脱数百年来使它蒙受耻辱的羸弱状态”。确实，中国人民决心加快国家的发展，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求独立，求富强，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起码权利，无可指责。作为一个曾遭受外国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中国的这一决心尤其坚定。《冲突》的作者把这种正当的愿望与“谋取霸权”扯在一起，显然是居心不良。中国的繁荣与进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这才是正确的结论。

其四，说到“谋取霸权”，《冲突》的作者乃是夫子自道。他们说得多坦率：未来的“全球新秩序”“将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问题的症结正在这里。作者注中国头上强加种种不实之词，原来有一个基本前提，即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它拥有“天赋霸权”，任何不合他们心意的事态发展，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某些人就将此视为对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冷战结束之后，他们不甘“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失落，出于对内对外的政治需要，刻意制造恐慌和假想敌。他们把发展迅速的中国当成对他们的最大威胁。这就是“中国威胁论”出台的基本背景，也正是两个作者制造“美中冲突论”的根本动机。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历史表明，每当美国政府开始较为理智地处理中美关系之时，就有人出来发难。去年下半年以来，中美关系开始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政治互访增加，经贸往来频繁，军事交流得以恢复，美国高层政界人士也相继访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正在积极准备中。中美两国人民都为两国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感到高兴。然而，在美国有少数人不高兴。

今年2月，美国出现一股反华浊流，既有一些新闻媒体大力炒作，又有一些国会议员、反华老手推波助澜。他们诽谤和丑化中国，指名道姓攻击主张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美国公司和知名人士，竭力煽动“遏制政策”的歪风，企图从消极方面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冲突》在这次反华浪潮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因此，它一出笼就遭到美国许多尊重事实的严肃学者的批驳，是十分自然的。

中美两国发展正常关系是由两国各自的基本利益决定的，这是时代的需要，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要想阻挡和破坏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那就是不识时务。

（原载1997年4月23日《人民日报》）

红星在东方升起——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美) 哈里·哈丁

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比中国自身变化得更快。80年代，我们以为邓小平正在使中国转变成一个对美国友好的市场民主国家。天安门广场抗议被镇压以后，当时流行的看法是中国濒临地区分裂、政治崩溃或民主革命。现在，仅仅五年之后，一般人的见解是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将是美国下个世纪的全球敌手。

理查德·伯恩斯和罗斯·芒罗这两位曾经在北京工作过的记者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以迄今为止最充分不过的笔墨陈述了对中国的这种新的、令人不安的估计。他们的主要论点是：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主宰亚洲”。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因为美国的利益一直是防止任何一个别的大国在亚洲称霸。但是美国的商界（他们心醉于中国的市场）、“一批有影响的美国前高级官员”（他们自己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以及美国学术界一些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想要保持自己能会见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身份）组成一个“新的院外中国游说团”，反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强硬政策来对付这一正在出现的威胁。

实际上，这本书的内容并不像它的书名那样令人惶恐。虽然两作者假想美中两国可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对抗（美国是否会由于对台湾承担义务而卷入这样一场对抗，两作者似乎持有保留意见），但他们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爆发战事是不大可能的。相反，他们预言两国将为争夺亚洲霸权而进行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竞争，而又不至于彼此开战。

两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也不像人们也许预期的那样好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尽管说中国野心勃勃，却并不鼓吹遏制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领土野心不大。他们还告诫说，提倡民主不能是美国对华唯一目标，并且反对将中国最惠国待遇与人权纪录挂钩。事实上，尽管他们认为“新的院外中国游说团”懦弱胆小而加以批评，他们似乎仍然支持与保持接触的政策。他们与克林顿政府的分歧主要在于，他们建议通过谈判规定贸易配额（而不是达成市场准入协议），以便缩小中国对美贸易中日益升高的贸易顺差；他们还主张维持一种有效的亚洲力量均势（而不是天真地依靠区域性安全与经济组织），以对付中国力量的崛起。

由此看来，这本书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它开出的处方，而在于它的分析。两作者对中国的国际意图的描绘是肤浅的，其依据几乎完全是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近几年发表的书和文章，而没有看到对北京的行为起作用的那些更深层次的和长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他们也没有问一问，亚洲的发展趋势究竟是将会鼓动中国谋求该地区霸权，还是将会打消它那样做的念头。

此外，像目前多数一般人对中国的看法一样，这本书也是过分直线式地按照最近的事态发展预测未来。于是，目前上升的民众民族主义情绪、增长的军费预算、对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要求以及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都被看作是中国将来所作所为的准确无误的前兆——这正像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思·勒巴德根据80年代的美日贸易摩擦就在1991年出版了缺乏远见的书《即将到来的美日战争》一样。

其实，中国对外政策的未来远不是像两作者要我们相信的那样肯定。中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的确是个人担心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还有另一些同样

可能的情景，两作者却没有予以适当考虑。一种可能性是，随着中国日益加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而且日益操心于它所烦恼的国内问题，它在行动上将会采取更加负责和合作的态度。

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中国政治结构缺乏反应能力，财政体系变得无清偿能力，无法解决一系列的卡脖子的国内问题（能源、农业、人口过剩、污染等等），因而国家开始解体。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也会向国际社会提出真正的挑战，只不过那时的威胁将是来自一个太弱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太强的中国。

如果说以往的经历可资借鉴，那末，两作者今天描绘的中国，既强大而又富有威胁性，与美国争夺亚洲的霸权，这样一种形象将很快被某种不同的、同样夸张的形象取而代之。然而，两作者认为应该现实地与中国交往，而不要企图遏制它或孤立它，这样一个建议将仍然是合理的。

（译自 1997 年 3 月 9 日《华盛顿邮报》）

中国在崛起——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美) 欧文·哈里斯

在美国的外交政策日程上，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同一个上升中的中国——一个正快速行进在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的大国打交道，邓小平的去世已经证实了这种紧迫性，但目前美国对北约东扩的痴迷说明它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美国外交政策界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大致说来，思想家们分成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前者对中国今后可能有的表现作出最坏的假定，因而鼓吹对它采取以往对苏联成功地使用了40年的那种强硬的政策。后旨则争辩说，耐心和一定程度的通融——假以时日，让现人化和繁荣起作用——最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温和与负责任的国家。人们在看法上的差异似乎主要同性情有关，而不是同意识形态有关，这在冷战后的世界上已不是什么不寻常的现象了。

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非常熟悉亚洲的情况。现为《纽约时报》书评员的伯恩斯坦曾是《时代》杂志驻北京分社的首任社长；原任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计划主任的芒罗以前是多伦多《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他们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以内容生动翔实的一尽管可能是有欠公允的——论述加入了这场辩论。正如他们的书名所表明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是赞成以比较强硬的态度处理美中关系的。该书第一句话就描述了两个“全球对手，即两个关系紧张、利益相悖、面临着更困难也更危险的时期的国家。”他们称中国“咄咄逼人”，说美国“天真”，认为这种“隐约可见”的冲突可能导致军事冲突。

两位作旨对这种状况作出三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全局性的：他们认为，在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国际舞台上，两个最强的角色出于本性几乎必然要成为激烈的对手。第二，中国上层统治集团——“那个行事诡秘、自我选择的决定政策的集团”——的自身利益促使它故意加剧敌对状态，以此作为对国内进行控制、使它的权力合法化的手段，它需要——在现在已经没有苏联敌人的情况下尤其需要——以美国作为敌人，以便操纵“一种因遭受屈辱、丧失了显赫地位而造成的民族主义”。第三，文化上的不相容是一个引起摩擦和恐惧的因素：美国人具有坦诚、平等和宽容的特质；中国人则倾向于专制、看重等级、偏爱秩序。

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有局限性。就有关全局情势的那一条而言，英国和美国在一个世纪以前就证明了：一个地位业已确立的霸主同一个充满生气的挑战者之间至少是有可能共处于相对和谐的状态的。

戈尔巴乔夫下台后，再提那种以行事诡秘的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和动机为根据的论点就应当慎重。毕竟，仅10年以前，关于苏联上层人物的不妥协态度也有类似的论点，而事实证明它们是大错而特错了。

以文化冲突作为理由的那种解释就更成问题了。任何人都不知道像中国这样博大悠久的历史对于现代化的影响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抑或文化上的差异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会怎样变成政治紧张状态。这些论点，不论是单独来看，还是总起来看，都根本不能证明旨在缓和美中之间紧张关系的努力必定会失败或无效。

中美关系中争执最大、也最容易引起冲动的是人权问题。伯恩斯坦和芒罗也像几乎所有别的人一样，无法就这一点阐进一种条理分明、前后一致的

立场。根本的问题在于：在这件事情上，个人或致力于某个具体问题的团体有采取绝对主义态度的自由，政府却不能这样做。政府必须通盘考虑对人权的关注和其他方面的问题——和平、安全、秩序、繁荣——那些问题也大部含有很大的道义成分。伯恩斯和芒罗是理解这一点的，尽管他们谈到人权问题时情绪是激烈。他们风趣他说：“美国人对于捍卫其他国家人权问题的看法，可能就像对于可选择的手术的看法一样——只要风险不是太大，就值得一做。”乍听起来，这话似乎有些奚落之意，但接下来，他们承认，事情基本上也应该如此。到头来，他们的批评淡化成不过是对于克林顿政府不高明的手法以及美国企业经理们的不解人意所发出的一种抱怨而已。

还要说一点：尽管一切不公正现象和人的苦难都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在政治中，规模的大小是很重要的。据作者说，对中国政治犯人数的最可靠的估计是3000人。在13亿人中，这只相当于0.00023%，——这个数字也许还赶不上苏联劳改营的比例，而且也不比另外几个并未受到美国谴责的国家更严重。

鉴于现在有些人指责中国卷入美国政治，关于美国的院外援华集团的那一章肯定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惜，这是全书中考虑最不周全的一章。西德尼·胡克（美国学者——译者注）曾制定过这样一条争论规则：“在怀疑——即便是有正当理由的怀疑——对手的动机之前，先批驳他的论点。”本书没有遵守这一规则，而是根据一些成问题的“证据”对美国的一些杰出人物的正直表示怀疑。

尽管如此，《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还是对中美两国的抱怨与恐惧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各自陵对方感到不安的东西作了有益的阐述——尽管是在无意之中这样做的。书中把中国在亚洲谋求霸权的事实说成是不祥之兆，但是美国在亚洲以及在其他所有地方已经拥有这样的霸权了。书中指责中国正在建立可怕的军事机器，但是美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具有压倒一切的可怕威力了。书中对中国现在已经能够袭击美国大陆感到惊恐，但是长期以来美国的核导弹一直瞄准看中国，等等。倒不是说美中两国在道义方面彼此彼此，而是我们应当认识到，那些使我们感到恐惧和不满的事情大概也会在中国人身上产生类似的影响。

伯恩斯和芒罗最擅长的是对美中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特别是在涉及台湾和日本的时候，进行分析。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但却是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从北京的角度来看，1996年在台湾海峡发生的那次令它蒙羞受辱的同美国力量对峙的事件“被视为中国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奉行的温和的和平方针的最终失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标志着美国政策遭受的重大挫折，固为在这个问题上，维持现状——即在台湾名义土地地位模糊不清与事实上享受自治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使这种平衡无论朝哪个方向发生摇摆的任何事情都有使美国陷入那里的局势不能自拔的危险。关于日本，作者强烈地提出下述论点：重新武装起来的日本将成为一支有利于该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力量，华盛顿应当据此改变它的政策。

所有这一切都是与本书总的遏制论点和忧郁的调子相一致的。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书的最后一页，作者的调子突然变得乐观起来。他们预料中国会出现一个较为开明和宽容、防范心理和沙文主义不那么严重的新的比较年轻的上层集团。最后出现的这种乐观态度很是奇怪。如果这是为了最后在

辞藻上玩弄点花样，那是很不和谐的。如果作者当真认为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那就应当在前面几章就提出来加以透彻的阐述。那样的话，本书就会成为一本与现在大不一样的、可能比现在好一些的书，一本不是专门谈竞争与冲突、而是更多地探讨 21 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实现和解的余地的著作了。

（译自 1997 年 3 月 14 日《纽约时报》）

中国是亚洲未来的侵略者吗？——新书引起有关 21 世纪外交战略的议论

（美）塞思·琼斯

随着苏联的灭亡和冷战的结束，美国出现了许多预测下个世纪世界局势的“预言家”。

像塞缪尔·亨廷顿、罗伯特·卡普兰和弗朗西斯·福山这样一些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有的设想会出现一个充满日益增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和即将发生内战的国家的国家的世界，也有的设想会出现一个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将发生冲突的世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理查德·伯恩斯和罗斯·芒罗提出了一个以美中关系为核心的现实政治论点。

他们论证说，一个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将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国家向美国提出挑战。有关国家将被迫表明立场，于是就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可能还有军事领域发生冲突。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设法在主张“接触”的学者和决策人同鼓吹“遏制”的人之间取中间路线。他们论证说，“接触”是一种“天真”的政策，因为它错误地假定加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联系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关系的改善和促进中国的民主。另一方面，鉴于今天的中国更像 18 世纪刚刚兴起的俄国，而不是 20 世纪强大的苏联，采取一种决意遏制中国的战略将犯时代错误。

尽管两位作者试图造成一种“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显而易见，他们大体上与遏制派相距不远。例如，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他们说，对付一个持敌对立场的中国的唯一办法，是使美国在亚洲保持居于极大优势地位的军事存在，防止中国建立核武库，确保台湾拥有可靠的防务威慑手段以及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他们声称在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是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述及美中之间因台湾问题而发生的一场虚构的战争。他们还批评克林顿政府关于会晤中国高级官员的决定，认为这会产生反作用。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已经在研究对外政策的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例如，在最近一期《外交》杂志中，罗伯特·罗斯就对伯恩斯坦和芒罗两人关于中国的日益军事化会破坏亚大地区稳定的观点提出异议，罗斯争辩说，中国的“力量太弱，不足以对亚洲的均势构成挑战，而且，它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弱国。”

不过，总的说来，伯恩斯和芒罗宣扬的主张是错误的。通过专注于扩充军事力量——特别是扩充其邻国的军事力量——来公然威胁中国，很可能会促使预言真的应验，鼓励中国采取敌对态度。在人权、贸易以及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产生分歧。虽说采取一种强有力的方针是十

分重要的，但是，如果两国能建立起持续的、行之有效的伙伴关系，中国就有可能对美国所关注的事情采取较为理解的态度。

（摘译自 1997 年 3 月 19 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这场冲突并非即将到来——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约瑟夫·卡恩

太平洋两岸的冲突有点像是这个样子爆发的：当台湾拒绝谈判统一问题时，中国变得失去耐心。旨在恫吓这个岛屿的军事演习升级成实际封锁。台湾保卫自己，中国竭尽全力进攻。美国担心它在重要的亚大地区失去信誉，以经过权衡的方式加以干预，派第七舰队去保卫台湾。美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结束了。

理查德·伯恩斯和罗斯·芒罗合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动人的故事的核心章节就是这么说的。

伯恩斯和芒罗两位先生都是老合格的驻北京记者，对于今日之中国应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他们却满足于发挥危言耸听者的作用，而不是分析家的作用。此书反映了美国各地日益增强的反华情绪，同时也确实提出了中国作为一个亚洲大国将如何行动这个重大问题。

然而，此书没有增加任何一点有关中国的总体知识，主要涉及的是记者们所谓的“传播带有倾向性的信息”。它预见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几乎各个方面都将发生利害冲突，利用可以广泛得到的信息的只言片语来支持这本书的主题。

这两位作者说：“简而言之，我们目前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有损于美国的经济利益的。”他们以中国同美国的贸易顺差为证据，说中国同日本一样，也在利用美国的开放使自己获得好处。北京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是外国投资者给予的恩赐。中国人很可能把这笔钱用于实现其野心勃勃的目的，例如购买先进的武器。这个国家的军事开支已经大大超过西方任何一个国家所供认的数字。

他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说明他们的这种夸张说法是正确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出超确实很大，但是同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平衡的。此外，外国投资者使得中国在低附加值装配工作方面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是外国投资者而不是中国公司控制着中国出口的大部分，从而使得作者关于中国已经成为商业怪物的论点失去了说服力。

中国的确积累了大量外汇储备，但是有证据表明，中国更加重视的是做好准备使其货币具有充分的可兑换性或确保香港的经济和金融的兴旺发达，而不是倾其上百亿美元的储备去购买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军事开支的增长略快于中国预算的其他项目，同时中国也已更新了它的武器库。但是这两位作者对中国实际军事开支的估计（他们估计中国的军事开支已达到 800 亿美元）比大家一致的估计数字高出三倍。

有关中国今天比 10 年前更加对外部世界封闭的说法，简直是昏话：从贸易和投资到信息，现在一切都比以前更加易于办成或得到，而这并不是说，中国的行政官员现在对现实已感到满意。

在这本书的结尾，在详尽无遗地重复中国如何变成一个对世界构成威胁的国家，它的每一个行动都是一心想打击美国并有着无上权力的独裁者狂热的阴谋活动之后，读者们可以预料他们会大胆地呼吁诉诸武力。为什么不抵制中国的产品，禁止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禁止中国参加国际论坛，并寸步不让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相反，读者最后看到的是，爆发真正的美中冲突是不大可能的，尽管不

是不可能的。他们说，美国应当继续鼓励中国在经济上对外开放，在维护人权方面做得更多一些，放宽对政治体制的控制和成为世界大家庭的正式一员。他们的观点在策略上与克林顿政府现行的对华政策有所不同，但是一般说来，反映了尼克松关于同中国接触比孤立中国更加明智的观点。所以他们罗列的一系列可怖的情景渐渐地变成了冗长乏味的故事。

（摘译自 1997 年 4 月 15 日《亚洲华尔街日报》）

